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同志贺信

学术研究杂志社：

《学术研究》杂志创刊 40 年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较好地发挥了作为广东学术理论研究的阵地和窗口的作用，为我省的理论建设和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值此《学术研究》创刊 40 周年喜庆之际，谨表示祝贺。希望你们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十五大精神，结合我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富有成效地开展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活跃、繁荣，努力推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为推动我省的两个文明建设不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于幼军

一九九八年二月五日

学术研究杂志创刊周年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的学术研究要并重。

任仲夷 一九八〇年
一月十日



实践无止境
真理放光芒

《学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

张汉青



张汉青同志题词

开学术新境
树研究新风

贺学术研究创刊四十周年

杨应彬



杨应彬同志题词

の中春秋 枝繁葉茂

跨越世紀 更上一层楼

祝

學術研究 新刊
の中國年

陳越平

一九八二



陈越平同志题词

目

学术研究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纪念周恩来同志 100 周年诞辰•

认真学习研究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 于幼军 (5)

百年丰碑颂英灵

——广东省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 曾 哲 (9)

试论周恩来的俭朴美德 李晓云 (11)

•我与《学术研究》•

从读者、作者到主管、主编 (王致远) 回忆与祝愿 (卢 权) 对《学术研究》的祈望 (古远清) 永远高

举先进旗帜 (朱伯康)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肖前) 我与《学术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吴宏聪)

粤港澳合作推动澳门研究 (吴志良) 载誉中华,任重道远 (吴雁南) 争鸣的园地 作者的良友 (刘 嵘)

对《学术研究》的一点期望 (李锦全) 塞北岭南话文缘 (李炳海) 《学术研究》四十华诞感言 (胡守为)

我的良师益友 (张 磊) 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开展争鸣 (张江明) 让史学走出学术界 (张艳国) 扎

根于创造性实践的沃土 (贾春峰) 建议实行精品战略 (梁 钊) 方向·品位·特色· (梁渭雄) 自觉肩负起

发展社会科学的历史重任 (章权才) 我与幼年期的《学术研究》 (曾牧野) 应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 (谢明

仁) 祝贺与期望 (詹伯慧) 我对《学术研究》的回忆与期望 (雷 强) 《学术研究》老友的话 (管 林)

..... (1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哲学思想•

深刻领会唯物辩证法思想 指导现代化建设实践

——关于十五大报告的哲学思考 张江明 (37)

邓小平哲学的根本点 陈福雄 (42)

论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 谭永灼 (47)

1998 年第 3 期

录

•经济•

- 中国金融资产的结构相关分析与综合透视
..... 何五星 (51)
比较成本理论的数学描述与统一 梁 琦 (55)
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仿真模型及其建模机理
..... 吴 杰 (59)

•可持续发展研究•

- 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 周 毅 (65)
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生态型可持续发展
..... 孔令宏 (72)

•教育•

- 珠江三角洲的教育现代化 颜泽贤 冯增俊 (76)

•历史•

- 一块被遗忘的思想领地
——孙中山题辞论析 刘望龄 (80)
从澳门史认识试评鸦片战争成因
..... (澳门) 霍启昌 (87)
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 徐晓望 (93)

•香港研究•

- 清朝外交官眼中的香港和中英关于香港设领的交涉
..... 余定邦 (98)
探寻文脉与把握个性的结晶
——评王剑丛《香港文学史》 肖向明 (103)
《香港文学书目》读后 (澳门) 邓骏捷 (105)

•文学•语言•

-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流变论 陈晓明 (107)
龚自珍集外诗文录 王贵忱 王大文 (113)
《风月锦囊》刊印考 黄仕忠 (117)
值得回味和纪念的十年 陈恩泉 (120)

•书评•

- 丰富了人格理论 提供了学习楷模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评介 马中柱 (122)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Necessity of a Serious Study of Mr. Zhou Enlai's Thought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Yu Youjun(5)
A Summary of the Points from 'The Ceremony Symposium for Mr. Zhou Enlai's Centenary Birth - day'	Zeng Zhe(9)
A Talk about Mr. Zhou Enlai's Virtue of Plain Living	Li Xiaoyun(11)
Essays on the Nexus between the Journal and 'Me' ... Wang Zhiyuan, Lu Quan, Gu Yuanqing, Zhu Bokang, Xiao Qian, Wu Hongcong, Wu Zhiliang, Wu Nansheng, Liu Rong, Li Jinquan, Li Binghai, Hu Shouwei, Zhang Lei, Zhang Jiangming, Zhang Yanguo, Jia Chunfeng, Liang Zhao, Liang Weixiong, Zhang Quancai, Zeng Muye, Xie Mingren, Zhan Bohui, Lei Qiang, Guan Lin	(16)
A Philosophical Ponderation on the Report Issued in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Zhang Jiangming(37)
The Key Points of Mr. Deng Xiaoping's Philosophy	Chen Fuxiong(42)
Deng's Achievement in Enriching CPC's Thought and Developing Its Route	Tan Yongzhuo(47)
An Inspection on the Relativ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Capital in China	He Wuxing(51)
Math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Cost	Liang Qi(55)
Dynamic Model and Its Forming Mechanism Imitating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Wu Jie(59)
Macro - strategy of Anti - poverty and Continuable Development	Zhou Yi(65)
Taoism, Its Thinking Wa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cotype	Kong Linghong(72)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Yan Zexian and Feng Zengjun(76)
A Thought Aspect Forgotten: about the Inscriptions by Mr. Sun Zhongshan	Liu Wangling(80)
A Trail Comment on the Cause of the Opium War (1840 - 1842), Basing on a Recognition of Macao's History	(Macao)Huo Qichang(87)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of Ocean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Xu Xiaowang(93)
Hong Kong in the Diplomats' View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ngland over the Matter of Bilaterally Setting Consulates in Hong Kong	Yu Dingbang(98)
A Book Review on 'A Hong Kong'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Xiao Xiangming(103)
About 'A Catalogue of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Macao)Deng Junjie(105)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Ideological Trends	Chen Xiaoming(107)
A Record of Gong Zizhen's Poems and Essays beyond His Collections Published	Wang Guichen and Wang Dawen(113)
A Textual Study of the Editions of 'Feng Yue Jin Nang' (《风月锦囊》)	Huang Shizhong(117)
Academic Ten Years Valuable to Recall	Chen Enquan(120)
A Recommendation of a New Book 'Mr. Zhou Enlai's Demeanour of Personality'	Ma Zhongzhu(122)

认真学习研究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于幼军

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 100 周年。在这个时候缅怀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格,研究周恩来同志的生平和思想,对于我们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卓越领导人,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并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虽然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 22 年了,但人们对他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历史功绩惠及今人,而且因为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风范,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永恒的生命力。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一代楷模的光辉形象,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人民心中铸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广东是周恩来同志民主革命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同志又先后 20 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和指导工作。广东人民对周恩来同志怀有深厚的、真挚的感情,和全国人民一样永远铭记周恩来同志的光辉业绩、高尚人格和精神风范!

周恩来同志不仅是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他在长期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统战、科技、教育和文艺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同志的思想非常丰富,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他在担任人民政府总理 26 年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今天尤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决策者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周恩来与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一道,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的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宝贵经验。深入挖掘、研究周恩来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思想,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遗产,对我们今天更加全面地了解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并深刻、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个人学习体会，周恩来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把经济建设摆在首要地位，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周恩来同志一贯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早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同志就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在20多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同志一贯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基本任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地维护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重申我国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并且提出了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计划。综观周恩来同志这方面的思想，他坚持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急躁冒进；强调在经济工作中要“说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收实效”；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从长计议，统筹兼顾，稳妥务实，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以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均衡而持久地发展；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多次指出要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看作是“我们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周恩来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材料。

2、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改革的思想。周恩来同志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强调我国“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反对过早地宣布

建成社会主义。他在50年代就提出了“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概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内容。他在50年代中期还提出了关于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包括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给每一个生产单位以一定自治权力”；在分配制度上反对平均主义倾向；在所有制形式上主张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外，还要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也可以允许一点私营的，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等等。他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力量日益增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强调“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不仅要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的协作”，“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这些远见卓识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仍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3、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周恩来同志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认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的因素”，“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时代“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他还指出，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在1956年和1962年两次对知识分子的属性作了界定，首先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强调知识分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党要尊重、信任、关心、爱护他们，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周恩来同志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思想。周恩来同志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两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具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诚相见,广交朋友。他特别强调:“不断地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强调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关于台湾问题,周恩来同志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就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声明,以后又和毛泽东等同志一道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了积极努力,多次提出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的主张。对世人关注的香港问题,周恩来同志指出,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周恩来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是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战略构想形成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来源。

5、关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思想。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和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他以超凡的胆略和卓越的才能,为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为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同时也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20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外交家。他早在1953年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成为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还提出了“民间先

行,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思想,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的民间外交,积极推动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为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70年代初期,他与毛泽东同志一道,正确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采取富有开创性和战略性的举措,缓和了长期紧张、对峙的中美两国间的关系,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使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同志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他提出并实践的其他一系列外交思想,至今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和重要指导原则。

周恩来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博大精深,除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外,还有关于党建、军事、文艺等方面的思想,他的许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非常值得我们结合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深入学习和发扬光大。目前,理论界对周恩来的研究,偏重于他的生平、事迹、品格等方面较多,而对他的思想,特别是对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尚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今后我们的研究应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对周恩来同志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要把握好几个问题。

第一,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的理论,关键是要把握其精髓,即掌握他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周恩来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包含了许多富有远见、被今天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及其他因素的限制,尤其是我党在指导思想上一再发生“左”倾错误的偏差,以及“十年浩劫”极不正常的因素,而周恩来同志又处于国家政策实施者的位置,因此,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某些具体的观点和言论,难免会有历史的局

限性。因此,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的思想,不是照搬照套他的全部具体观点和意见,而是学习他把对党的事业负责与尊重客观规律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态度,以及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进行的不懈的探索,继承他在这一探索中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坚持这样一种态度,既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精髓的要求,也是保证我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要求。

第二,要把周恩来同志的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恩来长期在第一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在领导工作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今天,我们应当将周恩来的思想放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去学习和研究,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他的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也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

第三,要把学习、研究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同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邓小平同志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为后来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形成提供了经验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而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也使他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我们把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的思想同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就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体会到这一理论的伟大意义,认识到它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艰苦探索和努力的结果,是邓小平同志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所形成的智慧基础上的伟大创新。因此,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和事业的最好的继承,是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怀念!

周恩来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品质风范历久弥新,仍以巨大的感召力激励我们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开拓进取,奋发前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百年丰碑颂英灵

——广东省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 曾 哲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联联合举办的“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于 1998 年 2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广州召开。

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论文作者,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部分领导,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老部下以及新闻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近 600 余人出席了 2 月 23 日上午的隆重开幕式。

这次纪念意义的学术研讨会是广东党史学界、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一次盛会,大会共收到论文 130 多篇、论著一本,规模之大,档次之高,学术讨论的气氛热烈,可谓盛况空前。兹将会议综述如下:

一、百年之讴,感人之深。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其丰功伟绩,其精神风范,其道德情操,其人格力量已早为全中国人民所熟知、所敬仰。正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在发言中所说:“人们对周恩来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并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而淡薄”,而恰恰相反,百年春秋、百年思念。这不仅因为他的历史功绩惠及今人,而且因为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崇高品质和人格风范,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永恒的生命力。他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人民心中真实地铸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为纪念百年恩来,中共广东省委有关部门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就在这次研讨会召开的前两天,由省委办公厅、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了“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暨 15 个抗日文艺团队成立 60 周年”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原 15 团队的老战友和“孩

子剧团”的“老孩子们”重逢聚首羊城,含着泪水讲述周副部长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故事。由“孩子剧团”成长起来的著名诗人张光年(光未然)和著名音乐指挥家严良堃不顾 80 高龄登告献艺,以表达对敬爱周总理的深切缅怀之情。

百年之讴,感人至深。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骄子,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深受中国人民爱戴,并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二、论述系统,视角新颖。

这次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从理论层面上而言,具有论述系统、主题鲜明、内容详赡、视角新颖的特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的一生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对新中国的创建和维系所作出的不朽贡献,揭示和总结了周恩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领袖生涯中对广东党的建设与发展,对广东全省包括港澳台地区革命工作的亲为和具体指导,具有显著的系统研究特征和地域色彩,强烈的理论思辨和饱满的现代文化意识。

这次研讨会共筛选论文 80 篇、专著一本(《周恩来与广东》18 万字),作者笔触敏锐,思想深邃,见地独到。或“以小见大”,或“以大见深”,在广东党史学界是不可多见的一道人物研究的“风景线”。不少作者抓住了周恩来与广东方方面面的联系,进行个案分析论述,写出了周恩来与广东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多方位、多层面的活动与贡献。如

《周恩来与广东党的建设》、《周恩来关于国民革命时期的理论建树》等文章,以及周恩来在广东各地的革命活动和历史足迹,除有新的史料发掘外,更多的是在此基础上新的理论突破。

此外,这次研讨会,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下,研究讨论的问题颇具深度。有部分论文本身就有颇高的史学修养和独擅的理论价值,特别是部分学者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对周恩来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的评价与界定,较之以往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与会代表在研究周恩来崇高思想及伟大风范的基础上,凸现出“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针对性。周恩来虽属于历史的,但又属于现世的。以周恩来的公仆风范、勤政廉政的无私人格现世转换,终极关怀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无不带深刻的启示意蕴。

针对崇高境界线上的周恩来,与会学者集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1)“周恩来现象”的形成及其历史原因:“周恩来现象”是一近世纪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杰出的灵魂与完美人格的结合。他的高风远致、他的人格力量在中国领袖集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人指出他丰富而完善的人格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人将他的思想发展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思想加以对比研究,说明他们思想之间彼此有承传、发展、补充、完善的关系。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和风范形成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世革命实践的结晶,是一部最优秀的“中国书”。

(2)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不少与会者认为周恩来在他任总理的26年的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尤为丰富;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首位;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改革方向;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论者认为周恩来早在大革命时期,或说更早一些就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并形成了较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观。

(3)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有论者提出周

恩来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首创者和最富绩效的实践者,也是倡导世界要走和平与发展之路的理论拓荒者。关于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外交风范、外交策略、外交魅力等均颇见深度和力度,特别有论者指出周恩来首倡的“民间外交”、“乒乓外交”等“以民促官”的外交方略,既富有敢为人先的务实精神,又富有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在处理对台、对港、对澳问题上,周恩来一贯主张区别对待和平解决。他的诸多天才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与计划,成为尔后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之一。

(4)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周恩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集大成者,他言行忠信,诚交天下朋友,不欺不诟,为党内外、国内外朋友所称道。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都能十分巧妙而成功地运用统战手段,来获致民族解放的最大利益,获得党的最大利益。

(5)关于周恩来与广东:有论者按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周恩来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与广东党的建设;广东经济与建设;广东历史上两次所谓反地方主义问题;与粤籍党内外著名人士交谊问题;广东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首善之区发源之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特殊贡献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材料和观点,认为周恩来与广东休戚与共源远流长,在他身上似乎有那么一种难以阻绝,难以割舍的“广东情结”。

(6)还有论者提出周恩来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计划生育、反腐倡廉、为政以德的“民本”思想,这些都有一定的新意,在人物比较研究方面,有论者将周恩来与邓演达、周恩来与叶剑英、周恩来与廖承志、周恩来与邓小平进行比较观照。

总之,在这次纪念意义的研讨会上,呈现了不少通人之言,见地之论,见真之作。这是值得广东党史界、人文社会科学界可喜可贺的事情。

作者曾 哲,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研(510053)

责任编辑:郭秀文

试论周恩来的俭朴美德

□ 李晓云

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周恩来高尚的思想品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从小养成俭朴美德,后来虽身居高位,却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一生以俭朴为荣,坚持勤俭建国,为开党和国家清廉之风率先垂范,不愧为人民的好总理、好管家。

一、一生俭朴,两袖清风

周恩来为了实现立志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伟大理想,对革命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一生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人格情操。

1、刻苦的求学生涯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由于家庭生活收入拮据,生活相当清贫。但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磨灭他对学习的热情,反而成了激励他更加勤奋学习,更加努力向上的动力。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深得教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在教师的推荐下,学校主动免去了周恩来的学、杂费用,成了该校唯一的免费生。

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在巴黎雷诺汽车厂做工,又利用工余时间撰写文章或通讯,获得一些稿费,支付日常生活费用。生活这样清苦,周恩来却仍然孜孜不倦地、毫不动摇地追求着革命的真理,不辞劳苦地为革命工作着。

2、朴素的婚礼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相识、相敬,在周恩来旅欧期间,两人远隔重洋,鸿雁传书,互相交流着各自的思想,交织着两人的深情厚谊。

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到了广州工作,而邓颖超仍在天津。他们虽然已经定情,但天各一方,周恩来归国近一年,竟然还没有机会见到邓颖超,直到1925年7月,因工作关系,邓颖超才被调往广州。

1925年8月8日,在广州广东区委所在地的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间里,早已心心相印的两位有情人,终于结成了一对患难与共、同心同德、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他们没有举办有亲朋好友参加的隆重热闹的婚礼,也没有进行三叩九拜的婚礼仪式。他们只是通知了一些朋友前来,向在场的朋友们宣布了他们著名的婚姻誓言。婚后,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生活依然保持着俭朴的作风,夫妇两人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家中没有一件豪华奢侈的家具,一张写字台,几张靠背椅,一个四层的藤书架,上面放的是周恩来从国外带回来的书籍和国内新近出版的报刊。客厅在楼下,陈设也十分简单,一张长方桌,几张藤椅、圆木凳。周恩来就在这简陋的客厅里,经常召开工作会议,会见各方朋友。

3、俭朴的日常生活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生活的艰难,物资的缺乏,对每一位革命者都是严峻的考验。周恩来虽是首长,但却十分勤俭朴素,严于律己,为大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使用的东西从来不愿随便丢掉,一双鞋破了,宁肯自己动手修补后再穿;一件衣服破旧了,宁肯翻洗缝补后再用,却不愿去领新鞋、新衣,他的理由是:应该把新鞋、新衣留给急需的战士们。

1938年,在武汉召开接见外国记者的招待会。为了使周恩来能穿得整齐一些,警卫员想为周恩来买一套新的中山装,被周恩来婉言拒绝。他对警卫员们说,虽然他很喜欢中山装,但现在不行,“一是经济条件不够,二是不能跟外国比,再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不都是穿着旧军服接见外国人吗?后天我就穿这身衣服去接见他们,不会叫人瞧不起的。何况我们不是靠穿戴得漂亮叫人敬仰,而是要拿出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只要我们立场坚定,诚恳待人,他们就不敢轻视!”果然,第二天周恩来穿着旧军装接见了各国记者。周恩来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给这些记者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其中一名美国记者评论说:“万万没想到,他穿的却是一件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当然,破衣服并不妨碍他将成为中国一代英雄人物。”

解放后,周恩来成为国家的总理,地位改变了,作风却仍然不变,保持着艰苦朴素、节约俭朴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穿过的一件旧西服,收藏了40多年后,已窄得穿不下了,周恩来还不愿丢弃。解放后,交给裁缝师傅想方设法,拼拼凑凑改制成一件中山装继续穿起来。一套1950年买的睡衣,已是补丁挨补丁,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磨得成了无绒无格的白布了,依然舍不得丢掉,一直穿到他逝世的时候。一条用了20多年的浴巾,上边补了14块补丁,也舍不得扔掉,直到晚年住院时还当枕巾垫在头下。抗日战争时使用的一床被子,1962年博物馆征集文物时,周恩来仍在用。

周恩来不仅在衣物的使用上始终保持

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饮食上也是如此。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生活逐步好转,各方面环境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他始终要求自己 and 同志们吃一样的,伙食标准要与大家的一样,不容许有任何特殊。在中央苏区时,他和大家一起吃“梢子饭”。去开会吃饭时,他要了解自己桌子上的饭菜是否与其他同志的一样,不容许专门为他开小灶。周恩来主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时,十分操劳,人都累瘦了,同志们心疼,吃饭时特意为他炒了个榨菜,他马上提意见说:“我们在后方没有理由要求更多的享受。”

解放后,由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条件明显提高,周恩来仍然保持着节俭的作风。即使是副总理、部长级的首长们开会,中午一餐也只开工作餐,从1950年开始,规定了经济实惠的“四菜一汤”的用餐标准。他无论到哪里,如果吃饭,一定付上钱粮,由于周恩来的倡导,带头执行,大家也就形成了一种制度。特别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的粮油副食品十分紧缺,周恩来强调领导干部和群众一起共度难关,自己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作为总理,他经常要到各地视察,了解情况,为避免各地对他特殊的招待,他列出了一份禁吃食品的菜单,其中包括了鸡、鱼、肉、蛋、木耳、海米等70多种,而且规定每餐的伙食标准不得超过5角钱。服务员怕周恩来的身体吃不消,特意给他做过炸油条、炸黄豆,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要精打细算,学会过日子,将来形势好了,仍然要勤俭节约,……”

经济困难时,淮安县委的同志到北京开会,顺便为他捎带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油茶馓子。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原物退回,并附了一份国务院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在文件上批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有关负责同志认真阅读文件,坚决按文件精神办。

周恩来严于律己,公私相当分明,从不私拿公家任何物品。那怕是喝一杯茶,因私坐一次车,他都要按规定付清钱款。他身为总理经常出国访问,外宾时常送给他一些礼

品,他一件不留,全数上交给国家。他的高尚人格,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

4、朴实无华的办公室

建国以后,周恩来搬进国务院,住在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建筑,在这个地方曾举行过无数次重大的会议,作过许多重大的决策,凡去过西花厅的人,都认为这里是“朴实无华的西花厅”。西花厅的房子原本就十分陈旧,搬进之前虽然粉刷了墙壁,喷了浆,但因为地面经常泛潮,墙壁很快变成黑灰色,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把房屋整修一下,周恩来一直没有答应,直到工作人员告诉他,房子再不整修会毁坏,周恩来才松了口,答应整修,但他强调“就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那里,要尽量节约。”工作人员利用周恩来出差之际,把房屋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维修。

当周恩来回来时,发现家中整修一新,添置了一些东西,对此大为气恼,认为完全违背了他的叮嘱,十分严肃地批评负责修房的秘书何谦:“为什么搞得这么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并要何谦作检查,连房门也不进,住到钓鱼台5号楼他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地方。工作人员想请陈毅帮忙劝说周恩来,周恩来反把陈毅请到了国务会议上。会上,周恩来就家中装修的事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这次我去南方读书,到各地看了看……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呢?我心中不安。”周恩来反复在大会小会上检查,大家还以为装修得多么富丽堂皇,有的同志去看了看,不过都是应该修缮的地方,实际上还不如某些干部的家。

周恩来一直不肯回去西花厅住,直到工作人员把新添置的家具和物件搬走(除了地板和油漆无法拆除和刮掉外),再换上原来的旧家具后,周恩来才勉强同意搬回来住。此后,西花厅再没有大修过。

周恩来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件事,他考虑得更加深远。他这样说:“我身为总理,带一

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带的。”周恩来以自己艰苦朴素的作风,以自己的言行,为广大领导干部党员们起了表率作用。这也是他俭朴美德的生动体现和写照。

二、坚持勤俭治国

周恩来的俭朴不仅表现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克勤克俭,时时处处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而且作为国家总理,在治理国家、建设国家上,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他综观全局,运筹帷幄,把自己勤俭节约的俭朴观思想,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针政策,有机地协调一致,溶入其中,开创了共和国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政风、民风,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弘扬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1、煞住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奢华浪费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鉴于历史的教训,针对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现实,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了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警钟,毛泽东、周恩来再三地强调:共产党执政后,应该继续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朴素的作风,为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不能当李自成。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北京的国家各部委机关都正在组建,掀起了一股竞相高价抢购房屋的歪风,一时造成房价飞涨。为煞住这股风气,周恩来于11月1日签署命令指出:凡需购房,均须向政务院呈报房屋情况、价目,经指定机关审批后才得购买,否则即按违法论处,命令一出,立即煞住了这股歪风邪气。

一些党员干部,在执政后不久,自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功,沾染上了官僚主义习气,高高在上,饱食终日,脱离实际,不为群众办事,有的甚至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腐化堕落、蜕化变质,沦为国家和人

民的罪人。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和警惕。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周恩来在许多会议上作了报告和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积极投入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三反”运动。

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曾讲过要过好“五关”,在其它场合中,他也多次谈到过“五关”的问题。一是“过思想关”;二是“过政治关”;三是“过社会关”;四是“过亲属关”;五是“过生活关”。其中过生活关部分,周恩来告诫领导干部们:“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周恩来还认为,领导干部只有“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同上,第427页)这样,领导干部们的政治责任感才会加强,精神境界才会变得高尚。周恩来要求领导干部们在生活上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顺利地发展。

2、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

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建设的方针大计上,周恩来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主张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提倡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是党和国家的一贯策略,也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和美德。周恩来认为,勤俭节约不仅仅是财产上的、经济上的问题,而且应当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和认识,应当作为建设国家的重要方针。

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百业待兴,社会生产需要迅速恢复,人民生活需要改善和提高。国事千头万绪,需要决定、贯彻和实施,其中,坚持勤

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是周恩来紧抓不放的大事。1950年11月,他针对外交部房屋大肆装修的情况,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外交部修建太浪费,必须节俭。……一切家具,不许购买。”

周恩来还反对某些部门年终突击花钱,破坏国家财政纪律的错误做法。他指示,对外国使节“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951年10月19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精简节约的计划(草案)》中指出:要“收缩开支,清查资财”,“提倡节约,严禁浪费”。1952年2月1日,在政务会议讨论《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时,强调指出,要认真开展“三反”运动,面对“资产阶级猖狂的进攻,不只是使我们的财产受到损失,而且会使我们的政权和干部变了质。因此,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且是政治上的问题。”(《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13页)为了进一步抓好这方面的工作,1952年3月11日,颁发了政务院命令,公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1954年3月20日,在《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报告中,他强调:“要提倡艰苦作风,反对享乐思想。”还说:“艰苦朴素是真快乐,谦虚才能有进步。”1955年6月12日,周恩来在审改李富春起草的《〈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报告要点》时,为警醒广大党员干部,明确指出:“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朴素作风渐渐看不到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同上,第487页)

周恩来曾在许多场合强调勤俭建国的方针。1957年4月12日,在主持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时说:“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我们的长期方针。”(《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3页),同年8月9日另一次国务会议上又说:“现在还要提倡节约,勤俭建国。”(同上,第69页)1959年7月,他主持召开的三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提出了七大措施,其中第七项指出:“节约,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建设原

则,要大大提倡。”(同上,第242页)9月,他又提出“勤俭建国,整顿干部作风。”(同上,第352页)同年11月,他在给广州军区的信中说:“要力求增产,厉行节约,揭发贪污,反对浪费。……主要是建立起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风气。”(同上,第373页)周恩来有着很敏锐的政治嗅觉,他对干部队伍中的不良倾向和行为,非常气愤和痛心,他在同年12月6日给中共中央转发的一份批语稿中说:“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同上,第377页)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生活物资极度缺乏。为了克服困难,周恩来在许多会议上,强调勤俭建国的方针,1961年2月26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市长座谈会上,关于如何度过困难时期时说:“今年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增产节约,克服困难,度过灾荒。”(《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93页)同年9月,在一次与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更明确地说:“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必须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条件,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同上,第437页)1962年1月,他在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时,对报告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还应增加四条经验教训,其中第二条是“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增产节约”。第三条是“精兵简政”。1963年2月13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所做的报告中,在提出1963年精简任务时说:“反复强调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企业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都是我们长期的方针。”(同上,第533页)同年8月8日又再强调,还要勤俭建国,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同年11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时再次强调:“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坚持节约的精神。”(同上,第595页)

在全党全民齐心协力的奋斗下,终于顺

利地度过了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仍然极力主张“要提倡过朴素生活,不能同发达国家去比较”。1965年7月,在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时,他对大家说,要艰苦奋斗,要艰苦朴素。同年7月6日,在新疆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上,又告诫在场的干部们:“要艰苦奋斗,不能大手大脚,否则我们这一代创业,我们这一代也会毁业。”(《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42页)同年8月28日,对水电部党组的同志说:“中国现在就是穷,当然将来还是要富的。不能大手大脚,即使稍富裕一点,也要讲艰苦奋斗。我的意见,保持穷干,有钱也要拿穷干的办法搞。”(同上,第753页)

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社会上大肆出版毛主席著作、制作毛主席像章的情况,周恩来耐心地教育和说服大家:“中国人口多,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出版毛主席著作和制作毛主席像章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原则。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这不是浪费吗?……工厂比赛做像章,搞什么红海洋,这都是浪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87页)为了抓好生产,1970年5月29日,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修改、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企业、各单位克服困难,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生产能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把生产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周恩来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为革命鞠躬尽瘁,不愧为人民的公仆。他生前无所求,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死后又将一切献给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没有留下,而是撒向了祖国的江河、湖海和广阔无垠的大地。中国人民将继承周恩来的遗志,宏扬他勤劳俭朴的美德,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将激励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作者李晓云,中山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510080)

责任编辑:郭秀文

我与《学术研究》

从读者、作者到主管、主编

□王致远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初时,我在大学教书,是杂志热心的读者和作者,在杂志创办的第一年,我就为它撰写了三篇论文。1964年调到省社联工作以后,我就责无旁贷地成为杂志的主管。十年浩劫结束后,我们在积极筹备恢复省社联活动的同时,也筹备杂志的复刊。1978年1月省社联恢复活动了,同年5月,《学术研究》也即复刊,与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一道成为全国最早复刊的省级理论刊物。当时,由于原主编杨荣国受到批判,省委要我和孙孺负责杂志的主编,并且将编辑部编制由10人增加为20人,以林文山、杨樾、俞仲达三人为台柱,配备了各学科编辑,人才济济,盛极一时。1984年我负责省社科院工作以后,就不再直接参加编辑部的工作了。

作为一份省级的学术性刊物,《学术研究》在风风雨雨中坚持了40年,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在庆祝它的40周年华诞时,可以谈到它的许许多多优点和长处。我在这里要着重说的是,她始终坚持学术性的办刊方针。这使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学术研究》初名《理论与实践》,比较广泛、一般。1962年改现名,这就名副其实了。创刊之初,请示省委,陶铸同志的指示是:学术界的“自留地”;内部发行;每期印500本。这个指示规定了杂志的质、量、范围、作用。可是,杂志一出版,就突破了后两条,只贯彻了第一条。但这却是最紧要的。它要求给予广东学术界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而不必承担党的理论宣传任务,这

个任务由当时省委的理论刊物《上游》负担。

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办刊方针的指示,就逐渐形成《学术研究》的个性:坚持学术性。其内涵有二:一是发表的文章,应是广东学术界言之有物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人云亦云、千人一面的应时文章;另一是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学术争鸣,即使是不为时人、时论所认同的观点,也可以发表。当时中山大学陈寅恪、容庚、刘节等教授的观点是比较受注意的。但《学术研究》一样刊发他们的论文。大家知道,刘节教授关于孔子思想的观点,与杨荣国教授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而当时杨荣国是全国中国哲学史的权威之一,且兼任《学术研究》的主编。但编辑部并不因此而不登刘节教授的论文。

由于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因此,《学术研究》这个学术园地,可以说是春风和煦、繁花似锦的。其中,带有广东特点的就有:关于发展过程部分质变的争论;关于相对真理是否包含错误的争论;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争论;关于商品经济产生原因的争论以及对卓炯商品经济思想的评价;关于经济特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学术研究》坚持学术性这一办刊方针,也不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在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编辑部也曾经顶不住当时形势的压力,有过悄悄革新的想法,多登些配合当时形势的理论文章,而少登些学术性较强的长篇论文。可是这一变化,立即引起省委宣传部的注意,李超同志打电话来批评编辑部:你们是怎么搞的,把杂志办成这个样子?要是这样,就没必要再办这个刊物了!编辑部的同志立即省悟过来,不敢再作改变了。这可以说是坚持办刊方针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回忆与祝愿

□ 卢 权

(广东人民出版社编审)

1957年下半年,在杜国庠同志的关怀下,由杨樾、俞仲达、王干、何国文和黄佑琚等同志积极着手筹备出版《学术研究》的前身《理论与实践》。当时我正在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工作,与编辑部同在一个办公大楼办公。我平时喜欢读书,刊物创刊后,算是第一批的读者了。我比较认真地阅读了每期刊物的有关文章,得益良多。刊物读后,我都细心地保存起来。1966年“文革”爆发后,《学术研究》被迫停刊,我们研究所也要关门“闹革命”。十分可惜的是,我所珍藏的《学术研究》以及其他书籍,因为后来要到干校“改造”而处理掉了。

“四人帮”的反党阴谋被粉碎后,1978年,《学术研究》复刊了。此时,我已调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但依然是《学术研究》的忠诚读者。记得复刊号曾发表过一篇《致读者》的文章,表明刊物要继续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则。对刊物这一宗旨,我作为读者,是十分支持拥护的,因此对每期刊物都比较认真地阅读,从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大家知道,彭湃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并为革命而英勇牺牲。但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却恶毒攻击彭湃,诬蔑他是所谓“叛徒”。彭湃的亲属也因此受到了残酷迫害。《学术研究》复刊后不久,便旗帜鲜明地发表了一篇《彭湃的光辉一生不容诋毁》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论述了彭湃的革命一生,还彭湃同志本来的光辉面目,令人读后深受教育和鼓舞。对于文章的内容和观点,我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复刊号起,每期我又都妥善保存起来,至今共钉成19大本合订本,成为我的宝贵藏书中的一部分。

刊物1979年第4期首次发表了我所写的《略述省港大罢工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发表后,颇受学术界的重视。由王首道同志作序、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收入了此文。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也收入了此文的内容摘要。而我的文章得以发表,应该感谢《学术研究》的编辑同志。他十分细心地审阅了我的文章,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帮助我对文章作修改。《学术研究》1984年第3期又发表了我和倩红同志合写的《党成立前的粤港工人阶级》一文。文章的一些论点,后来一再为学术界同行所引用,并曾获全国党史优秀论文奖。而文章正是由于得到编辑同志的热情指点与帮助,才得以在《学术研究》发表。对此,我衷心感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祖国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各条战线都在阔步前进。《学术研究》复刊20年来,同样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把刊物越办越好,取得巨大的成绩,多次得到过国家的表彰。特别值得指出的:在当前期刊市场竞争激烈、学术性刊物出版处于不景气的情况下,《学术研究》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保持自己的特色,高品位地继续出版发行,并且从双月刊改为月刊,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园地,这实在难得。我们对此深为感动,并表示诚挚的敬意!

在《学术研究》创刊40年之际,我祝愿刊物继续坚持自己的特色,发扬成绩,越办越好,成为学术界的挚友!

对《学术研究》的祈望

□ 古远清

(中南财经大学港台文学研究所所长)

每次参加评职称的会议,都碰到这样的问题:评者交来的“中央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怎样读都感到学术价值不那么突出,甚至还不如同一作者在地方级学术刊物

上发表的文章。

当然,“中央级”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一般说来质量高。地方刊物由于受到稿源的限制,发表的文章虽有冒尖的,但在整体水平上无法与权威刊物比。但话又说回来,这年头无论是那一级刊物,都有“关系稿”:或是主编推荐来的,或是熟人朋友交来的,甚至是交了“版面费”的,这就难免影响刊物的质量。就是没有这种“关系稿”的干扰,编辑的水准如果不高,也有可能将好稿退掉——不,准确的说法是丢进字纸篓中。现在愿做退稿工作的编辑实在太少,甚至刊登了“忘了”寄样刊的懒编辑也大有人在。我是一个多产作者,投稿没有固定的地方,常常发生收不到样刊的事。《学术研究》算是例外,编者及时告之处理情况,如不便处理还叫我换另一篇稿件,这使我非常感动。希望今后仍保持这种编辑作风。

再回到“中央”与“地方”刊物的话题上来,从地势上看,广东的《学术研究》无疑属地方刊物,但在“文革”前,《学术研究》名声颇大,除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外,大概就是广州的《学术研究》或武汉的《江汉学报》、南京的《江海学刊》了。现在在各省市的学术刊物比“文革”前多,竞争大,但《学术研究》仍保持了原有的水准,刊登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文章,并注意港澳文化、经济研究,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该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术水平上向“中央级”刊物靠拢,但在解放思想、张扬新说方面则要保持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特色。千祈不要四平八稳。在学术探讨上要敢闯禁区,不应以政论刊物的标准要求学术刊物。目前,有少数省市的学术刊物办得与政论刊物相差无几,实在令人失望。希望《学术研究》继续突出“学术”二字,只登“研究”论文拒登应景表态文章。另方面,还希望编辑删改文章时笔下留情,勿将必要的注释删去。没有注释的文章,一般只叫读后感而不叫论文。海外学术刊物非常注重注释,在稿约中对注释格式有详细的规定,希望《学术研究》在这方面能带这个头,改变国内学术刊物在注释方面不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

永远高举先进旗帜

□朱伯康

(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学术研究》已有40年光辉历史,它是全国首届优秀社科期刊评奖获奖的学术期刊。是广东第一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代表性刊物。我有幸少年时在广东学过军事,中年时在中山大学经济系教过书,抗战时在广州参加过抗战救亡运动,对广东有感情。我平素喜爱《学术研究》,常阅读其中文章,有幸在这期刊发表过文章。在40周年纪念之时,敬献上一些希望之辞和祝贺之忱。

广东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主导方面都是先进的。在清末,最先放眼看世界,师夷人长技以制夷,先进人物林则徐、魏源,首先在广东发出先进呼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文化陶冶出来的广东人。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及在他领导下无数革命志士,是广东人,首先发难于广东。广东是民主革命根据地,多次革命运动,包括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统一广东、出师北伐、掀起大革命高潮,都是首先发生发展于广东。就以教育、学术、文化而言,先进思想,亦首先发生形成于广东。有名的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讲授三民主义之地,鲁迅讲学于此,是最早传播革命思想和先进社会科学、文学的最高学府,广东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传播先进思想和革命种子,哺育了革命新生力量。著名文史大师陈寅恪,以目盲足蹇之身,读书治学,著书育人,朝夕不倦,始终以民族大义,乾坤正气,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以顶天立地坚强人格,感染人民,振兴中华。伟哉,广东先进之地,先进人物,层出不穷。今《学术研究》正当不惑之年,血气未衰,更当举起先进旗帜,勇敢前进。

所谓先进,有一定科学含义。先进并不是“早熟”,也不是“超前”。更不是关起门来,自高自大,自以为“先进”。科学的先进,是指对科学有贡献,在历史发展中的先进。

是指有益于人类,有益于广大人民,有益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先进的社会科学,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社会科学靠不断学术研究取得进步。学术研究,要提高学术水平,离不开思想方法的正确和研究方法的对路。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自基础科学和哲学修养,来自文化水平。对路的研究方法,有各种范畴,例如:对当前具体问题的研究,要先掌握资料,收集材料,要有数据和统计,经过调查研究,然后综合与分析,循着严密逻辑系统,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大的课题,大范围的研究对象,就要用历史方法和世界范畴中的比较方法,从各个角度和层次,从产生、形成、发展、到最后成熟、衰亡和消失、进行全过程观察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最善用历史方法,常用历史方法,众所周知。对于一个人的研究,最好看他一生全过程,知人论世,还要看他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性格形成、各种行为、社会关系,留下什么成绩、对当时人对后代产生什么影响等等,都要盖棺论定。最公正的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有关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大课题,要有世界眼光,要放在世界中与国外同类事物作比较,不能孤立看问题。苏东坡看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山中看山,各个角度不同,所得印象便不同,要看真面目,只有走出此山,全面地看,与他山比较地看。“旁观者清”,对于自己有切身利益关系问题,就有立场、观点问题,旁人比自己看得清。

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离不开立场、观点、方法,但愿尽量客观一些,接近自然科学一些,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恰如其分,尽可能用自然科学的科学原则来处理,来论断。在社会科学自身范畴来说,至少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避开主观任意性。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平地起,其基础要深广坚实。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统一的。万事更从根本做起,根深可使树大。孟子说:“不齐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末,可使高于层楼”。学术研

究,要有基本功,从根本做起,功底要坚实。

盼望我们的先进,是科学的先进,是实事求是的先进,是不脱离实际、促成科学进步的先进。下一届即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将在广州市举行,我们在广州能看到社会科学的进步,如在运动场上一样,在同一条件、同等起跑线上,同样公平的竞赛,产生出真正的先进。

祝《学术研究》万事如意,健康发展,在21世纪创造出更好更新的先进。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肖 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1978年,《学术研究》也积极参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那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破除了以“两个凡是”为特征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许多理论研究刊物从那个时候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理论贡献。

在那次大讨论中,邓小平同志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典范,实事求是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提出要解放思想,要破除各种错误观念和僵化的思想模式,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而其中最根本的一件,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达到符合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归根到底是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标准来判定。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以实践来检验思维的现实性和真理性,就必然要破除各种错误观念和僵化的思想模式。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思想僵化则是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思想僵化主要以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即教

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形式表现,不论哪种形式,只要是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形式表现出来的僵化形式,都是必须反对的。历史上每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转变,都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而每一次思想解放在取得新的飞跃的同时,某些已被历史所否定的东西也会以新的形式重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能僵化理解。党的十五大江泽民同志报告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不能僵化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是一个学风问题,是从根本上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一旦把它变成为僵化的对象,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它也就会走向反面,就会没有出路。我们今天要高举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旗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总结拨乱反正,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20年的历史性转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我们对这个根本问题逐渐搞清楚的进程,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我与《学术研究》 结下了不解之缘

□ 吴宏聪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8年冬,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中山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响应号召,到东莞虎门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概在12月下旬或1959年初,《理论与实践》(1962年改名为《学术研究》)主编杨樾同志偕编辑部两位同志到虎门组稿。由于我在系里协助系

主任商承祚教授做一些行政事务工作,便陪杨樾同志走访分住在不同生产大队的容庚、商承祚、王起、黄海章等教授。当时,席卷全国高等院校的“红专大辩论”、“拔白旗”的运动刚刚结束,“余音袅袅”,好些人心有余悸,不敢与“学术”沾边。杨樾同志扼要地介绍了广东社联创办《理论与实践》的宗旨,耐心地听取了容庚等教授关于办刊物的意见,走访是很成功的。大家对广东社联办学术刊物的创举十分赞赏,认为切合时宜,是落实双百方针的有力措施。事后不久,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到虎门公社作调查研究,我们请他作了一次有关“红专”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陶铸同志邀请部分教师进行座谈。可能是座谈不拘形式,气氛很融洽,发言也很踊跃,最后集中谈到广东社联创办《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王起教授认为办学术刊物不能滥,一定要保持学术品位,学术刊物不一定越多越好,但此时此地办学术刊物是1957年反右后的“空谷足音”,嘉惠士林,其意义不容低估。容庚教授则从《理论与实践》编辑部下乡组稿说开去,谈到他30年代在燕京大学编辑燕京大学学报的体验,不无感触地说:“述而不作固然大有人在,但读书人谁不想著书立说?办学术刊物我举手赞成。”陶铸同志马上插话,大意是说:听来大家都欢迎办学术刊物,这样大家就想到一块了。现在广东有两份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一份晚报(《羊城晚报》),再办一两份社会科学理论性学术性刊物,就可以照顾到各个方面,调动学术界积极性,大家应该把《理论与实践》当作学术界自己的刊物来办。“拔白旗”把学术都拔掉了,高等院校文科各系今后要协助刊物组稿,解除教师思想顾虑,把专家、学者研究成果掏出来。1962年《理论与实践》改名为《学术研究》,编辑部经常有人“跑中大”,向老教授组稿,我照例陪同“登门拜访”。当时以为只是做点联系工作,没有想到这一机遇,使我从此与《学术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个人投稿不多,在《学术研究》上只发表过几篇文章,但作为一个读者,我是每期必读的。《学术研究》改版和复刊前后发表

了不少专家学者(包括老、中、青)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使人受益不浅,特别是一些老专家学者谨严的学风和强烈的学术意识,给我很大启迪。有一段时间,我有幸被《学术研究》聘为编委,差不多每年都有机会听到编辑部一年的工作总结和新的一年的工作设想,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务实求真,使我对双百方针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都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学术界的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就以文艺教学方面来说,清除极左思潮的干扰,摆脱“工具论”的束缚,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从我个人接触中,《学术研究》编辑部对现实问题最敏感,与社会沟通的渠道也比较多,因此我凭藉与《学术研究》的一点旧交情,也经常跑编辑部,提出一些教学和科研中碰到的给“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问题,诸如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文学的本体性、文学的批评标准和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娱乐功能等问题,向编辑部同志讨教,辩难析疑,各抒己见。于是《学术研究》成为我获取学术信息,了解文艺动态的窗口,而杨樾、张绰、王干等同志也就成为我切磋学问的“至爱亲朋”,我们之间有了一份学术“情结”。

80、9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中争论较多,《学术研究》除了发表争鸣文章,从较高的理论学术层面上反映我省社会科学研究最新成果外,还给广东社联属下的学会提供版面,开辟专栏,对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问题,及时组织文章,展开讨论。例如“文学与市场经济”、“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便是近年受到学术界关注,反响较好的两次讨论,显示了《学术研究》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学术意识和提倡学术上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给作者、读者留下深刻印象。40年来,《学术研究》一本初衷,不仅发表了大量有分量的佳作,成为我省理论战线主要阵地之一,而且像一条纽带,把学术界联结在一起,为广东学术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作者、读者心目中,《学术研究》是真正的学术园地,肯定会越办越好。

粤澳合作推动澳门研究

□吴志良

(澳门基金会管理委员会委员、博士)

澳门研究起步于80年代,90年代逐渐走向系统性的纵深发展,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这些成绩,实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朋友的努力分不开。

相对于香港而言,澳门及其研究一向未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太多的关注。80年代初,澳门一批有志于研究澳门的学者,开始探讨澳门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问题,并积极推动与广东社会科学界的交流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良性互动,为全方位澳门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大家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如今,澳门在学术界内外都享有更大的知名度,也吸引着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澳门研究中。可以预期,未来几年澳门研究会有新的飞跃。

《学术研究》作为内地一家著名的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对推动澳门研究也不遗余力,开辟“澳门研究”栏目,发表了不少具真知灼见的文章。我们期望,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粤澳两地充分利用地缘优势,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澳门研究,在《学术研究》上亦有更多有关澳门的好文章问世。藉此机会,也代表澳门基金会向《学术研究》诸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载誉中华,任重道远

□吴雁南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所教授)

《学术研究》是面向海内外的广东省社会科学的代表性期刊。40年来,她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结交了许多朋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并以她突出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赞扬,得到国家和有关学术评议机构的充分肯定,当之无愧地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获奖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享誉中华。

我作为她在贵州的读者、朋友和支持者,感到由衷的喜悦。贵州的一位领导同志在贵州社会科学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说:“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比自然科学还重要。”在此,我不想对这位同志的这一学术观点发表评说,不过其中有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即是:要充分重视社会科学及其社会功能。一种正确的理论和思想主张,可以指导我们的建设事业健康而迅速的发展,反之,一种错误的理论和思想主张亦可能造成浩劫、社会的大破坏。《学术研究》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本着从高层次切入实际的原则,着力于组织和发表既有较高学术水平,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文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鸣锣开道。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唯一正确的理论。《学术研究》长期以来结合国情、省情组织和发表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论著,并开辟“邓小平理论”研究专栏,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做了可贵的论述和阐释,又同一些报刊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联合举办“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征文评奖活动。旗帜鲜明,高瞻远瞩,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引人注目。毫不含糊地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作为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期刊,《学术研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容丰富多采,百花争艳,生动活泼。翻开《学术研究》,给人的第一个感受,即是她熔科学性、学术性、思想性为一炉,品味高,质量高,和求索开新的精神,使人体察到学术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和时代精神。这是她的又一特色。

作为省级学术刊物,《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所做出的贡献,是很卓著而突出的,连获各种荣誉。因而人们对她也就寄予更多更大的期望。她的责任将更重大,前途将更广阔远大。可说是任重道远。时代在前进,实际生活在不停地变动,必然不断地呈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要求做出科学的回

答。江泽民同志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报告里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希望《学术研究》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研究,为进一步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做出新贡献。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时代呼唤理论,正确的理论一旦为群众所理解掌握,即会变成不可估量的力量。如何将高层次学术理论研究同提高国民素养、主要是提高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青年的理论素养结合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可否开辟以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青年为对象的“青年园地”栏,并发表这一层次的青年的少量优秀论文。《学术研究》创办至今,已经40年了。现正进入她的壮年时代,将会更有作为地走出她的新路,一往无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争鸣的园地 作者的良友

□刘 嵘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术研究》创办迄今,已有40个年头了。追忆她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体现一种民主、团结的宽松氛围,成为争鸣的园地,作者的良友,硕果累累,而获得多种优秀期刊的荣誉。可喜!可贺!

回想,在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哲学领域、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哲学这一敏感领域,面临错综复杂的情景:既有来自“两个凡是”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潮,又有来自“自由化”、“非毛化”的右的思潮,而且常常交错在一起,一时难以辨析。但是,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学术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体系,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因而,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神武器,进行辨析。在前期,主要刊登批判“两个凡是”的论文;而后期,又着重刊登研究毛泽东思想哲学的文章。拙作《略论毛

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是本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哲学特色和体系公开发表的论文。针对“非毛化”思潮，该文提出：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还总结了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留给了我们一份极为宝贵的理论财富。它发表在《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得到《学术研究》的支持。

难能可贵的，在当时那样复杂的情景下，《学术研究》和哲学学会协作，主动提供了争鸣的园地，围绕着怎样正确理解毛泽东“两变”思想在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在“争鸣”中，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三不主义”，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亦不作任何“结论”，而是通过深入讨论，正确理解毛泽东关于“两变”思想，在全国思想界、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好影响。北京有学者在评价中国哲学界对这场学术讨论时说：“应当指出，在这方面广东理论界的工作比较突出。广东哲学界多次召开过毛泽东‘两变’思想学术讨论会，出版过‘两变’研究的论文集（即《一场哲学论争》，《学术研究》编辑部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学术研究》等杂志发表过多篇研究‘两变’思想的学术论文。”（引自《艰辛探索的哲学轨迹》199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2页）。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哲学，如何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和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反映时代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富有生命力和活力。在198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日子里，我曾应邀为《学术研究》写了《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方法，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一文，认为“运用”是毛泽东思想哲学的特色。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方法，深入

探索面临的新时期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文中还提出：《邓小平文选》为我们如何创造性运用毛泽东思想方法，研究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提供了光辉的典范。此文，后在广东社会科学界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南方日报》略加删节后在显著的版面上发表。没有料想到，这篇论文竟成为我从研究毛泽东思想哲学，发展到研究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一个转折点。1986年《学术研究》还发表了《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访问记。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坚定了我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哲学的决心；促进我能在古稀之年，在这条新路子上不断学习和研究。一直到1997年庆香港回归时，《学术研究》还邀我参加座谈会，发表了《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光辉范例》一文，阐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个光辉范例。

回忆过去，深深感到《学术研究》不愧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阵地，百家争鸣的园地，作者的良友。祝愿《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迎接跨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高潮，作出新的贡献。

对《学术研究》的一点期望

□李锦全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术研究》是我国较早出版的一份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958年创刊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该刊初名《理论与实践》，60年代初改名为《学术研究》，除在“文革”期间停刊外，都是正常运作，按期出版，发表大量文章，对推动和繁荣我省学术研究，起到良好作用，近几年在国内同类刊物中受到好评。

我和《学术研究》打交道比较早，那是参加陈白沙哲学性质的争论。开始是章沛同

志发表文章,坚持白沙哲学是唯物主义。当时我系陈玉森老师和我有不同意见,曾联名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后来也有人陆续加入,双方旗帜鲜明,学术气氛很浓厚。后来谁也没有说服谁,好像不了了之。其实学术问题的争论应该是这样,这才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生动活泼的学术争鸣,我认为是办刊物的优良传统。其实白沙哲学后来在江门的讨论会上仍继续争辩,也可以说至今还是没有结论,但是问题讨论却逐步深入,我认为这是促进学术繁荣发展的正常道路。

“文革”前几年到“文革”期间,由于学术政治不分,和唯心思想必然反动的论调的影响,如对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观点和对孔子思想的评价等问题,不同意见表面上也算是学术讨论,而实质上是带有政治性的思想批判。对这些问题我在《学术研究》上也写过批判文章,其他人写的文章也是一面倒形成“围攻”的局面。我认为这不能怪作者或编辑,这是时代的悲剧;但是如果客观条件改变了,这种历史现象应该可以反思的。

我觉得现在办带有理论宣传性的刊物有个难处,据说学术研讨有自由,但宣传有纪律,但两者的界线不容易划清,这就要看编辑们的分辨能力和水平。我认为牵涉到现实政治及有关方针政策的文章,公开发表是应该慎重,至于对思想文化的争论,以至历史人物评价、学术流派的分疏,是褒是贬,评价高低,像创刊初期对白沙哲学的争论,类似情况不妨多发表些不同见解,对学术发展和繁荣是有好处,这是我对《学术研究》的一点期望。

塞北岭南话文缘

□李炳海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术研究》即将迎来创刊40周年的喜庆日子,而我和《学术研究》的交往也已超过十个年头。我作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学人,不但是她热心的读者,而且有幸成为她的作者,可以说是学术上的缘份。

1985年,全国古代文论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当时我正在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因天时地利之便,也向大会提交了一篇文章,名为《周代的形神观和艺术论》。事情非常凑巧,《学术研究》的编辑先生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他不但仔细阅读拙文,而且还在会议期间约见本人,表示愿在《学术研究》刊发拙文,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这对刚刚进入研究层次的本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喜讯,一个鼓舞,使我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坚定地走到今天。拙文发表在《学术研究》1986年第3期,旋即被本年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第8期复印。拙文是本人早期发表的几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习作之一,因此之故,我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但经常翻阅这本杂志,就连当时惠寄的论文单页至今还保留几份,敝帚自珍之心,在这篇论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后几年,随着自己研究领域的扩大,尽量写一些和岭南文化比较贴近的稿件奉寄于《学术研究》,相继刊发问世。这就是1992年第3期的《雷州半岛的雷神话与东夷文化》、1996年第2期的《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由于本人愚钝,未能给《学术研究》提供力作,但在几年的时间里能有3篇论文在这里刊发,对于我来说却是受益匪浅,得天独厚。

《学术研究》以其学术上的高品位饮誉中外,新时期以来又时有改革举措,使刊物锦上添花,获多种殊荣。《学术研究》所发论文多有精品,本人对此深有体会。即以10年前发表在1986年第3期的曹础基先生大作《以天合天——庄子关于艺术创作的法则》一文而言,其中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对于今天的《庄子》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是对《庄子·达生》篇“入山林,观天性形躯”的精辟辨析,纠正了众多注家的谬误,可谓别具慧眼。类似精品论文经《学术研究》推出的不胜枚举,这也是它能够在学术期刊之林中独领风骚的重要原因。

12年前,我在苦读期间开始了和《学术研究》的交往。我的学术成长历程,有《学术研究》的奖掖之功、提携之劳,而且是为我的

学术研究最早从外部注入动力的几个著名刊物之一。学人的起步犹如火箭升空,最初的助推力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对《学术研究》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今天,我的几位博士生又像我当年一样,正在进行学术上的攀登,本人愿尽绵薄之力,继续和《学术研究》进行愉快的合作;同时我也期待自己的博士生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精品,跨越千山万水,不断开出南北学术交流的直通车。

《学术研究》四十华诞感言

□胡守为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个刊物能有40年的历史,难能可贵。40年来《学术研究》虽经各种波折,仍然坚持下来,什么原因?我认为首先在于这个刊物存在的价值,其价值体现于名副其实的学术研究上。《学术研究》是代表广东学术水平的一个刊物,而广东无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受到国内外瞩目,自然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当然历届编辑的努力,使刊物越办越好,并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功不可没。值此庆祝《学术研究》四十华诞之际,我从一个长期读者的角度,发表一点感想和意见。

《学术研究》是一个由地方出版的综合性刊物,内容包罗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这类刊物似难满足某个专业的读者要求。但综合性刊物也有其优点,是某门专业刊物所不能具备的,这就是它可以将各门类的社会科学以整体面貌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必须树立其核心。核心的取向除正确的指导思想外,还须选择特色。《学术研究》既是广东地方的刊物,可以选择广东为特色,以刊载与广东研究有关的成果为主。

广东地处五岭之南,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所谓岭南文化,至今影响着广东以至广东之外的社会发展。认真探讨岭南文化的内涵,而不是想当然或根据流行的术语对号入座,将会对当前的实际工作大有裨益。比如广东为什么能在两千

多年的时间,从被目为“蛮夷”之地,跃居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其中便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因素起作用,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现在继续运用和记取。又如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全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广东一直保持着高于全国增长的平均水平?广东的文化素质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有什么作用?等等。这里涉及的问题包括人文科学的全部学科,诸如历史、地理、经济、哲学、教育、文学、人类、民俗、语言、艺术、宗教等,既可回顾过去,更应面对现实。如果这些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追求真知,不先有结论再作文章,不纠缠于无谓的争论,这不但会使人们对广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广东问题的决策。

总而言之,《学术研究》能立足广东的特色,引导各学科的学者开展研究,发表其新成果,便能发挥综合性刊物的优势。我说的是以此为主,并非主张其他成果一律不登。这只是一方面的意见而已,仅供参考。

衷心希望《学术研究》在今后的历程中,不断进步,为繁荣学术作出新贡献。

我的良师益友

□张磊

(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社科院院长)

时光流驶,《学术研究》年届不惑。

4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对一个学术刊物说来,却也并非短暂,甚至难能可贵。何况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处于剧变之中,激荡的社会生活当然会在这份刊物的命运和内容中有所反映。《学术研究》的历程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断言,《学术研究》没有愧对时代、社会和社会科学界。

至于《学术研究》和我的关系,可谓久长密切。我于1958年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而作为《学术研究》前身的《理论与实践》刚刚创办。它

的问世,恰与我的研究工作的开端同时。加之,这个刊物当时归属于研究所,后来转隶省社科联仍在一幢楼内共事,所以与我的关系堪称“时相过从”。刊物在60年代后虽经更名、停刊和复办,但同我的关系从未淡化。无论在什么意义上,《学术研究》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学术研究》一直是广东社科界的主要园地,多年来发表过大量论文,涵盖了诸多学科,其中不乏佳作。不少论著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颇获好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刊物对年青的专业工作者多方提掖。发表文章的作者们,相当数量名不见经传。在繁荣社科事业和培育人才方面,《学术研究》功不可没。从20初度到年过花甲,我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和鼓励,无疑是与编辑同志们付出的心血分不开的。至今思之,铭感于心。我的许多同代学人,也大都有着同感。

《学术研究》十分着意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发表文章不拘一格。尽管难免形势的烙印,但还是洋溢着学术民主。这里,仅举一件例证——杨樾同志在1959年前后写了一篇短文——《当心那个一小步》,根据列宁关于真理也不能绝对化的观点提出了“大跃进”的偏激热狂问题。在当时的气氛下发表此文,应是颇为难得的。后来受到了批判,反而显示了作者与编者的清醒。

对于导向问题,刊物——特别是近年来十分重视。双百方针与正确导向乃是相互补充的,二者并非对立。导向体现了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重大政治、理论意义。《学术研究》既发表了许多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好文章,抵制了僵化、教条主义的干扰;也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某些“噪音”,态度非常鲜明。例如,1995年秋就组织和发表了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的讨论文章,发扬了爱国主义,坚守了民族的、人民的立场。至于大量的有关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文章,更是体现了对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这几年来,《学术研究》越办越好,又改版为月刊,受到了社会科学界的普遍赞扬,得到了作者和读者的普遍支持。祝愿《学术

研究》不断踏上新阶梯,为两个文明建设事业多作贡献!

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 开展争鸣

□张江明

(广东省社科联教授)

我是《学术研究》最早的读者和编委之一,曾兼任过社长(1986年1月至1988年2月),向来热心关怀、支持《学术研究》的成长和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在省委领导和共同努力下,《学术研究》连续获得广东省第一、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期刊,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获奖期刊等称号,更使我感到衷心高兴和热诚的祝贺!

《学术研究》的优点和特色很多,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是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学术争鸣。在众多的哲学争鸣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次:一次是对毛泽东提出“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理解。当时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另一种意见是不赞同,认为应是总的质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还有一种意见是两者之间,既有质变,又有量变。《学术研究》持续发表了多篇争鸣文章,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另一次是对毛泽东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应如何从哲学上来认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两变”既是认识论,又是唯物论,是两者的辩证统一;二是认为“两变”只能是认识论,如果又从唯物论上来理解,就会背离和歪曲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争鸣从1978年广东哲学年会开始至1986年连续8年之久。《学术研究》登载了多篇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和研讨会综述,在广东和全国都有较大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作了报道或转载。1982年把双方不同论点编为一本论文集:《一场哲学的论争》,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推动哲学研究起了良好作用。我是赞成第一种观点的,属于“少数派”,前后写了五篇文章,收入《社会

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书。此外,我还写了一本书:《物质变精神 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次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共提出了六七种不同意见,《学术研究》出版了专辑,促进了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学术研究》还有一个优点:敢于登载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学科,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辩证法等一些早期的文章。

理论研究、学术探讨都是需要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不同的理论观点进行商榷、争论、探索,以求得深入和发展的。真理愈辩愈明,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怕争鸣、怕争辩、怕不同意见,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开展学术争鸣不仅不会影响安定团结,而是加强和促进安定团结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我们需要的团结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那种客客气气,不讲原则,表面上似乎很团结,其实是虚伪的暂时的,包藏着很不安定的因素。要开展争鸣,必须解放思想,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学术自由。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发表出来,又要让不同意见进行批评和反批评。即使有些错误,无须大惊小怪,改了就好;就算坚持,可以保留意见,也是容许的。只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就行。

我希望《学术研究》继续发扬和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开展争鸣,选择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或基本理论中一些难点、热点、疑点问题进行学术争鸣和探讨,引导理论研究向深层次发展和进一步提高,对理论建设和实际工作发挥更大作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让史学走出学术界

□张艳国

(《江汉论坛》杂志社副主编)

今年1月,《学术研究》进入不惑之年。

40岁,是成熟的年龄,是丰收的岁月。《学术研究》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开拓进取的雄风、堂堂正正的刊风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并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的殊荣,作为她的读者和作者,十分高兴。在《学术研究》四十华诞之际,谨祝她再创辉煌!

《学术研究》是我国地方社会科学期刊中的一家名刊。在众多的学术期刊中,她不仅能够占一席之地,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编辑们的孜孜追求与默默奉献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她拥有一批风格突出、眼光敏锐、胸襟开阔的编辑家辛勤劳作,才创下了优秀品牌。就史学栏来说,其特点是十分突出的。一是注重学科理论研究,及时反映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受到学术界重视。二是及时反映前沿学科及其课题研究的最新进展,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探讨,该刊是十分注意的,所发文章,转载率很高。三是注重文章的学术性、科学性。《学术研究》所发的一些史学专题论文,学术性很强,质量很高。其中一大部分是首次性探讨的。编者的学术眼光是值得称道的。由于《学术研究》的史学编辑注重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因而他们也团结了一大批学术精英。一份学术期刊,如果没有一支比较稳定的高水平的学术队伍,是不可能创出名优品牌的。作为同行,总结《学术研究》的道路,这是我最深的体会。

时代在发展,科学日益昌明,学术研究也日趋发达。一些新的选题乃至新的发展方向也将被发现,并成为热门话题。作为一份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对此应该有所准备,有所奉献。对于史学研究 with 编辑工作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在为史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而高兴的同时,也为新时期史学所暴露的书斋化趋向深为忧虑。一方面,史学研究的领域朝深度、广度方向拓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史学研究成果(论文、著作)的读者面日益萎缩。历史学只是少数学术精英的专利品吗?史学研究成果只是书斋中的贡品吗?绝不是。历史学是一门社会性很强的学问。要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就应当让

人民群众不断掌握其研究成果。这就为研究者和编辑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不损害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学术水平的前提下,让史学走出学术界,重新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一门学科,而不让它演变为少数知识精英的一种兴趣爱好或精神寄托。我认为,让史学走出学术界,是焕发史学研究的青春与活力的必由之路。

《学术研究》在今后的历程中,为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肩负着重要使命,读者和学术界期待她大有作为。我期望她为史学走出学术界再立新功!

扎根于创造性实践的沃土

□贾春峰

(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员)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的代表性期刊《学术研究》自创刊以来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40年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赢得了全国学术理论界人士的赞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以为,这个风格就是追求卓越,追求创新,追求学术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现实性的统一。作为《学术研究》的热心读者和积极作者,我希望刊物继续保持这个风格,并且在新的实践沃土上发扬光大这个风格。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理论必须倾听实践的呼声。理论工作必须尊重实践的权威。我以为这是我们需要牢牢确立的观念,这也是广东省理论界所以在全国作出突出贡献的重要原因。1988年,广东省经济学界最早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理论,并且出版了专著。自80年代以来,广东省理论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关于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有见解的论著。这是同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内在驱动分不开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学术研究》除立足于社会科学多学科的全面发展外,今后应特别强化对于广东大地上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实践的研究、总结和理论概括,而这种研究、总结和理论

概括对于整个党和国家的理论建设,将作出更大的、实际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举例来说,广东顺德市在企业具体制度、企业运作上就有许多创新,那里讲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还有已经形成和正在发展的家电产业群,就值得从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产品开发的角度加以总结。广东省兴宁市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市委书记曾超麟同志已总结出10种农业产业化的开发形式,从中国山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兴宁的创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这里体现出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一体化”推进的良好势头。我们的学术理论研究应当给这种创造性实践以巨大的理论力量和理论支持。在我看来,在全国同类学术刊物中,《学术研究》是办得最富有新鲜感、可读性最强的刊物之一,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对活生生的新鲜经验的总结。出生于广东新会的梁启超先生,在近百年前所发表的股份经济的文章就是剖析了当时股份公司的状况,今天读来仍有启迪意义。我相信,《学术研究》在已经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在世纪之交,在即将来临的人类的21世纪,一定会立足于创造性实践的沃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对振兴社会科学的全面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议实行精品战略

□梁 钊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由郭沫若题写刊名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她作为广东社会科学界的一块茂盛的园地,扶持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建国以来尽管同许多事业一样,她经历坎坷,但在磨难中不断成长。改革开放以来,她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越办越好。1996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后,内容更加充实,覆盖面更广,成为全国少数几家地方社会科学出月

刊的刊物,成为我省社会科学界普遍关心的、爱护的和感到自豪的一个刊物。

近年来《学术研究》突出了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这个主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从较高层次切入实际”,坚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花大气力扶持精品力作,取得了优异成绩:自1992年起,连续四年,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光明日报》1996年1月7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学术研究》立足广东精品迭出”为题,做了报导。她立足广东,成功地开拓出一条精品迭出之路。

面临世纪之交,鉴于跨世纪的时代需要,鉴于广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处的前沿地位,鉴于省委、省政府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学术研究》的期望和要求以及她所担负的任务,鉴于她已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我建议《学术研究》实行精品战略。把一个刊物的办刊宗旨,提到战略高度有无必要?有。所谓战略是指具有长期性、全局性、指导性的谋略。要真正办好一个刊物,除了人才和必需的物质条件之外,最重要的我想应该有一个能够凝聚和团结广大作者和读者,把刊物办出水平,为广大群众欢迎和热爱的,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实行精品战略的指导思想。办刊实行精品战略,是从现实基础和时代需要,从发展方向上提出来的,并不是要作不适当的拔高,也不是要求每篇文章都达到精品要求。她不但不应忽视青年作者的起步作品,相反应该以更高的热情去关心、扶持、培育青年作者的力作。

实行精品战略的要求主要是: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使之成为办刊的灵魂。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五大的主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东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实践最充分最有力地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南和思想武器,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既要紧密结合实际,深入探讨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研究探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又要着力研究探讨邓小平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牢牢把握住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这个主题,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力求在研究探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上,有新的突破,作出新的贡献。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提倡贴近实际的研究,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倡努力学习追踪国内外先进的学术水平和成就;提倡深入研究、挖掘、宏扬历史悠久有地方特色的岭南文化;提倡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有理有据的学术探讨;提倡深入浅出,文字简洁明了,言之有物,生动活泼,寓意深刻的文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要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坚持以实践检验,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坚持不懈地把反对本本主义和陈腐的传统观念,作为一项长期的办刊任务。

三、总结办刊经验,加强编辑队伍建设。要集中总结立足广东,成功地开拓精品之路的成功经验。要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在选题上下功夫,定期有计划地提供参考选题和交流信息。以学科为中心,加强联系和团结作者队伍,组织全力攻关,既重视老专家的力作,又注重培育中青年专家、学者的新成果。改革办刊体制,建立稳定有效的保障机制,改善办刊的物质条件,避免后顾之忧。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作勤奋严谨,思想敏锐,作风生动活泼,有奉献精神的编辑队伍。

我作为《学术研究》的过来人,在她不惑之年,对她寄以殷切的期望和良好的祝愿!

方向·品位·特色

□梁渭雄

(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本刊社长)

《学术研究》已到了“不惑”之年,这是很

值得庆贺和追忆的事情。

1960年,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成立。那时,我与三位刚在大学毕业的年青人,被组织分配去担任第一代学会秘书,也称学术秘书。

我记得,“报到”不久,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省社科联主席、著名学者杜国庠同志和秘书长聂菊荪同志,就热情地与我们见了面,谈了话。其中,聂菊荪同志具体介绍情况时说到,省社科联主办了一个刊物《理论与实践》(后改名《学术研究》),在我省比较有影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刊物的名字,觉得很新鲜,很有意义。

当时,省社科联机关工作人员还不到10人,分成两摊,一摊是省社科联办公室,一摊是刊物编辑部。我们都挤在越秀北路222号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天天见面,甚是亲热。当时的刊物编辑部负责人杨樾同志对我们这些年青人写作能力的培养更是十分关心。我们学术秘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经常为刊物撰写学术动态。对一些重要动态,他要亲自精心修改。那时候,我主要是为刊物撰写一些教育和哲学学术动态。1963年,我参加了潮汕地区教育调查,提笔撰写了一篇《潮安县江东农业中学毕业生情况调查》,反映比较好。在编辑部同志们的关心下,安排在《学术研究》发表。这是我在《学术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在华师大校刊发表毕业论文后,在省级学术理论刊物第一次发表文章,使我很受鼓舞。

据我所知,刊物创办以来,省委一直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1962年改名为《学术研究》之后,当时的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对办刊的宗旨、方针,都作了明确的指示,而且提出要将《学术研究》每期准备安排发表的文章目录,送给他亲自过目。在我省学术界的共同关心支持和编辑部人员的努力下,《学术研究》是办得比较好的,发表了一些有创见的文章和开展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争鸣,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好景不长,1963年以后,终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引下,刊物逐步改变了初衷,而成为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个阵地,

并被迫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停刊。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原来被摧残得“万马齐喑”的学术理论战线,也开始恢复了生机。随着省社科联恢复活动,《学术研究》也于1978年5月复刊。我也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改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被抽回参加省社科联的恢复活动工作和刊物工作。自此至今,“弹指一挥间”,已过去了整整20年。在这20年间,可以说,我与《学术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当哲学编辑、编辑组组长、编辑部主任到编委、主编、社长,没有离开过刊物了。这20年,是《学术研究》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恢复生机、焕发活力到茁壮成长的好年头,它扎扎实实地为我省的学术理论工作作出了自己新的努力和新的贡献。

复刊后,由于我当哲学编辑,一开始就投入了清算“四人帮”思想理论的斗争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两大任务。我记得,《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专门组织刊发了一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是杨樾同志和我组织我省哲学界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住在白云宾馆一个星期集思广益撰写而成的。由于行动快,效果好,获得了省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性重大决策,面对这样的新情况,《学术研究》及时地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理论工作要把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的重要言论,并组织了学术理论界进行了座谈。此举获得了《光明日报》(第一版)的转载报导,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我也为亲自参与此事和执笔写评论文章感到荣幸。

此后,我还直接组织参与了刊物哲学版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讨论、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等等。1980年7月17日,《人民日报》还以显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学术研究》开展的关于“两变”问题的讨论。这些,活跃了百家争鸣的气氛,为刊物树立了良好形象。1993年,由我主持的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研究课题组撰

写的文章《在改革开放中迈向文明之路》在《学术研究》发表后,被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的优秀文章;1994年,我在《学术研究》发表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基石——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又被省委宣传部评为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优秀文章。这些荣誉,都是与《学术研究》编辑部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近几年来,《学术研究》发表的一些文章,连续四年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文章奖,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还有一大批文章,获得了我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刊物也连续被评为我省和全国的优秀期刊。为广东社会科学界争得了荣誉,作出了贡献。当然,《学术研究》也还存在着不足和问题,需要我们努力克服和改进。

总之,我深深感到,在广大社会科学界的热情关心支持下,《学术研究》之所以取得一些成绩,是与坚持了正确的办刊方针分不开的。我个人认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主要抓住了六个字:“方向、品位、特色”。方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导向,并与贯彻“双百”方针统一起来。品位,就是坚持高品位高质量,即使是刊发的一些密切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文章,也坚持“从高层次切入实际”的方针,使高品位与切入实际统一起来,保证刊物的学术理论水平。特色,就是坚持广东地方特色,立足广东,并与面向全国、面向东南亚、面向世界统一起来。我深信,在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引下,只要继续坚持这“六字”方针,不断解放思想,探索创新,《学术研究》一定会愈办愈好!

自觉肩负起 发展社会科学的历史重任

□章权才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光辉照耀下,在省委省府关怀下,在学术界大力支持下,《学术研究》走过了40

年漫长历程。“四十而不惑”。通过40年办刊,我们的经验教训已积累得够多。这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坚信,往后的岁月,编辑部的步伐一定会迈得更加自信有力,《学术研究》一定能办得更好更出色。

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的各种刊物林林总总,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面孔,都有不同的特点,在精神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中,都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学术研究》也有自身的特点,它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学术理论性刊物,此类刊物对发展社会科学事业,肩负着一一种特殊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科学战线是一条重要战线。1991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科院部分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社会科学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人民日报》1991年2月24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指出:“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们党对社会科学工作所寄予的厚望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任,在这里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办刊物,尤其是办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性刊物,向来有个旗帜问题,有个指导思想问题。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党的十五大,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地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是历史的总结,人民的心声,前进的动力。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办刊,我们的刊物就会方向明确,形象鲜明,越办越旺,越办越好。

办刊物,尤其办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性刊

物,有个时代高度问题。所谓“时代高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时代特征、把握时代精神,明确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并在此基础上,规划我们的工作,指导我们的行动。当今的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大变革时代,正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大振兴、大发展时代。处在这样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任务是十分繁重且十分光荣的,我们要面向现实,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舆论在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刊物无疑应该起到能动和带头作用,我们的刊物无疑应该在高层次上切入社会现实。

办刊物,尤其是办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性刊物,还有个学风问题,有个在学风中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一种是本本出发;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所要提倡的,所要发扬的,就是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为中心,要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以此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过去,《学术研究》所倡导的学风,所发表的重点文章,现实色彩强烈,地方特色突出。许多文章因此得了奖,受过表扬。希望今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风建设方面能够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

我与幼年期的《学术研究》

□ 曾牧野

(《南方经济》杂志社主编)

先说一段历史,用以阐明这个理论期刊诞生的历史背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50年代中期,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我国著名哲学家杜国庠同志,向有关部门倡议在广州地区建立三个学术机构,并顺利得到认可、落实:一是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其任务是除本身开展研究业务外,还筹划、管辖广东和广西两个省区的社科事业(此机构,1957年筹建,1958年正式建立、开展业务,1980年改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是创办一个理论学术期刊,即1958年创建的《理论与实践》双月刊(1962年改称《学术研究》);三是建立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省社联”,1959年筹建,1960年2月正式成立)。

从上述构想、布局,可以看出杜国庠同志是把办好一个理论学术期刊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建国初期,国家很穷,但是广东省党政领导决策机构还是拨出一点钱,在树木葱茏的越秀北盖起一幢四层楼的办公楼,作为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办公所在地。这三个学术机构,都在这里办公。

1959年7月,依据省委宣传部的决定,我到孙孺同志处报到,参加“省社联”的筹建工作。当时,这三个学术机构的实际负责人是孙孺同志。1959年8、9月间,省委派来聂菊荪同志任“省社联”专职秘书长。孙孺同志除主管《理论与实践》杂志外,主要是协助杜国庠同志主持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杜国庠任所长,孙孺担任负责实际工作的唯一副所长),还兼任“省社联”副秘书长。主持《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工作的是杨樾同志。

其次,我想说说我与《学术研究》幼年期的一段工作关系:

1959年7月,组织上调我参与“省社联”的筹建工作,接着又在这个学术机构工作,我是十分高兴的。我自小喜爱社会科学。我想,我来这里工作,一来可以多读点书、写些东西,二来可以为学术界的老专家、朋友们做点服务工作,为党的事业多作奉献。因此,到“社联”工作后,我非常勤奋读书、勤奋工作。大约工作一年后,组织上宣布我与另一位同志担任“省社联办公室负责

人”，同时要协助杨樾同志管好《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参与编辑部的领导业务。具体说来，做了如下的一些工作：

一是，与杨樾同志（有时孙孺同志也参加）研究、提出期刊一定时期（比方说半年或一年）的编辑方针以及应该解决的有关问题，向主编汇报、请示；二是研究、确立每一刊物主要稿件的安排，提出每期稿件“拼盘”的初步设想；三是帮助审阅经济学方面的重要稿件；哲学、历史、教育、文学方面的某些稿件，请“省社联”的哲学学会、历史学会、教育学会等的秘书（他们都集中在“省社联”办公室办公）帮忙审读；四是依据党的中心任务，聂菊荪、孙孺同志经常邀集我们研究、撰写重点文章，例如关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关于人民公社等方面的长篇论文。我与杨樾同志等人为办好刊物而撰写了多篇这样的文章，以“齐思成”等笔名在期刊上发表；五是要我扮演“政委”角色，协助孙孺同志抓好编辑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的《理论与实践》编辑部人手非常缺乏，仅三四个人，而且均非党员，在贯彻、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上带来一定困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孙孺同志要我把与办好期刊有关的党内重要文件的精神，能够公开讲的给编辑部同志“吹吹风”，这件事我按照领导的要求做了；六是与中山大学一名教授、《理论与实践》的另一主编杨荣国联系。聂菊荪、孙孺同志一再强调，办好期刊一定要尊重杨主编的意见，每一期稿件的安排，重要文章的组织撰写及其主要观点都要向他汇报。当时，我年纪尚轻、精力充沛，行动敏捷，我常利用夜晚时间到康乐园去见杨荣国同志，履行此项任务。

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的就是请郭沫若同志给《学术研究》题写刊名。1962年秋天，聂菊荪同志得悉郭沫若同志来广东一行，住在从化温泉宾馆，并通过省委宣传部的联系，同意给《学术研究》题写刊名。聂菊荪、孙孺同志商定后，要我到温泉宾馆完成这一任务。那天下午，我到郭沫若同志的住处，郭的秘书出来见我，说郭老为你们期刊

的题字已写好了，写至六幅，要我带去，挑选满意的。隔天上班时，我把郭老的题字呈交聂菊荪、孙孺同志，大家在“省社联”办公室（亦即《学术研究》的编辑部）的办公台上，端详、品评郭老的书法，都很满意，说写的很飘逸而又苍劲有力。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郭老的题字。

40年来，《学术研究》为培育人才、繁荣社科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的幼年期留下了“左”的舆论痕迹，因为当时我们的党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在政策上也做了一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蠢事，这是应该吸取的深刻的历史教训。

40年过去了，本文提及的杜国庠、孙孺同志，已先后于1961年、1986年病逝；年逾八旬的聂菊荪以及杨樾同志依然健在。不论是逝去的还是健在的，我们都应该怀念、感谢这些社会科学界的前辈，感谢他们为开拓社科事业而洒下辛勤耕耘的汗水，感谢他们为发展社科事业而奠下的根基。

我们是后来者。后来者，应该高高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奋力前行，再创辉煌！

应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

□谢明仁

（前中山市委书记）

许多人问我为何热心支持《学术研究》杂志以及社会科学事业，对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如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社会科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

从理论上讲，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可以引用江泽民总书记的两段话来说明。他于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学者座谈会的讲话时指出：“社会科学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

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指出:“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这里,江总书记把社会科学的作用提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道理最明白不过了。

在实践方面,由于我一直在中山市工作,有相当长的时间担任全市的当家人的角色,处于这样的位置,无疑考虑最多的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把中山市建设好,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制定中山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而在这方面,广东的社会科学专家学者们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他们提出的建议直接影响我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路向的选择。可以肯定地说,中山市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就有社会科学家的功劳。

正是对社会科学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因而我就把支持社会科学事业作为自己的份内事,把它看作是崇高和光荣的。问题的关键是,像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怎样支持社会科学事业,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些便利的条件,具体说就是在许可的前提下给予财力物力的支持。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社会科学事业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其发展服务,从而与社科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学术研究》杂志是广东省社科界的代表性刊物,是广东社科界的一个窗口,所以,当她遇到困难时,我就设法帮助她、支持她。记得在我任中山市委书记期间,每年都应编辑部的要求,解决刊物一期的印刷出版费用,也许这一点帮助算不了什么,只表示我对刊物的一点心意和尽一份微薄之力。

如今,《学术研究》步入“不惑之年”了,愿她在面向新世纪时,更充分地显示出壮年的魅力。

祝贺与期望

□詹伯慧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术研究》创刊40周年了。作为她的忠实读者和作者,在此我要向长期以来默默耕耘在《学术研究》编辑部的朋友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毋庸置疑,《学术研究》是我国资历较深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理论刊物之一,也是众多社会科学刊物中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在我的印象中,除中央办的理论刊物之外,各省(市、自治区)所办的同类理论刊物中,知名度较高的首推上海的《学术月刊》和广东的《学术研究》。40年前广东学术界怀有一股强烈的愿望:争取广东能够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第三个学术中心,而能否把《学术研究》办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这一抱负的条件之一。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研究》的朋友们深知肩负重任,一心总想使刊物越办越好,以不断进步的姿态来回答学术界、社科界的殷切期望。

近20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学术事业蓬勃发展,各门学科万马奔腾,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面对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许多理论课题,又为《学术研究》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作为省社科联主办的刊物,《学术研究》锐意革新,本着勇于开拓,勇于探索,紧密联系社会现实,时刻关注社会热点,使刊物不断充实内容,不断有所创新的方针,克服了经济上的一度困难,在省委领导的关怀和全省社科界同仁的支持下,终于能够在坚持正确理论导向的前提下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屡创佳绩,有口皆碑。特别是最近几年,《学术研究》更是捷报频传:从双月刊到月刊,从封面封底都是广告到彻头彻尾不沾广告的边,一步步地向着高质量高水平的高峰攀登。时至今日,她已是全省优秀期刊的获奖者,也是全国社科获奖的优秀期刊。《学术研究》现在不仅仅是广东社科界的理论阵地和学术园地,也是广东社科界对外展示精

神风貌的一个窗口。《学术研究》的进步和成就,可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东社科界的进步和成就来。

我们从事广东语言研究工作的同仁,对《学术研究》怀有深厚的感情。广东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现象复杂,做好广东的语言研究工作,对于弘扬岭南文化,体现广东特色有着重大的意义。《学术研究》编辑部深明这一道理,多年来对广东语言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发表了不少研究语言问题颇有质量的论文,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省语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就这一点来说,我作为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的会长,也要代表近 300 名会员,向《学术研究》编辑部表示深深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值此《学术研究》创刊 40 周年之际,祝贺之余也要表示一点我们的期望:希望《学术研究》永远紧贴时代的脉搏,坚持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做好突出理论性、突出现实性、突出地方性的文章,在未来的岁月里再创新绩,再立新功,为广东学术界理论界增光。

我对《学术研究》 的回忆与期望

□雷 强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教授)

说起《学术研究》,我认为还应该先讲一下《理论与实践》杂志。好几位曾经当过《理论与实践》及《学术研究》的编辑同志对我说过《理论与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前身。我理解这句话的含义。1958 年 1 月,《理论与实践》出版。它是当时广东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是全省干群理论与政策学习的阵地。它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以密切联系实际,服务于实践为特点。办得很出色,在全国是有影响的。《理论与实践》的领导如孙孺、聂菊荪、杨樾等同志都是些老革命、

老理论家,他们很有领导才干和水平,在他们领导下的编辑部只几个人,多是大学毕业生如黄中一、何国文、黄佑琚、欧宣德等,他们的理论、政策和文字水平都比较高,对文章的要求十分严格,对作者又十分热忱,多方设法、密切联系作者组织好稿子。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当年,我是一个青年教员,我的第一篇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按劳分配理论”是在他们鼓励与帮助下写成的。从这时开始,逐步养成了我结合工作与学习,不时为报刊撰写些理论文章的兴趣和生涯。这是主要的。但是也是从这里开始,我摆脱不了困扰我 30 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研究”。这是次要的。1960 年,省社科联正式成立,《理论与实践》成为它的刊物,为全省社科联服务。

“大跃进”之后,广东省报刊停刊整顿。整顿结束,《理论与实践》于 1962 年 1 月复刊,改名为《学术研究》。它的编辑班子几乎全是《理论与实践》的原班人马。《学术研究》仍是广东省社科联的刊物。在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贯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实践服务观点。只是更加注重从广东实践中总结出广东特点和经验,花大气力抓精品力作。从这个意义来说,《理论与实践》无疑是《学术研究》的前身。《学术研究》的 40 年刊龄当然亦包括《理论与实践》的 4 年刊龄(1958.1—1961.12)在内。

《学术研究》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粉碎“四人帮”后于 1978 年复刊。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焕发青春,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辉煌成就。乘着广东先行一步的新优势,广东广大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总结出许许多多的新经验与新创造,他们的成果,许多刊登在《学术研究》上。经过十多年来的努力,《学术研究》晋身于全省、全国同行优秀期刊的前列。新的成就仍然是凝聚着编辑队伍的精心策划和辛勤劳动。《学术研究》编辑部人员虽然随着时间的转移,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作者,热情帮助作者,千方百计组织好稿子

这种优良传统。与作者建立起互为良师益友的亲密关系是这个编辑部的一个特点。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我和《学术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我虽然写的东西不多,即使写了一点也在匆忙中写成的。但是有的时候开始或偶然想起一些问题,与编辑部同志交换意见,他们总是热情鼓励,继续督促我探索或发展下去的。1982年,我刚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转到港澳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来时,我的第一篇关于香港经济的文章“香港玩具业的发展”也是在《学术研究》编辑部同志的鼓励与帮助下写成并登载在这个刊物上的。并且从此开始了我至今仍在研究香港工业、香港的境内工业与境外工业关系。趁这个机会,我向热情鼓励和帮助我写作和研究的编辑部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虽然他们都很年青(据说平均的编龄已有十年以上)有个别还是我过去的学生,但作为编辑部集体,作为能者为师,在业务上帮助我的,是当之无愧的老师。

作为《学术研究》的老读者、老作者,我衷心祝愿《学术研究》的领导和编辑部同志在迎接21世纪到来的新时期,进一步密切联系实际、联系作者群众,千方百计出精品力作。祝愿《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学术研究》老友的话

□管 林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术研究》创刊以来,我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它不仅给我提供大量的学术信息和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也是我的科研成果发表的重要园地。

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它初创阶段,就开展了学术研讨活动。记得在1964年2月,《学术研究》编辑部与广东语文学会联合邀请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院、广东师院等院校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就文学教学中

的推陈出新问题举行了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推陈出新方针,是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指导下,为改革和发展我国戏曲艺术事业而提出的根本方针,这个方针也适用于整个文艺工作。但是对于文学教学中是否能够体现推陈出新方针,以及如何体现推陈出新方针的问题,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这次出席座谈会的共有13人,大部分是老教师,如黄海章、王起、吴剑青、何爵三、廖子东、陈芦荻等教授,年青教师只有3人,即吴文辉(中大)、黄展人(暨大)和我。当时我们3人正是30岁上下的年纪,参加有这样多老教授的学术研讨会,确实使我们感到荣幸,受到鼓舞。会后,《学术研究》还在1964年第2期上发表了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这次座谈会,虽然是处在极左思潮日益严重的影响下召开,但是一些老教师仍敢于直抒己见,不囿于人云亦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学术研究》编辑部在当时已注意到学术界老中青队伍问题,特别是给我们“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提供发表意见的园地,更是铭记在心,也是要衷心感谢的。

《学术研究》于1978年复刊之后,即发表了我有关讨论文学的“人民性”的文章(《谈谈文学作品的“人民性”》,见1978年第4期,《试论我国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见1980年第4期)。80年代以来,又发表了我的《〈黄公度先生年谱〉质疑》等3篇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与钟贤培、陈新璋合著的《龚自珍研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不久,就发表了孔一青评介该书的文章《〈龚自珍研究〉的三个特点》(见1985年第5期),在充分肯定该书的三大特点之后,也中肯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使我们得到了鼓舞和教益。

现在,《学术研究》已进入“不惑”之年,40年的艰难历程和丰硕成绩,已充分证明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将以更高的水平、更鲜明的特色和崭新的面貌走向21世纪。

编者按:自从党的十四大确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来,作为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它的丰富的内涵,有待于我们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发掘。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具有基础性研究角度的题目。

在20年前关于真理的实践标准大讨论中,小平同志就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段话,高度概括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三者的关系。这三个因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主因,是原动力,没有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发展;而实事求是则是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材料,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涵的改造。毛泽东和邓小平相继以倡导实事求是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在邓小平理论中,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待我们认真学习,以更好地继承和运用这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深刻领会唯物辩证法思想 指导现代化建设实践

——关于十五大报告的哲学思考

□张江明

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充满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思想,从哲学层面认真思考,深刻领会和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思想对于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是非常重要的。

一、十五大报告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集中和概括的体现;同时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辩证地结合起来的统一整体,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他从哲学上阐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认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唯物论就是实事求是

论。邓小平哲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哲学。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注：以下凡是没有注明出处的都引自十五大报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十五大报告的始终和各个方面。十五大报告既是解放思想的报告，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又是实事求是的报告，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辩证唯物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十五大报告的精髓和哲学基础。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集中地表现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等方面。十五大报告突破了对公有制涵义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片面性、形而上学观点，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来确定；突破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单一化、绝对化和“一大二公三纯”的影响，承认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依据，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新的发展；突破了把股份制看作就是私有化的禁区，承认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公司制是资本组织形式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国际经济接轨；突破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禁区，承认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使企业成为盛衰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更大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突破了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仅仅看作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局限，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大和更快的发展，等等。这都是思想大解放，坚持实事求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为指导的认识成果，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二、重视抓矛盾，特别是牢牢抓住主要

矛盾

十五大报告从各个方面关注矛盾，分析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方针和措施。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中，既充分肯定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五年”，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绩，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在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矛盾和困难，工作中也有缺点和不足”，要扎扎实实地予以解决。十五大报告所以再次强调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针对面向改革攻坚，开创新局面，需要“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而重提，以便认清当前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方针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十五大报告阐明，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是个伟大创举，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深化改革，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才能结合得好。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

十五大报告特别强调要牢牢抓住并尽力解决好事物的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和方向，如果主要矛盾抓错了，就要犯根本性的错误，甚至引起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文化大革命”就曾付出过沉痛而巨大的代价。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认识和把握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是一致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三、强调从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根本出发点。有着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理论性。我们要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在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必须排除历史唯心主义的干扰。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既可表现为右，也可表现为“左”。不承认我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的表现。以为不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可以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的表现。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更多的主要表现为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急过渡、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论，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为此一定要明确认识和坚持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客观实际和最重要的立足点。

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是两种不同哲学观点的分歧。列宁认为有两条哲学路线：唯物主义哲学路线是从物到思想，即从实际出发，由实践到认识；唯心主义哲学路线是从思想到物，即从主观愿望出发，从理论到理论。唯物论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

四、用整体性全面性观点、联系发展观点正确处理各种辩证关系

十五大报告分析了各个方面和各种形

式的辩证关系，提出用整体性全面性和联系发展观点来看待，作出正确处理，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活生生体现。有些事从孤立静止的一点来看，不可行，但从整体来看，正是最好办法和最佳方案；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最为有利，但从全局来看，则不能实行，局部要服从全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是孤立地看一个企业、一个部门，而是“就全国而言”的。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各个地方和产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只要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金组织形式，属于中性事物，它的性质，关键是看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不取决数量的多少。高明的企业家总善于以小股控大股东，不是简单地依赖大股东控小股。“国有企业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因此，“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不能以片面性观点来看待。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是个“一”与“多”的辩证关系问题，“一”是指公有制为主体；“多”是指实现形式多样化。“多”是为了增强“一”，发展“一”。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个“一”，越是多样化越有利于“一”。所以，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都可以大胆地利用。要努力寻求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以“一”定“多”，又以“多”促“一”、壮大“一”的辩证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民主和法制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法制是民主的保证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依法治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

犯法与庶民同罪”，任何人不能有超于法律之外或高于法律的特权。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代表和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意见、要求而制定的。所以，遵守法律和遵守党纪是一致的。党的领导干部尤其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奉公守法，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特别重大的责任。十五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它们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辩证结合的。这个基本纲领是总结了我国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概括而成，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和具体化，是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

五、要把量和质统一起来，“以质取胜”

十五大报告以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为对象，对量和质作了全面分析：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不仅要看到它的量，更要重视公有制的质，因为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事物的性质和本质，事物的区别以质为标志，事物的变化以质变为根本变化。江泽民同志说：“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把量和质统一起来。为了提高质，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抓大放小，对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国有经济一定要占支配地位；对其他方面则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

哲学上的质和现实生活中的质虽有区别，但在基本精神上却是一致的。哲学范畴是在实践中把无数具体事物的共性概括起来，又通过多种多样的具体事物的形式而显现。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仅靠数量很不够，必须发展质量好，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浓，价廉物美的名牌产品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才能占领市场。要“坚持以质取胜和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和发展。

质和量有矛盾，又是统一的。它们的统

一使事物处在适度状态，在哲学上叫做“度”。要保持稳定，就需掌握度。不同事物有不同的度，即使同一事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度也有所区别。事物的量发展了，对度的要求也不相同。“过”与“不及”，都不行。超越了度，就会发生质变。量变准备不足，条件尚不具备，就突破了度，进行质变，就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当量变已经成熟，条件充分具备，却不敢进行质变，就会犯保守主义的错误。事物的发展总是经过长期渐进性的量变准备，进入根本性的质变，使事物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已不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对抗，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量变是渐进性，而且质变也具有渐进性的新特点新内容，外部冲突一般上只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才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善于掌握度非常重要，这也是一种领导艺术。十五大报告要求我们，“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正确掌握度来处理稳定和改革、发展的辩证关系，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六、坚持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十五大报告再次提出和肯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是很有现实需要和依据的。我们也应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观点来认识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人道主义有长远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也是个世界性问题。它在中世纪针对不讲人道的“神道”、“皇道”、“霸道”提出来，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马克思吸收它的精华，排除它的糟粕，甚至应用到阶级斗争中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初稿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经写道：“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但“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

级斗争能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过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可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并非水火不相容,也可以采取一定方式结合起来。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出“革命的人道主义”,并应用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来,例如优待俘虏,给伤病员治病等。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不要人道主义,阶级斗争取消人道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986年,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又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既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问题,又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任何伦理道德都有世界观,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世界上没有任何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关的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也没有仅仅限定于伦理道德而与世界观无关的人道主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不同的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这都是很明白的道理,不能用形而上学观来看待,必须“照辩证法办事”。当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超越于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种世界观,而是总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方面。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包括的内容很丰富,

它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主要是尊重人,爱护人,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人的价值和潜能,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的关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统一起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人民谋幸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贡献,使人的价值得以实现。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作了具体阐述:要求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老人,尊敬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老人和残疾人。要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礼貌。要提倡人人爱护公共财物,保护环境和资源,自觉履行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受到危害的时候,要挺身而出,英勇斗争。坚持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或叫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总之,我们从十五大报告的内容和当前各方面工作的情况来看,很需要深刻领会并应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来指导,以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作者张江明,广东省社科联研究员(510050)

责任编辑:冯 生

邓小平哲学的根本点

□ 陈福雄

学术理论界众多论者探讨了邓小平哲学体系的架构、基本思想、特色和贡献,发表了许多有益于学术理论繁荣与社会进步的见解。本文试图探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哲学的根本点或说邓小平哲学理论的灵魂。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时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①由此可见,实践观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是邓小平哲学的根本点。

一、依靠实践和实事求是探究、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转化形态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区别于哲学一般问题的地方,就在于哲学基本问题贯彻于哲学史全过程和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哲学研究对象区别于其它学科研究对象因而规定了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哲学理论发展的方向,哲学家、思想家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要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社会变革者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及其成败得失从不同侧面和程度上反映出变革者哲学观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社会变革者越是自觉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住哲学基本问题,社会变革活动就越反映出它的哲理性和说服力,越能获得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以不同方式关注和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因为,只有自觉地正确地认识和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学术论争中明辨是非、归类辨析、去伪存真,才能在实际斗争中最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去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邓小平依靠实践和实事求是,从思想理论到实际工作多方面去探究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及其转化形态问题,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②恩格斯这段话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概括和表述。首先,这段话指明了哲学基本问题发生、存在和作用的普遍性。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而不是某个阶段的哲学,也不是某一种或两种哲学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古代的,中世纪的,近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哲学,无论是哪个国家、民族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都是基本问题。其次,这段话指明了哲学基本问题被发现和研究特殊性。过去,古希腊哲学家和古代中国哲学家,都未能自觉地意识到哲学基本问题的涵义及意义。中世纪宗教哲学家把神与人的关系,仙界与人间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去考察,显然这是一种虚构和歪曲。近代哲学家,尤其是费尔巴哈,在剖析宗教

的本质时初步揭示了哲学基本问题。费尔巴哈认为,精神对感性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③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比较多地谈到包括布鲁诺·鲍威尔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在内的近代哲学家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立场观点,谈到了哲学基本问题在各式各样哲学家视野里的状况。我们由此发现,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始终以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为基本线索去剖析宗教的本质,这是合乎逻辑的。最后,这段话不仅表明哲学基本问题不同于具体的哲学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如文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而且昭示着哲学基本问题的转化形态问题的多样性。恩格斯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了思维(精神)与存在(物质)的关系问题内含着两层关系,即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

第二性的关系问题,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关系问题。而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关系,又具体展现为有没有同一性、有什么样的同一性、如何达到具体的历史的同一性等三种情况,各种哲学理论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种种关系的回答,都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某种性质和程度的回答。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是多样性的统一的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世界。哲学基本问题的转化形态也是多样的。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从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规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含义,但他们都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探究了哲学基本问题在认识论领域、历史观领域的转化形态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揭示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以及“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路线,强调不能离开实践去“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④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坚持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法,——这是历史观基本问题,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唯心主义社会学。毛泽东探究了哲学基本问题在军事领域的转化形态问题,正确地说明和处理了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军事辩证法。毛泽东还探究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革命的转化形态问题,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论断,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新时期,邓小平探究了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化形态问题,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⑤的新论断。在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闪耀时代特征的邓小平哲学应运而生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概括既是新时期全党

全国人民行动的基本指针,又是邓小平坚持实践观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探索 and 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转化形态问题的科学概括和表述。这个“基本结论”内涵着极其深刻、丰富的哲理,既反映了历史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是现实实践的闪光;既蕴含着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又渗透着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最典型的实事求是的“基本结论”,又是最典型的实践总结。现在看来,我们哲学理论工作者对这个“基本结论”的哲学分析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还需要我们继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更系统地更深入地阐述它。

二、实践观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的哲学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论争中创立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新时期,邓小平坚持实践观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纠正和反对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丰富、发展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实际工作中的恶化、浓化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两种基本形态。教条主义者可以区分为“左”的教条主义——不顾具体国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只言片语或他人的“社会主义模式”,右的教条主义——不顾具体国情,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言论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经验主义者也可以区分为怀旧、思旧经验而无视科学理论及新的实践经验和只相信新的实践经验而一概否定科学理论及以往经验这样两种人。主观随意性、片面性、思想僵化、绝对化就是主观主义的共同的思想特征,其错误认识论根源从哲学理论上说,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违背。邓小平坚持实践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致力于纠正和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过程遇到的主要的思想理论障碍就是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直接目的就是为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水平,以便于取得革命成功。《实践论》创造性坚持科学实践观,全面阐述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及其运动的总规律,深刻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际、轻视实践的错误。《矛盾论》则创造性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系统地展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并且归结为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原理,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割裂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夸大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的错误。“两论”从总体上彻底揭露和驳斥了教条主义者的主观主义。“两论”立足实践贯彻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把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统一起来。“两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形成。毛泽东的“两论”既是同主观主义论争的产物又是纠正、战胜主观主义的尖锐武器。随后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文论,实际上是“两论”哲学思想的展开和具体化,也是批判主观主义的继续和深化。彻底批判主观主义不可能只讲《实践论》而不讲《矛盾论》,或者只讲辩证法不讲实践观点。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两论”,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从哲学观来看,并不是因为他强调全党干部要学用辩证法,而是因为始终一贯地贯彻“两论”哲学思想,群众学哲学被扭曲成只背语录、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生搬硬套到实例中去。采取重大决策如搞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直接违背了实事求是。可见,无论什么人,只要脱离实践、违反辩证法办事,那就难免犯错误,给事业造成损失。1981年3月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建议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⑥其中特别需要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也遇到主观主义的思想障碍。邓小平曾经率领党和人民同主观主义展开了思想理论辩争,亲自发动和展开了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头一次思想解放,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重申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78年12月13日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是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和动员令。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⑦“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⑧同时,邓小平还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争当现代化事业的闯将。这次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第二次思想解放,以邓小平于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为契机,化解思想理论上那个姓社姓资的疑惑。这次,邓小平强调,不争论、看实践,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功过以“三个有利于”标准去衡量、判断。这次思想解放,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有利的精神条件。“两个凡是”和姓社姓资的疑惑,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怪影。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后来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定下了基调,也为往后继续反对主观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这个报告通篇贯串着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观点和不断总结经验、坚持对的改正错的实事求是精神,具有长久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实践观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作作风、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工作

作风、工作方法是一致的。邓小平坚持实践观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于理论和实际工作之中,反复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⑨

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充分体现了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群众是实践主体、认识主体、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为了群众”是工作根本宗旨,它要求工作者的一切决策、行动、目标符合群众利益、群众实践的需要、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需要。“一切依靠群众”是工作的根本条件,它要求工作者尊重和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自己解放自己、发展自己。走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到群众的实践中深入调查研究,把群众实践提出来的意见、建议、方案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方针、政策、决议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已经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决议向群众宣传并付诸群众实际行动的过程。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无限运动发展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识论关于认识运动总规律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和具体化,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制定出来并不断完善的。邓小平说,“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的解释。”^⑩“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⑪“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⑫邓小平于1978年3月18日的讲话曾设想“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⑬后来,经过群众实践,发现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因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基础比较薄弱,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不高。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提出,“从建国起,

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也就是到21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水平。^⑭为此邓小平还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而不是企求一步到位。

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事”和“是”,都是客观存在的,第一性的东西。“求”,是主观认识及其功能,属于第二性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与唯意志论的官僚主义态度和方法是根本对立的。邓小平非常憎恶那种“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的官僚主义者,反对“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的官僚主义作风。^⑮邓小平不仅厌恶那种无视“实事”和“是”、不求“是”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厌恶那种只知个别的、局部的、本位的、小团体的“实事”而不知整体的、全局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大局的实事、片面“求是”不得“是”的不正之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使国家、企业(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发展,水涨船高、各得其所。^⑯实事求是是不等于就事论事,也不等于只关注小事而忘却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更不能只见现象无视本质和规律性。离开辩证思考,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才是实事求是。“一手硬、一手软”、两手不抓、两手软抓都不是实事求是,因为两个文明建设之间有着客观的辩证关系。“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损失和事业失败。^⑰

坚持实践观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一切工作求实效。我国改革开放各项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计划、定指标、立方案、办事情,务求实实在在、效益优先。“讲效益,讲质量”。^⑱为此,“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

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①⑨}求实效必须要落实到具体人、职责、权限、时空规定等方面,方案、措施要“切实可行”。^{②⑩}二是各级用人求实绩。工作能否求实效的关键在于人。要重用德才兼备的人,量才授职,严格考核,奖勤罚懒,“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并且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⑪“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⑫当然,不同层次、岗位的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有差异、实际能力有差异,评价工作者的实绩优劣的标准也要合符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各方处事求真实。一方面,邓小平反对讲空话、假话,主张讲真话办实事,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要掌握分寸,平反冤假错案要符合实际、恰如其分;对“文革”定性“按它的实质分析”,“是什么就是什么”;“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⑬处理现实问题也要恰如其分,“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这个要老老实实在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⑭另一方面,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干部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对外开放,发展交往关系,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⑮所谓“多做实事”,包括对自己方面的要求,“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⑯也包括对发展中外关系的利益要求,“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⑰各个开放项目要使双方的利益互惠互利各得其所。人们常常把求实效、求实绩、求真实和求实惠统称之为“求实”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样概述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应把“求实”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归结为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观是不相容的。实用主义者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用主义者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理。真理是人们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真理表明主观与客观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坚持实践观与实事求是观内在统一的“求实”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承认实践标准为前提,要求在实际工作中立足实践、从实际出发,既唯物又辩证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邓小平的“猫论”不是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对“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的喻义做了哲学改造,不同于实用主义者的定义。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区别是,“猫论”突出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因此同实用主义划清了思想理论界限。至于有的人误解“猫论”,把“猫论”变成没有哲学党性的命题,那就不能责难《邓小平文选》喻义的“猫论”了。改革者明确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清醒的改革者不会、也不应该把“求实”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混同于实用主义。

①①①②④⑧②④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382页、371页、383页、375页、300页、354—355页、295页、326页、33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③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第63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139页、344页。

⑤⑥⑦⑧⑨⑩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3页、303页、143页、143页、45页、145页、85—86页、142页、152页、118页、151页、247页、151页、308页。

作者陈福雄,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冯 生

论邓小平对 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 谭永灼

实事求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创立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遗憾的是,毛泽东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他的晚年却没有把这一思想路线坚持到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更是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受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状态本应得到及时的改变,但其时又有人推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没有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针对“两个凡是”而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重新确立起来的,因此,这一思想路线在它重新确立和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过去的经验总结和新的实践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从而使它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具体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思想路线的丰富发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科学阐明实事求是的理论地位和作用,把实事求是原则提到新的理论高度

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他是考虑到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毛泽东在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之初曾多次谈及列宁的这样一段话,“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与实事求是,从其含义来说,两者是一致的。这表明,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

当初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依据之一。诚然,由于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在其论著中,从总体来说,对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性论述主要还是从认识论的角度。他主要地从客观事物与规律的关系,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从人认识事物、认识真理的过程,去阐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从坚持科学态度和党的优良作风上,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提到新的理论高度。关于实事求是的理论地位,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总是把实事求是放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加以考察,他多次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②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③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④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⑤“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⑥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过程中也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说,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⑦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⑧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进一步把实事求是确定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第一条。

可见,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超出了认识论的范畴,把实事求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出发点、根本点、精髓、核心和活的灵魂;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也不仅仅是有否科学态度和是否坚持优良

作风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提到这样的理论高度去认识,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然,对实事求是的理论地位和作用,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的问题,重要之点在于评价是否科学。我们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上述的评价是恰如其分、非常正确的。从毛泽东思想体系看,毛泽东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十一届六中全会曾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六个组成部分,实事求是贯串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说,离开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就建立不起来;离开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生命力。再从马克思主义体系看,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础,而实事求是正是高度概括、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如前所述,把实事求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精髓和活的灵魂的观点,列宁、毛泽东都曾有过表述,他们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对此未作深入的阐述。邓小平总结历史新经验,从新的理论高度充分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地位、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事求是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新的理论高度科学评价实事求是原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上,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原则理论地位、作用的科学揭示,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其核心理论特征,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正如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揭示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把握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从而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巨大影响一样,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新认识,也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实践上,对实事求是原则的科学评价则更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功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判别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还是形式主义的、假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分水岭。这就为人们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钥匙,为我们党沿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而不迷失方向提供了有力保证。

二、全面概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赋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完整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是在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的。其后,在1936年至1937年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以及1941年至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作了详尽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都作了反复的阐述,但他主要是从人们认识事物、认识真理的过程,从坚持党的优良作风上分别阐述上述观点,还没有把这些观点概括起来系统地表述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主要表述为实事求是。毛泽东以实事求是表述党的思想路线,言简意赅,凸现了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但是也存在局限性。实事求是从其本意上说,它主要是揭示客观事物与规律的关系,表述要从客观事物出发,去寻求事物中固有的规律的思想,但是它不能全面概括人们认识真理、发展真理过程中的一些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在思想路线问题上,就有可能为错误思想的出现留下空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形而上学猖獗;“文化大革命”后又出现“两个凡是”,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竟还要在全国引起争论。这里,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与原来思想路线表述方式的局限性,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首次突破了思想路线原来的表述,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⑨的思想路线。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肯定了邓小平的思想,规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⑩对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和邓小平的表述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为依据,突出了实事求是的核心,同时增添了对认识发展过程的关键性环节概括的内容,从

而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获得了完整的科学理论形态。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思想路线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从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从社会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把它作为思想路线的一项内容，表明了这条路线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是列宁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⑪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路线的根本方法。要从实际出发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需要有理论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但是只有理论而不联系实际，同样不能完成探求客观规律的任务。

“实事求是”，是前述两个基本点的目的和归宿，也是整个思想路线的目的和核心。它表明了这条路线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把思想路线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贯彻到底的根本保证。人们在实践中取得的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必须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才能证实正确的认识，修正错误的认识，同时补充、丰富、发展已有的认识。人们正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邓小平在阐述实践标准的同时，还重申和阐述了生产力标准，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并且以三个“有利于”^⑫展开阐述了生产力标准的丰富内涵，使实践标准在社会发展领域进一步具体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实践标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果的概括，它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克服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影响。

党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为四个基本点。这些基本点各有侧重，又密切联系，相互贯通；实事求是其他基本点的核心，其他基本点则是实事求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和说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这一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各个环节堵塞了滑向唯心论的通道，完整地体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三、正确揭示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为实践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正确方法

实事求是，从其本质来说，它是要求人们敢于破除本本的教条和头脑中经验的框框，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不断取得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因而，解放思想，应是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有关论述，不难看到，毛泽东在其论述中不仅隐含着解放思想的观点，有些论述还把解放思想的观点直接点出来。如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曾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⑬为了争取新的胜利，必须放下思想包袱，“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必须提倡思索”。^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是针对某些人盲目崇拜苏联经验，提出“破除迷信”，“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⑮但是，由于毛泽东论著的针对性所限，他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只是一般性的提出问题，还未明确地揭示两者的内在联系。邓小平在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严重存在的思想僵化现象，鲜明地提出了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作了详细的阐述。

首先，阐明了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首要前提。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阐述集中体现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所作的讲话上。在这篇讲话中，他开宗明义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⑯他认为，过去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迷信、体制不健全以及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不少人思想还很不解放，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而思想僵化、条条框框、随风倒、本本主义等很多怪现象就应运而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⑰这里，邓小平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是一个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它与实事求是主体的精神状态、思想素质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打破精神枷锁，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实事求是才有可能实现。这样，邓小平以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首要前提的论述，深化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思想。

其次，论证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一致性。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对坚持实事求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两者统一是可能的，两者统一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⑮因此,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一样,实质都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⑯他批评那种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的观点,强调“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⑰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被郑重地写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这些思想揭示了:虽然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阐述问题的角度不同,前者强调要打破思想束缚,后者强调要从客观事物出发去寻找规律性的认识,但是两者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指导思想、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致的,它们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着认识的发展。这就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置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理论基础上。

再次,阐明了要正确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发扬民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我国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群众不敢讲话,领导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就追查,那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⑱为此,他提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⑲的思想。对有些人借口解放思想而怀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⑳“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㉑发扬民主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经常强调的老问题,但是把它们与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结合起来展开论述,揭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斗争经验取得的又一新认识。它对我们社会主义实践中排除“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干扰,正确地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我们党在真理标准讨论、获得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后的近20年改革开放中,能够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正确评价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大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正是我们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实践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317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第114页、第67页、第126页、第114页、第143页、第278页、第141页、第143页、第279页、第364页、第364页、第144—145页、第144页、第278—279页、第278页。

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2页。

⑩《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7页。

⑪《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⑫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⑬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第947页、948页。

⑮《毛泽东论思想方法》,红旗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31页。

作者谭永灼,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510053)

责任编辑:冯 生

中国金融资产的

结构相关分析与综合透视

□何五星

一、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结构分析和综合透视

(一)中国金融资产的结构分析

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分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金融资产的主体结构进行分析,即对金融资产总量中政府的资产负债结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个人的金融资产结构和银行的资产结构进行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对金融资产的客体即融资工具结构进行分析,其内容包括非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债权、金融机构对非金融机构债权,以及非金融机构相互持有的债权和股权三方面的结构及其各方面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为了既能说明问题又不至于繁琐,下面采取第二种方法,对我国金融资产总量的结构变化进行简要分析。

从1980年末到1994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亦即融资工具总量)从4764.3亿元增长到93656.0亿元,仅14年时间增长了18.7倍,其速度是迅猛的。同时,从1994年末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融资工具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可以观察到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基本情况。

1、中国金融资产的99.7%为债权,股权仅占0.3%。与其他国家的情形相比,中国的债权比重明显偏高,而股权比重严重不足。例如,1963年美国金融资产总量中约有3/4为债权,1/4为股权;即使西方国家中股票市场最不发达的德国,1987年股权

也占全部金融资产的5%左右。

2、在全部金融资产总量中,由非金融机构持有的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占50.3%,由金融机构持有的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占47.0%,而由非金融机构相互持有的债权和股权仅占2.7%。这就是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的90%以上是由金融机构从社会集中资金并向社会进行融资而形成的,这说明,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形成过程中,亦即在整个社会的融资过程中,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

3、流通中的现金在金融资产总额中占1/13,而在非金融机构拥有的对金融机构债权总额中则占1/6弱。

4、非金融机构以在金融机构存款形式所拥有的金融资产约占金融资产总额的一半,其中3/5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2/5为企业、农村社队、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信托及其他存款。

5、金融机构以对非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形式所拥有的金融资产约占金融资产总额的39%,其中1/2强为流动资金贷款,1/2弱为农业及乡镇企业贷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和其他贷款。

6、尽管从改革初期就开始了政府债券的发行工作,企业债券的发行也已进行了10余年,但至1994年,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债券总额仅占金融资产总额的3.4%,在非金融机构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额中也仅占6.9%,不到1/15。

(二)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综合透视

金融相关率(FIR)是衡量一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程度的主要指标,它是某一时点上现有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之比。一般来讲,用实物资产表示计算困难,同时也不够准确,因此在实际统计计算中,大多是用某一时点末清偿的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GNP)之比来表示 FIR 值(见表 1)。

影响 FIR 的因素很多,一般而言,经济货币化比率、资本形成比率、企业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等与 FIR 的变动呈反向关系。FIR 值越大,说明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就越高,外源融资与直接融资比重就越大,金融活动的规模与能力就越强;相反,若 FIR 值较低,说明经济单位的内部融资比重较大,金融交易范围小,金融发展程度低。

表 1 我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项目 年份	全部金融资产总额 (亿元)	GNP (亿元)	FIR(%) ③=①÷②
1978	3411.9	3588.1	95.1
1979	4005.1	3988.1	100.4
1980	4953.9	447—	110.8
1981	5978.3	4773	125.3
1982	6776.8	5193	130.5
1983	7910.1	5809	136.2
1984	10517.5	6962	151.1
1985	12835	8557.6	149.9
1986	16917.4	9696.3	174.5
1987	21036	11301	186.1
1988	25503	14068	181.3
1989	30205.6	15993	188.9
1990	37787.1	17695	213.5
1991	46929.9	20236	231.9
1992	59962.1	24036	249.5

资料来源:根据 1989、1990、1993 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推算。

由表 1 可以看出,1978 年以来我国的 FIR 值是逐渐提高的,特别是在 1983 年以后加速上升,这一时序与中国金融改革进程基本吻合。1984—1988 年是中国金融改革有实质性推进的时期。中央银行地位的确立、金融机构多样化、金融市场初步发展和贷款规模限制放松都发生在这一时期。1988 年以后中国金融机构格局基本不变,

这时期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债大量发行、政府向银行借款猛增和中央银行资产调整增加。其间 FIR 值有过两次下降,一次是在 1985 年,一次是在 1988 年。这两次 FIR 值的下降都与通货膨胀有关。1984 年一度出现了经济调整增长现象,货币发行过多,其滞后效应导致了 1985 年 FIR 值的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 FIR 与通货膨胀的负相关关系。

下面再把我国 1992 年的 FIR 分解,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见表 2)。

表 2 我国 FIR 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项目 国别	金融资 产总量	银行 资产	政府 债券	企业 债券	股 票	广义货币 (M ₂)
美国	326	95	53	17	49	61.4
日本	392	151	47	17	54	111.7
原西德	294	121	47	41	16	60.8
法国	254	127	20	5	9	51.7
韩国	234	86	6	8	8	39.1
马来西亚	289	94	44	—	52	66.3
巴西	175	53	24	2	24	14.4
印度	114	50	17	2	8	62.6
中国	249.5	102.2	5.3	4.5	0.8	107.6

注:表内数值为各金融资产占当年 GNP 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表内的外国数据取自谢平等著的《中国的金融深化与金融改革》,中国数据是根据 1993 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推算。其中外国为 1988 年数据,中国为 1992 年数据。

由表 2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的 FIR 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 FIR 水平的差距还很大,但与中等发达国家的 FIR 水平接近。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的 FIR 值是很高的。

第二,从银行资产占 GNP 的比重来看,我国该指标高于韩国与马来西亚和印度,与发达国家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 1988 年的该指标水平。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中银行资产占很大比例,二是直接融资工具所负载的金融资产数量极小。再从货币供应量 M₂ 占 GNP 的比重来看,中国也仅比日本低而高于其他国家。M₂ 基本上是银行体系的负债,因为在 M₂ 中储蓄

存款占有较大比重,这一指标高意味着银行负债与国民经济的依存度高。由此可见,我国银行资产与 GNP 的高比重是同 M_2 与 GNP 的高比值相联系的。

第三,我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股票的金融相关比率很低,这一突出特征说明我国的初级证券发行量很少,证券市场很不发达。尽管近年来初级证券尤其是股票发行量增长较快,但其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很小的。因而,从总体上看我国 FIR 值较高,金融资产总量增长较快,但资产结构具有严重的内在缺陷,在二级市场交易的金融资产比重很低,导致金融资产的整体市场化程度与总体流动性都很低,从而影响了不同各类金融资产之间的交换和流动性。

总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FIR 值是逐渐提高的,且目前水平较高,但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上有严重缺陷,金融工具特别是金融市场工具数量少,金融市场客体较为贫乏。这显然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多样化的要求,不利于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

二、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分析和取证透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和贷款发放不仅总量巨大,而且增速远远快于经济增速,并呈现两种明显的趋向,带来两种结果:一方面,货币供给和贷款发放的量以及银行中介机构创造信用的扩张,有力地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已越来越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支撑和强大推动因素,由此带来银行是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引人注目的变量,同时也是牵动宏观经济波动的最直接因素。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只是强烈而迅猛的量的扩张,银行结构与银行制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主要靠银行资产的扩张维系,来自于银行结构和制度变化的贡献份额很少,由此带来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成本”是很高的,“代价”

是较重的。

我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作比较分析。从纵向比较,1978—1991 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_2)年平均增长 23.6%,各类贷款(L)年平均增长 19.3%,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平均增长 8.8%,广义货币供给(M_2)和各类贷款(L)年增长分别高出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增长 14.8 和 10.5 个百分点。特别是 1992—1994 年, M_2 年平均增长 33.2%,L 年平均增长 24.6%,GNP 年平均增长 12.7%, M_2 和 L 年增长分别高出 GNP 年增长 20.5 和 11.9 个百分点。由上不难看出,用超速增长的货币供给和银行资产与负债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从横向对比,1980—1991 年这 11 年间,中国的 M_2 /GNP 值共推进了 52.9 个百分点,保持相当强劲的势头。相比之下,在 1959—1970 年这 11 年间,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 M_2 /GNP 的推进速度分别为 7%、4%、11% 和 15.7%;此 11 年正好处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台湾地区和日本也分别不过 26.27% 和 9.1%。再从 M_2 的增长率相对于 GNP 的增长率的超前值看,在 1978—1994 年间,中国平均超前 16%,而 1960—1983 年间美国、英国、西德和日本的超前值分别为 5.61%、9.35%、6.4% 和 7.71%。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中包含的广义货币推动成分过大。尽管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货币推动总有一个量的界限。经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 M_2 增长率对 GNP 增长率的超前值一般不应超过 10%,否则,则说明经济运行的某些关键环节出了问题。

M_2 /GNP 的上升,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从正常的一面来讲,(1)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经济货币化过程的加快,从而使生产每单位 GNP 所需要的交易媒介(货币)增加。由于经济货币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既包括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也包括货币使用程度的加深,因此,要想精确把握由此引起的对货币量增加的需求是相当困难的。一般估计为满足经

济货币化的需要,每年货币需要增长 2—3%。(2)居民货币余额需求比重的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而由于受消费惯性的影响,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在其他金融资产形式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以现金和存款保存消费后的剩余,是居民最为便利的储蓄方式。这一因素大约需要每年货币量增长 1% 左右。(3)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 and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关系(特别是比价关系)调整过程中,由于存在上调较易而下调较难的问题,因而也需要一定的货币增量支持;而由此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也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因而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因素需要每年货币增长 3—5%。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在 1978—1994 年广义货币(M_2)年均增长率超过 GNP 平均增长率的 15 个百分点中,约有 6—9 个百分点,即 40—60% 是由正常因素引起的,是有利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健康进行的,而其余则是由不正常因素引起的。不正常因素主要是指由于在某些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高速度,而放松对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必要控制,致使投资规模过大,引发货币信贷投放量过多,总需求增长过快,引起物价上涨。这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须注意努力克服的。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可以认为,在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调整增长的时期,货币量的增长

率相当于总体经济增长率的 1 倍,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21 世纪前后,我国货币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两者之比应控制在 2:1 左右;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应保持在 2:1 以下,这个比例是有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健康发展的,而超过这个限度,则是不利的。由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货币化过程等影响货币量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一经验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比较中国及世界各国的 M_2 /GNP 数值可以预期,由于我国经济货币化过程尚未结束等因素的存在,在今后经济的高速成长过程中, M_2 的增长会继续超过 GNP 的增长,从而使 M_2 /GNP 比率进一步上升。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经济结构矛盾的缓解,以及金融资产多元化的形成, M_2 /GNP 上升的势头应该是逐渐减弱,直至较高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同时应该特别强调,增长只是经济量的扩张,发展则是经济质的改变,经济发展本身是由质的改变所引起的量的变化。或者说,经济发展意味着变化与进步,而绝不是原有结构与体制上的数量扩张。因此,进一步深化银行体制改革和提高银行相关经济效益的着眼点,即在于触动支撑银行量扩张的原有制度结构框架,使货币信贷增长建立在一个崭新的银行制度结构之上。

作者何五星,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谭湛明

比较成本理论的数学描述与统一

一个世纪以前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一直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线。但李嘉图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以英国与葡萄牙为例,只是表述了他的比较成本的思想,并没有给比较成本下明确的定义,这使得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解释和说明,这些解说归纳起来有4种,①它们各具特色。然而从整体上看,比较成本理论仍欠系统性。本文给出比较成本一个新的定义,并在此定义下导出几个结论。这种刻划,(1)廓清了比较成

本理论内含的“比较”和“相对”概念,建立了比较成本思想的数学模型;(2)明晰了比较成本思想和绝对成本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3)使国内外关于比较成本的各种解说在新定义之下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这种刻划使比较成本理论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一、比较成本思想的精髓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中,一国对另一国的进出口商品可以根据同种商品的两国成本之比较来决定。如果一国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地低于其他国家,则该商品有绝对优势,那就出口该商品,如果另一种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地高于其他国家,则该商品处于绝对劣势,那就进口该商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商品与其他国家相比,都处于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此时如何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才能从中获得贸易利益,则是绝对成本不能解决的。

事实上,成本之比较可以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横向比较,一种是纵向比较。同种产品两国之间的成本比较可以看作是横向的比较,而一国内两种产品的比较则可以看出是纵向的比较。这样的纵横划分正是站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双边贸易的角度上考虑的。

二、比较成本理论的数学刻划

设S国与T国同时生产A、B两种产品,S国生产一单位A或B产品需要 a_s 或 b_s 人劳动一年,T国生产一单位A或B产品需要 a_T 或 b_T 人劳动一年。

定义1 所谓相对成本(Relative Cost)是指同种产品的本国成本与它国成本之比率。

若记S国A产品的相对成本为 $R_s(A)$,则有 $R_s(A) = a_s/a_T$,类似地有, $R_s(B) = b_s/b_T$ 等等。

显然(1)相对成本是针对一种产品而言的,每种产品都有其相对成本存在。(2)相对成本是一种成本的横向比较。(3)一种产品的相对成本对于不同国家有不同取值。(4)对一国而言,产品的相对成本越低越好。

如果 $R_s(A) < R_T(A)$, 说明 S 国生产 A 产品所耗资源较之 T 国要少, 因此 S 国的 A 产品相对于 T 国具有绝对优势。 R_s 越小, 这种优势越突出。

由此我们看到,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思想正是基于产品的相对成本比较。一国某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低, 那么就on该出口该产品, 而另一种产品的相对成本高, 那么就on该进口该产品, 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便由此产生。但如果一国所有产品的相对成本均低于或均高于另一国, 绝对成本理论对此便无能为力了。解决这一局限性, 必须利用以下概念。

定义 2 所谓比较成本 (Comparison Cost) 是指一国中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之比率。

A 产品对 B 产品的比较成本记作 $C(A/B)$ 。对于不同国家, 同样两种产品的比较成本是不同的。比如 S 国 A 产品对 B 产品的比较成本 $C_s(A/B) = R_s(A)/R_s(B)$, 恰等于 T 国 B 产品对 A 产品的比较成本 ($C_s(A/B) = C_T(B/A)$), 或等于 T 国 A 产品对 B 产品的比较成本之倒数 ($C_s(A/B)C_T(A/B) = 1$)。

在这个定义之下, 比较成本理论的思维模式为:

第一步: 进行横向比较得相对成本 $R_s(A)$ 和 $R_s(B)$ 。 $R_s(A) = a_s/a_T$, $R_s(B) = b_s/b_T$ 。

第二步: 进行纵向比较得比较成本 $C_s(A/B)$ 。 $C_s(A/B) = R_s(A)/R_s(B)$ 。

第三步: 根据比较利益法则寻找比较优势。

三、比较利益法则的数学描述

两国之间产品通过比较成本, 可以判别出哪一国哪一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从而根据自由贸易理论决定贸易格局和贸易走向。根据上述比较成本定义, 易知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判别方法如下:

比较利益法则 如果一国 A 产品对 B 产品的比较成本 $C(A/B) < 1$, 则 A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B 产品具有比较劣势。反之亦

然。

比较优势是相对而言的。这种相对性有两重含义。一是相对于本国另一种产品而言, 如果一国 A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则该国 B 产品就具有比较劣势, 这是因为若 $C(A/B) < 1$, 则有 $C(B/A) = 1/C(A/B) > 1$ 。另一重含义则是相对于与之进行贸易的另一国的同类产品而言, 如果 S 国 A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则 T 国 A 产品就具有比较劣势。这是因为若有 $C_s(A/B) < 1$, 由于 $C_s(A/B) = C_T(B/A)$, 则有 $C_T(A/B) < 1$ 。

这个结论使得我们在利用比较成本思想判别一国产品的优劣势时十分简便。数字 1 就是其界限。如果我们把 $C(A/B)$ 改写为以下形式, 则更易于操作:

$$C(A/B) = R_s(A)/R_s(B) = (a_s/a_T)/(b_s/b_T) = a_sb_T/a_Tb_s。$$

在李嘉图的经典例子中, 假设葡萄牙和英国进行贸易, 葡萄牙生产 1 单位呢绒和酒各需要 90 和 80 人劳动一年, 英国生产一单位呢绒和酒各需要 100 人和 120 人劳动一年:

	呢绒(A)	酒(B)
葡萄牙(S)	90	80
英国(T)	100	120

虽然英国两种产品都处于相对劣势, 但由于 $C_T(A/B) = (100 \times 80)/(90 \times 120) = 0.74 < 1$, 比较而言, 英国呢绒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同理, 虽然葡萄牙两种产品都有相对优势, 但由于 $C_s(A/B) = (90 \times 120)/(100 \times 80) = 1.35 > 1$, 葡萄牙呢绒存在比较劣势。就是说, 葡萄牙生产呢绒的效率不如生产酒的效率高, 宁愿出口酒至英国换取英国呢绒的进口。而英国生产酒的效率不如生产呢绒的效率高, 宁愿出口呢绒至葡萄牙以换回酒, 于是双边贸易便产生了。

比较利益法则有例外, ②当 $C_s(A/B) = 1$ 时, 就是这种例外的情形。多米尼克·萨尔瓦多举例说, 如果在美国每单位劳动小时能生产 6 蒲式耳小麦或 4 码布, 而在英国每单位劳动小时只能生产 3 蒲式耳小麦或 2 码布时, 英国小麦和布的生产效率都恰好是

美国的一半,那英国和美国在两种产品上都没有比较优势,互利性贸易就不会产生。而这种情形恰好就是 $C_s(A/B) = (6 \times 2)/(3 \times 4) = 1$ 的例外情形。 $C_s(A/B) = 1$ 即 $R_s(A) = R_s(B)$,也就是说,如果两国之间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恰好相同,互利性的双边贸易就不会产生。当然这种巧合是很少发生的。

四、国内外关于比较成本的各种解说在此定义下的统一

1、根据上述比较成本之定义,对于S国,当 $C_s(A/B) < 1$,即有 $R_s(A) < R_T(A)$,或 $(a_s/a_T) < (b_s/b_T)$,这就是说,不论在S、T两国生产A、B两产品的实际成本如何,在S国生产A产品的相对成本总是低于生产B产品的相对成本,相对成本越低,该产品的相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越显然,反之亦然。因此,由 $C(A/B) < 1$ 或 $C(A/B) > 1$ 的条件可导出我国范家骧教授之解说。

2、若将 $C_s(A/B)$ 换写为:

$$C_s(A/B) = R_s(A)/R_T(A) = (a_s/a_T) : (b_s/b_T) = (a_s/b_s) : (a_T/b_T)$$

将李嘉图经典例子中的具体数据代入,则对葡萄牙, $C(\text{呢绒/酒}) = (90/80) : (100/120) = (9/8) : (5/6)$,对英国, $C(\text{呢绒/酒}) = (100/120) : (90/80) = (5/6) : (9/8)$,这便导出日本小岛清先生之解说。③而判别 $C(A/B) < 1$ 还是 $C(A/B) > 1$ 要比从两个分数之比值中寻求两个较小数字去判别逻辑上严密得多,操作则更简单些。

3、也可由 $C(A/B)$ 判别产品A和B的相对价格,从而把西方经济学家的相对价格之解说也统一到此定义上来:

相对价格比较法则 若 $C_s(A/B) < 1$,则S国A产品的相对价格较之T国低,B产品的相对价格较之T国高,反之亦然。

当 $C_s(A/B) < 1$ 时, $(a_s/a_T) : (b_s/b_T) < 1$,亦是说S国A产品与B产品的成本比率 a_s/b_s 要比T国两产品的成本比率 a_T/b_T 小。成本比率决定价格比率,在S国便有1单位A产品和1单位B产品价格之比为 a_T/b_T ,即1单位A产品换 $a_s/b_s \times 1$ 单位B产品。而在T国1单位A产品 = $a_s/b_s \times 1$ 单位B

产品。因此,同样1单位A产品,在S国可换到 a_s/b_s 单位的B产品,在T国则可换到 a_T/b_T 单位的B产品,而 $a_s/b_s < a_T/b_T$,所以1单位A产品在S国换到的B产品比在T国换得少,即是说A产品在S国的价格相对T国要低一些,或者说S国A产品的相对价格低。而 $C_T(B/A) = C_s(A/B)$,故 $C_s(A/B) < 1$,即是说B产品在T国的价格相对于S国要低一些,等同于说S国B产品的相对价格比T国高。

而相对价格低的产品具有相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因此,由 $C(A/B) < 1$ 可导出A产品相对价格低从而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前面的判定方法是一致的。

在李嘉图的经典例子中,对于英国, $C(\text{呢绒/酒}) = 0.74 < 1$,所以英国呢绒的相对价格低,酒的相对价格高。事实上,在英国1单位呢绒只能换到 $100/120 = 0.83$ 单位酒,拿到葡萄牙却能换到 $90/80 = 1.125$ 单位酒。对于葡萄牙则相反, $C(\text{呢绒/酒}) = 1.35 > 1$,所以葡萄牙呢绒的相对价格高,酒的相对价格低,在葡萄牙1单位酒只能换到 $80/90 = 0.89$ 单位呢绒,拿到英国却能换到 $120/100 = 1.2$ 单位呢绒。所以葡萄牙愿以酒与英国换呢绒。

4、亦可由 $C(A/B)$ 判别产品的机会成本之大小。

机会成本比较法则 若S国 $C_s(A/B) < 1$,则S国A产品的机会成本小于T国A产品的机会成本,S国的B产品的机会成本大于T国B产品的机会成本。反之亦然。

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多生产某种产品而必须减少的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对于S国,由于A、B产品的成本比率为 a_s/b_s ,1单位A产品的成本 = a_s/b_s 单位B产品的成本,因此在资源一定时,多生产1个单位A产品就相当于必须减少生产 a_s/b_s 个B产品,即S国A产品的机会成本等于 a_s/b_s ,同理,T国A产品的机会成本等于 a_T/b_T 。而 $a_s/b_s < a_T/b_T$ 和 $a_s/b_s > a_T/b_T$ 分别等价于 $C(A/B) < 1$ 和 $C(A/B) > 1$,所以同一产品两国机会成本之大小取决于 $C(A/B) < 1$ 还

是 $C(A/B) > 1$ 。当 $C(A/B) < 1$ ，即有 $a_s/b_s < a_T/b_T$ ，所以 S 国 A 产品的机会成本小于 T 国 A 产品的机会成本。因为 $C_T(B/A) = C_s(A/B) < 1$ ，所以 T 国 B 产品的机会成本小于 S 国 B 产品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小的产品，就是具有相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品，因此，由 $C(A/B) < 1$ 可以导出 A 产品的机会成本小从而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前面的判别方法也是一致的。这样，西方经济学家的机会成本之解说也可以在比较成本的新定义下与前面三种解说统一起来。

五、比较成本思想与绝对成本思想的逻辑关系

(1)如前所述，绝对成本思想是一种单向思维，而比较成本思想是双向思维。

(2)比较成本思想囊括了绝对成本思想。

如果 S 国 A 产品的成本比 T 国低，即 $a_s < a_T$ ，而 B 产品的成本比 T 国高，即 $b_s > b_T$ ，根据绝对成本理论，S 国应该出口 A 产品，进口 B 产品。而这完全可由比较成本理论导出。这是因为此时必有 $a_s b_T < a_T b_s$ ，故 $C_s(A/B) = a_s b_T / a_T b_s < 1$ ，由结论 1，S 国 A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B 产品具有比较劣势。从而按比较成本理论决定的贸易走向与绝对成本之说是一致的。

所以说，绝对成本之说是比较成本理论中的一个特例。比较成本理论推广了绝对成本理论。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比较成本的新定义之下特别清楚。

六、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推广——奥林理论

奥林理论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成本理论，从另一个角度即生产要素禀赋角度说明了决定比较成本差异的因素，但奥林理论并没有离开比较成本理论的分析方法。因此，本文关于比较成本的定义与结论对奥林模式同样适用。

在范家骧教授的例子中，④假定澳大利亚和日本同时生产小麦和纺织品两种产品，这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性在两个国家中是

一样的：生产 1 单位小麦需要 5 单位土地和 1 单位的劳动，生产 1 单位纺织品需要 1 单位土地和 10 单位劳动。但两国的土地要素价格不一样，根据要素价格可以计算出两种产品在两个国家各自不同的成本：

	要素 价格		成 本	
	土地	劳动	小麦	纺织品
澳大利亚	1	2	7	21
日本	4	1	21	14

对于澳大利亚，计算 $C(\text{小麦}/\text{纺织品}) = (7 \times 14) / (21 \times 21) < 1$ ，所以小麦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应出口小麦以换取日本的纺织品。

假定日本的土地价格高涨至每单位 12 日元，其余要素价格不变，则土地价格的改变形成日本产品新的成本：

	小麦	纺织品
澳大利亚	7	21
日本	61	22

虽然日本的两种产品都处于绝对劣势，但通过计算 $C(\text{小麦}/\text{纺织品}) = (61 \times 21) / (7 \times 22) > 1$ 知，日本的纺织品较之小麦具有比较优势，反之，澳大利亚虽然两种产品都处于绝对优势，但纺织品较之小麦具有比较劣势，由此决定贸易走向仍能使双边分享贸易利益。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信手拈来，由此可见，这样定义的比较成本使得我们在考察一国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决定贸易走向时思路格外清晰。

参考文献：

①张二震：《国际贸易政策的研究与比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②(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著：《国际经济学》，张二震 仇向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③(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周宝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④范家骧：《国际贸易理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作者梁 琦，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210093)

责任编辑：谭湛明

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仿真模型 及其建模机理

□ 吴 杰

一、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仿真研究的缺陷与原因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理论领域兴起了以计算机技术模拟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热潮,人们希望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实现合理解释历史事件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如一般均衡理论、非均衡理论、投入产出法应用、经济增长理论、资源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这些模型一般具有如下的特征:(1)功能多样化;(2)结构复杂化;(3)各种不同的经济学流派的方法论相互渗透,产生一些新的综合性方法论体系。然而,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研究仍然是十分初步的。各种巨型计算机模型通常只能对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中的一个或几个小范围的子系统进行讨论,尚不能建立将整个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作为统一整体来讨论的模型;此外,即使在局部问题上的讨论,仿真运算的结果在解释历史事件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时,仍然有许多误差,或没有普遍的适用性。①这种情形,甚至导致了90年代初以来各种新建立的计算机经济模型的规模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显然,这种倾向并不正确。自然科学领域计算机仿真技术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合理的仿真模型必须根据描述对象的内容、结构和性质来建立。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合理的仿真模型不仅要在内容、结构和性质上与仿真对象保持一致,同时在模型的规模上也要有逻辑与控制实现1:1,或接近1:1的比例结构。②这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仿真模型的必备条件。分析

以往各种巨型经济仿真模型,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没有对仿真对象——社会经济大系统——存在的各种最基本和主要的因素,按照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方式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古典经济学从古典哲学中继承下来,同时又是最有价值的经济科学成果之一。而恰好在这一点上,现代经济学却把它抛弃了。它不是从最基本的经济分子构成开始分析,逐级讨论,最后解释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准则和规律,而是企图对经济行为人的最表象的愿望、动机、心理变化等不可捉摸的关系去讨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各种经济行为人只不过是特定的经济范畴或经济规定的人格化,③是一种被经济的一般规定性所支配的东西。④只有理解了一般的规定性才能理解经济行为人的行为,而不是相反。

现在流行的各种经济模型一般都以现代经济为基础理论,由于受到经济理论发展的约束,⑤人们在建模过程中,几乎千篇一律地将某些经济行为人作为构模的基本单元。⑥这是一种因果颠倒的研究方式,当然不能取得成功。

第二,没有对仿真对象——社会经济大系统——存在的各种最基本和主要的因素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分析。一方面,目前各种计算机经济模型只是讨论局部均衡的问题,不能将整个系统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另一方面,在对经济系统的讨论中也有一些结构上的缺漏,其中最受疏忽的问题是对经济元素层次上的各种经济要素,如效用计量、品质计量、价值计量等等问题的讨论。其次在一些复杂的子系统中许多问题也

没有进行有效的讨论。⑦例如金融领域的价格、股票、货币等问题被普遍认为是难以进行有效讨论的。在这些方面,缺陷是明显的。社会经济大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不能想象人们可以在未对整个系统有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以前就可以对某个局部的子系统的机制和特征有完整和正确的认识。在各个子系统间有着互相作用关系的情况下,将其他系统作为外部因素,而单独分析其中一个子系统,在认识上必然会存在片面性,甚至产生许多错误认识。⑧

第三,没有像自然科学的工程仿真模型中普遍运用结构和规则的方式构造模型,⑨而是基本上使用黑盒原理构造各种经验方程来代替真实和科学的仿真方程。⑩因此增加了模型的不确定性。⑪

以上三个问题,是现代各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计算机动态仿真模型中普遍存在的缺陷。不解决这三个问题,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实用性的、功能齐全的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动态仿真模型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笔者在建立这一模型过程中,为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努力,使之得到初步的解决,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经济复杂大系统动态仿真模型(简称 NED—I, 以下相同)。

二、NED—I 模型的内容和结构

NED—I 模型是笔者根据以广义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经济理论体系,运用系统和现代计算机理论,以封闭国家内部的现代市场经济为基本讨论对象而建立的一个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动态仿真模型。目前,它只是第一阶段模型,即理论模型。今后,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第二阶段即现实模型和第三阶段即智能化同步时实仿真模型。

下面,我们以 NED—I 模型来说明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内容和结构的特征。

1、NED—I 模型的内容

NED—I 模型将一个封闭的国家内部的有关市场经济的各种基本经济要素作为主要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经济元素。经济分析的主要对象:主体人、客体有用物、自然需求、自然消费、劳动生产、自然资源、劳动资料。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获得有关财富的最为抽象和一般的规定,包括财富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相应的一般财富,价值、效用、

品质等经济元素的定义。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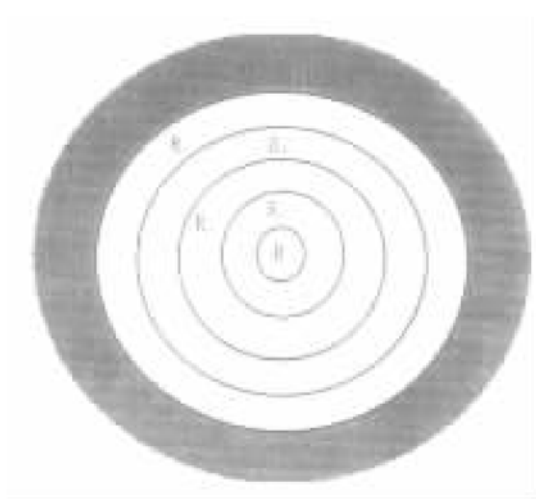
第二层次:经济概念。经济分析的主要对象:特殊效用的商品、特有价格构成的商品、特有品质构成的商品、商品的一般交换形式、商品的所有权关系、商品交换一般过程、商品交换的媒体。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商品、货币、价格等一般经济概念的认识。⑬

第三层次:经济范畴。经济分析的主要对象:企业、行业、股东集团、消费者集团、政府等。⑭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对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股东集团、消费者集团、政府等一般经济范畴的认识。

第四层次:经济子系统。经济分析的主要对象: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对社会经济的物质流网络和信息流网络的认识。

第五层次:经济总系统。经济分析的主要对象:社会经济系统整体。通过分析,可以获得对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全面认识,其中包括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投资者、生产者、管理者、消费者、购买者等经济行为人的行为规则的认识。

将以上 5 个层次的经济因素由 1—5 分别表示为 R_1, R_2, R_3, R_4, R_5 , 则可概括为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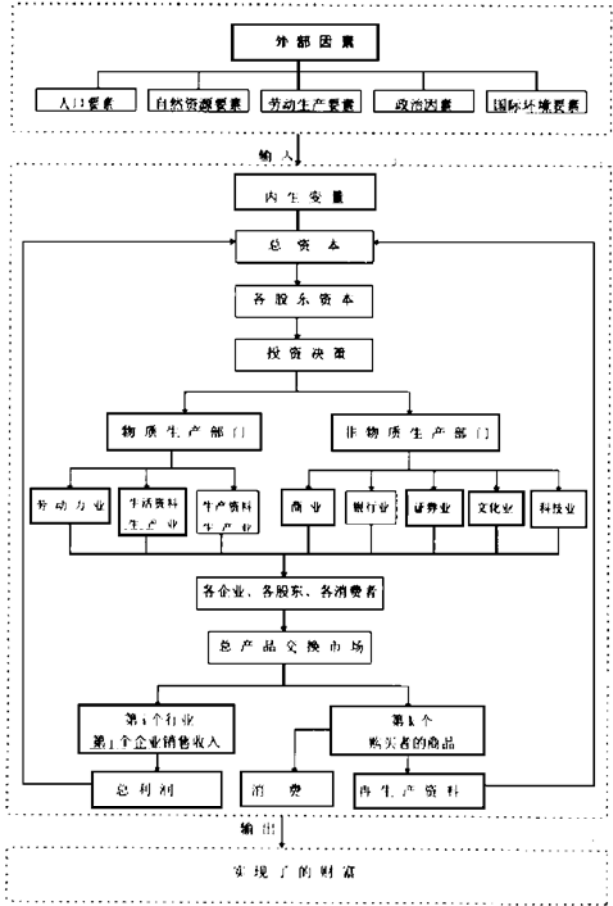
在 NED—I 模型中,由于讨论的是一个假定封闭的国家,因此,外贸和外汇问题只是作为外部的影响因素来考虑。此外,人口因素、政治因素、生产率水平因素、自然环境等因素也作为外部因素来考虑。

2、模型的结构

NED—I 模型的总体结构非常复杂。作最概括性的说明,它是由一个主干循环系统、附加 8 个基本子循环系统、20 个子系统和更下一级的 54 个子系统,通过利润调节和市场交换机制使各种经济

行为有机地组成一个统一体的模型体系。

其总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示简要说明：

(1)主干循环系统从总资本的投入经过投资决策过程、生产过程、市场交换过程和总利润产出过程形成一个主干循环构成。

(2)子循环系统包括劳动力、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商业、银行业、证券业、文化业和科技业。8个子系统只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中的基本子系统。在这一基础上，为了讨论的深化，以及对提高对经济事件模拟的逼真程度，可以进一步细分，例如文化业则可以细分为文化、教育、体育、艺术、娱乐等行业，至于物质生产行业可以细分为2位数乃至6位数的不同的行业等等。细分的程度如何，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以及建模规划的大小。

(3)外部参数是模型的输入，它作为外部的前提条件，作用于系统的内部。

至于模型的输出，则是由生活消费过程导致的一定量的财富的产出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NED—I模型的内容和结构具有系统性、循环性和动态性的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正是一个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内容和结构所具有的。

三、建模的基础理论

要建立一个社会经济大系统的仿真模型，首先要对讨论的对象有一个合理和全面的认识，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完整、系统和正确的经济理论体系作为建模的基础。在过去几百年经济学发展史上，人们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获得了大量的正确认识，提出许多科学的理论结论。对此，笔者在建模过程中也有广泛和充分的利用。这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卡尔·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理论的某些原理、效用学派的效用决定理论的某些观点、货币学派的某些原理、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某些原理、以帕斯卡尔·贝纳西为代表的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关于市场供求不平衡状况下供求由价格和数量同时调节的观点，等等。

但是，对于要建立一个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来说，现有的经济理论，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对经济的第一层次的经济要素的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不够，以及将各个局部经济子系统的行为放在完整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解释的理论分析进行得不够。

古典经济学研究经济的方法主要是古典哲学的逻辑方法。在那里，理论的分析从最基本的经济元素：财富的质和量，即商品的价值、效用和货币等等开始，而后进一步讨论各种由经济元素的规定以及相互作用关系构成的各种经济运动过程的一般关系和范畴，包括财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等。最后，才从中分析和推导出一般的经济行为人的活动的各种特征和一般规律。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中，无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还是卡尔·马克思，他们的著作都具有较完美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论上述的各个经济学者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认识和观点有多大的差异，他们在继承古典哲学逻辑体系理论结构的优点上则几乎是一致的。这是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但也有严重的缺陷。第一，忽略了对效用的深入讨论。没有从自然人与自然环境的一般关系中抽象出效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并在这一基础上合理和科学地解决效用的计量问题。第二，由于他们沿用的是古典哲学的逻辑方法，这种方法对讨论定性和静态的问题有效，而不

利于讨论定量和动态的问题。^⑮所以他们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静态和定性讨论的基础上。因此,古典经济学在进一步发展进入特别强调动态和定量分析的微观经济学领域时,便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变得无效和混乱了。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开始就充满了实用主义。他们并不乐于继承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结构,从经济的元素分析开始去建立他们的理论大厦。相反,一开始便从各种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分析开始,热衷于分析各种经济行为人:投资者、购买者、销售者、乃至消费者的心理、动机。并从这些分析开始,建立他们的理论逻辑体系。这种头足倒置的研究方法简便易行,往往能够有很好的短期效应,取得许多局部的研究成果。包括凯恩斯对货币各种功能作用的务实性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派对市场交换机制的研究,对交换成本的贡献的研究,里昂惕夫的对产业相关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使得经济学对局部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和精确。此外,对局部和微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得现代经济学必须大量引进现代数学理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这些方法的引进克服了古典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得经济学可以非常灵活使用动态和定量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和推论。在这些方面,经济学的进步是明显的。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研究方法,通常存在一个共同的弊病,即无法用严谨的理论逻辑将各个局部研究成果统一起来,不同的研究成果通常不是毫不相干,就是充满矛盾。从理论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看,现代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大退步。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对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起古典经济学来说是更为疏忽了。除了边际效用理论还可以算是经济元素层次的理论讨论以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而即使是作为唯一支柱的边际效用理论,其内部也存在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未能解决,最典型的例子是效用量的计量问题。至今为止,边际效用理论仍然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⑯以致效用无法精确计量的观点仍然在经济理论界广为流传。^⑰

怎样才能继承古典经济学的近乎完美的经济理论逻辑体系,吸取现代经济学的局部和微观经济学成果,以及补充以往经济学遗漏的领域的理论研究,并更进一步从整个系统的角度上运用现代数学理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方法研究动态系统的各种

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经济问题,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建立科学和合理的社会经济大系统动态仿真模型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笔者一直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理论体系,^⑱并以此作为建模的基础理论。

我的理论讨论首先从适合于人类一切历史阶段上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最为一般和抽象的经济规定性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讨论从分析人类社会一切历史阶段上都共有的财富的概念中最抽象和最一般的规定性,即财富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开始。这些规定性存在的基础,是人作为自然人在其生存过程中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必须对各种相关的因素,包括一般物质、人、外界物、人的需求、人的消费、有用物等进行深入和系统的讨论。这些讨论使得我对财富的质和量的一般规定性有了初步的认识。

当我们完成了对财富的质和量的一般规定的说明,则可以从这些规定出发讨论各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特殊的社会财富存在的质和量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这些财富形式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形态和特定的经济运动规律。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现代市场经济。财富的特殊表现形态是商品。个人作为商品的所有者,首先表现为彼此利益对立的个人。为了追求个人最大财富量,经济行为人一方面要通过提高生产率而进行分工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因而使社会生产体系划分为各个不同的行业。独立个人的资本无论具有多大的量,作为产业资本,它们最终总是要表现为特定行业的行业资本,并因此而具有不同质的效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财富的质的第二规定,即财富的系统构成,使之由一般的外在物转化为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有用物,人们就必须交换其各自拥有的产品。使个人拥有的产品最终构成一个具有各种不同质的效用的,即满足财富的质的规定性的财富体。而要实现上述两个基本经济目标。利益彼此对立的经济行为人必须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遵守一些对彼此均有约束力以及使其利益的最大实现有限制的经济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财富具有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性的原则、财富存在动态性原则、产品生产满足效用构成的原则、交换双方利益共同增加的原则、财富的信息符号——货币——具有与其代表的财富量等值的原则,也就是说,商品的价格相等即等

值的原则,等等。一旦个人普遍地按照上述的种种经济原则进行经济活动时,个人就完成了向经济行为人的转化,在各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经济行为人的参与下,社会就会进入有秩序的市场交易活动的过程,因而也就会存在一般的经济规律,包括市场利润的规律、均衡的相对性与非均衡的绝对性同时存在的规律、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等等。揭示这些经济规律的存在,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然而经济规律的最终揭示却只能建立在对经济基本要素、基本规定以及经济结构、相关关系进行大量的基础性的分析,并从而获得正确认识的前提下。

迄今为止,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科学,特别是对自然科学来说,仍然是一门十分不成熟的科学。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对象是一个社会的复杂巨系统,该系统中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物质要素包括资源、环境、劳动生产资料等等,这些各种各样性质的因素以错综复杂关系构成一个综合性的巨系统,使得人们研究和认识这一系统,不仅要有十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要耗费极其艰巨的劳动,为此使得研究有极大的难度。另一方面,经济学以往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水平,导致经济学研究领域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理论的实验室,这也增加经济学研究的困难程度,因为没有实验室就无法精确和可靠地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性,使得经济学研究耗费了大量时间在不同学派之间的文字争论上。这种情形在自然科学上较为少见。因此,尽管我们目前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动态仿真理论模型的实用性仍然不是很强,但是,仅就它能够具有建立经济理论的实验室这一功能来说,它的意义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要实现经济仿真系统的实用性,即能够通过模型本身的运行解释历史、现在和将来,建立现实型的经济仿真模型是必不可少的。从目前我们建立理论经济系统仿真模型积累的经验看,建模的工作虽然比理论模型建模工作量要大得多,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有限的工作。特别是当理论模型完成以后,大量的工作可以通过子系统的复制来完成。真正困难在于要从现有的国家统计系统中获得足够的和真实的数据。由于目前我使用的建模的理论的特点,有不少数据在现有的统计系统——至少在中国目前的统计系统——中是不能直接提供的。通

过人为处理或推测出来的数据往往有较大的误差率。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和统计部门的配合,这显然是一件涉及面极广,而且困难极多的事情。

实用型的国家经济仿真模型可以扩大为国际模型和世界模型。模型将增加对外贸易、货币汇率、移民等问题的子系统。由于涉及到复杂的国际关系,建立国际模型或世界模型的困难就更多了。

在我看来,社会经济动态仿真模型的最完美的形式是可视化、智能化、多功能的同步时实仿真系统。模型的运行与实际社会经济生活同步进行,人们可以随时就普遍关心的问题向模型提出咨询,模型能够迅速地对这些问题作出准确的解释和回答。建立智能化多功能的时实仿真系统的真正困难在于要有一个能够与实际经济生活同步的、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无一遗漏的、能准确和迅速收集社会信息的系统。这不仅要有巨大的社会投资,同时还很可能涉及许多与现存社会道德标准、法律系统相冲突的问题。尽管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笔者仍然大胆地预言:在未来 20 年以内,建立可视化、智能化、多功能时实仿真社会经济大系统将会作为一个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摆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①一般复杂大系统的困难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主动性、不确定性、维数灾、发展中系统、分散化等。(涂序彦《大系统控制论》4—5 页)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一般复杂大系统的研究工作,社会经济系统也是复杂大系统,在存在问题方面的表现形式是大同小异。

②参看《秦山 300MW 核电机组全范围仿真机技术总结报告》第二部分 1 页,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珠海)有限公司,1995 年。

③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论》一卷第一版序言 12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这种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⑤阿弗里德·马歇尔说:“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 34 页,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马歇尔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仍占主流的地位。

⑥无论在可计量一般均衡模型(CGE)中,(汤敏·茅于軾《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110页)在一般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中,(J·W·福雷斯特《工业动力学》中国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79—82页)还是处于原型阶段上的雄心勃勃的“阿斯彭”系统。(《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3月31日刊,亚洲版)均是将生产者、消费者、商店、银行、政府等经济的最高层次上的因素作为讨论的最初对象,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去构造他们的模型。在这一方面,杰拉德·德布鲁也许会好一些,在他著名的《价值理论》一书的数学模型中,分析是从商品和价格开始的。至于更下一层的经济元素的分析仍然被疏忽。这种疏忽的直接结果是:模型中的价格是外生的。(《价值理论》42页)这种构模的理论逻辑方法,很难令人满意,作者注。

⑦迄今为止,萨缪尔森在1957年所说话仍然有效:“我们的确没有完全合适的,可将货币经济基础囊括在内的理论体系。”(沈华嵩《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⑧华盛顿大学教授芭芭拉·R·伯格曼说:“通过分析大量宏观经济数据而做出预测的当前计算机模型的种种假定都是‘不真实和妄想’。”(《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3月31日刊,亚洲版)

⑨强调结构的重要性,是系统动力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模型结构与讨论对象的实际结构往往不一致,又是目前流行的各种系统动力学经济模型的共有的一个缺陷。(福来斯特《工业动力学》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102页)

⑩某些经济学者甚至认为用黑盒原理构造模型是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仿真模型的固有特征。(王正中、屠仁寿等《现代计算机仿真技术及其应用》4页)

⑪更多的经济学者则已清楚意识到,滥用“黑盒原理”构模“是系统动力学模型至今推广不开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也是影响系统动力学学科发展和存亡的根本问题。”(郭庆才等《现实性均衡增长》27—28页)

⑫关于上述经济元素定义的进一步的说明,见本文第三部分:建模的基础理论。

⑬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经济学,其中特别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这一方面经济概念的分析进行的最为全面和科学。

⑭在我们建立的NED—I模型中企业54个,行业17个,股东集团20个,政府职能部门三个,上述各个机构同时又是不同的消费者集团。

⑮瓦西里·里昂惕夫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他曾自豪地说:“我所谈论的并不是什么新题目,弗朗索瓦·奎奈的‘生产性预支’、卡尔·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等都含有动态陈推导所容纳的基本理论概念。但是这些大经济学家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的文字描述与演绎推理,我们却可以测量可以计算。”(《经济学论文集》68页)

⑯捷·丁伯根在他的建模过程中,无法回避效用量的计量问题,因此,他不得不对效用量的“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进行了泛泛的讨论。但他同时也清楚的意识到,理论的研究至少到他为止,“实际上不(仍然还?)存在一个自然的、广为接受的衡量尺度。”以实现效用量的计量。(捷·丁伯根《生产、收入和福利》120—128页)

⑰在对财富量的直接计量没有解决之前,边际主义的计量方法作为一种代用品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但是当科学的计量方法产生之后,那种建立在“理论上假设概念角度量”。(罗纳德·G·伯德金,劳伦斯·R·克莱因,肯塔·玛瓦《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史》,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将失去其存在意义,作者注。

⑱关于这一新的经济理论的详细说明,我将在已完成初稿,约100万字的理论著作——《财富论》——一书修改定稿,并正式出版时实现。在这里,我只能将某些相关的观点作简单的介绍。

作者吴杰,广东国际信托公司深圳分公司(510098)

责任编辑:谭湛明

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

□周 毅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正悄然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和亚太地区转移,处在亚太地区并具有 12 亿人口的中国,经过近 20 年卓有成效的改革,经济取得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正处在经济体制加速转轨和社会结构迅猛转型时期。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一场极其复杂、丰富深刻、艰苦卓绝的革命,不仅是单一的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过程,而且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自身发展三位一体、和谐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过程,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整体发展过程。可持续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基本国情。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差异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以来,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比近 20 年前进步和富裕得多。但不可否认,在转型期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呈现显著差异性,绝对差距不断扩大,贫困地区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严峻挑战,引起社会各层忧虑。国外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特别提醒中国政府小心对待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教授和赫伯特·西蒙研究员认为,中国应吸取墨西哥忽视分配均等问题导致吉巴斯地区起义的教训。来自汉堡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内地不稳定因素说明,中国必须改变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政策,以防止突发事件和因社会变革运动高涨造成的危机。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南亮进认为,分配过分失衡的确是个必须警惕的危险

倾向,日本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一针见血:中国面临人口爆炸和贫富悬殊两大难题。我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出乱子。江泽民在很多场合都重申邓小平观点:如果搞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区域矛盾都会扩大,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要认真对待,逐步妥善加以解决。李鹏指出:中央时刻关注东西部差距这个大问题。朱镕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中央将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力度和开发速度。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分析道:贫富和地区差距超过一定限度后,一方面要产生对环境、生态等各方面影响;另一方面更严重的产生不稳定。在各种市场经济成分与日俱增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生态文明衰落、贫富悬殊拉大、资源分配失衡、人伦品味下滑等社会负面。不应回避正在滋生、蔓延某些严重贫困问题所造成的惨痛代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复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畸形社会现象。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贫富不均和贫困加剧现实,有一点应当成为共识,这就是,必须遵循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其付诸实践,强化贫困乱国亡国意识。①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反贫困课题是:如何借鉴西方反贫困经验,根据国情国策,总结中国反贫困教训,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市场经济对消除贫困的利弊。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反贫困。谁来保护穷人利益?怎样平衡宏观利益结构?当这种平衡越来越不会自发进行,而需采取一系列逆市场规则举措的时候,以损失社会发展效率为条件,还是在保证效率条件下树立同甘共苦意识,促使市场、法制、政府各宏

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

1、随利益结构转变扶贫方式

利益是发展的杠杆,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基础。伴随着利益结构方面的变化,农村利益主体分散化,从单一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转变为多元体制并存的复杂关系,逐步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从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新的问题,例如宏观利益主体的转换,收入差距及其心理承受力,既得利益公平性和合法性问题。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在演绎着宏观格局一致的分化过程。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比如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占有双重利益;一方面,可以作为贫困区域利益的代表争取外部扶贫投入,在财政比例分成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地方贫困总是被扩大为区域整体问题,成为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在分配所争取到的资金和资源时,贫困又往往被处理为区域内部的局部问题,排在投资序列的后面。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和“偷换概念”或“偷换利益主体”的行为,不利于贫困问题的缓解。②为此,扶贫工作必须发生深刻的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扶贫转变,由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③

2、在协调发展区域经中反贫困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既要符合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演进的大趋势,又要适应地区经济的特点,还要反映经济体制转换的要求。④其原则是三方面的统一。

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国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极多,农村人口比重大,资本短缺,仅走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体化路子不够,至少进程过于漫长,不足以较快促进农村经济振兴和城乡差别缩小。在中国缩小城乡差别的主要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的全面扩张即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不少发达地区(浙江、广东)正是通过这条路子使农村经济得到振兴。从这个角度看,在加强农业基础的条件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非农产业比重,就地吸纳尽可能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收入水平,是促进区域经济

反贫困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

讲究实际,发挥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贫困地区虽然在资本供给、生产技术、人才资源、交通运输以及服务设施等方面条件较差,但在自然资源、劳动成本等方面有相对优势,通过利用这些优势有效配置资源,如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可使经济较快发展。就贫困地区乡镇企业来说,由于人才缺乏、技术装备差和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或质量水平与发达地区企业相比普遍处于劣势,但各种产品相对差距不一样,仍可发挥比较成本或比较质量的相对优势,较多地生产成本相对少或质量相对高的产品,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使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从而取得较多利益。而发达地区的企业则可以较多地生产成本相对更低或质量相对更高的产品。可在不牺牲城市或发达地区利益的前提下,提高贫困地区的产出率和收益率。因此,通过发达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的协调变动,特别是在发挥贫困地区相对优势条件下更有效地配置地区资源,是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原则。⑤

扩大开放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市场机制有效作用不仅取决于市场体系完善,而且取决于全国城乡统一市场形成。地区封锁和城乡割据对市场体制有效调节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造成了严重阻碍,使落后状态相对凝固化和长期化。贫困地区落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人才、缺技术。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在城乡和区际开放之初,人才会从乡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但一旦城市或发达地区的人才趋于饱和,竞争趋于激烈。同时乡村或贫困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就会出现人才倒流。这在我国已有所萌芽,近几年不少乡镇企业以优惠待遇招聘城市科技人才或吸引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就可以证明。相应地,技术也会随之向不发达地区流动。乡镇企业不断购买新技术和专利,雇请“星期天工程师”和兼职技术顾问的行为则加速了上述进程。如果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资本也会逐渐向乡村回流(股份制

发展为此提供了方便的筹资渠道),为乡村和贫困地区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⑥

3、在加快缩小城乡差距中反贫困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由多方面因素构成,从内在发展过程看,基本分为两大关系:一是各产业、社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二是各经济、社会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城乡之间和社会发展关系,属于区域发展关系范畴。但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区域,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上,明显不同于一般区域和区域关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城乡经济和社会形成了二元结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既摩擦对立,又协调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把握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立,促进其协调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是条龙,头在沿海,尾在内地。沿海与内地主要是城乡关系、贫富关系。龙头抬一抬,龙尾翘上来,龙头龙尾之间是一种生产关系。头抬多高,尾翘多高,都与治贫治本可持续发展有关。有首歌谣流行:“市民笑,农民跳;农民笑,市民跳。”这是城乡矛盾、工农差别的反映,谷贱伤农,谷贵伤工。转型期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处在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人均GDP绝对差距迅速扩大阶段,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总体局势不可能出现缩小迹象。造成差距扩大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贫困问题未彻底解决,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强相关性。过去经济建设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在低收入水平下维持高积累;人为压低工资和其它工业成本水平;压低作为食品和大部分轻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价格,国家对农产品低价统购和低价统销,是整个计划经济基石。当农村改革向市场化挺进时,原有体制连同宏观平衡机制就从根基上被动摇。但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在改革某些方面落后于非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工商业根本不可能消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因此,应当寻求在城乡改革

不同步的现实约束下,把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放在优先地位。农民利益与宏观稳定之间,在长期中的一致性和短期内的矛盾性,是转型期一系列两难决策问题的根源。⑦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加快富裕。工业化初期需要农业为工业作贡献,但不能长期置农民和农村利益于不顾。在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并有能力实行自身积累后,应让农村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留在农村,给农业造成宽松的发展环境。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是:如何在工业化过程中防止农业萎缩,不断创造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环境;正确调整工农业发展关系,做到工农业等价交换,并逐步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变。

4、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反贫困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为买而卖”的一次性交易或“为卖而买”的小商品交换,而是国际化、法制化、信息化的高层次的大市场经济。⑧现代市场经济对社会作用力之大前所未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创造出的优秀文化,从文化角度作用于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是多维的。具体有八:加速社会流动;转换社会角色;完善社会关系;强化社会控制;重组社会分层;更新社会规范;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发展。⑨政府职能是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体系,政府正当干预是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排除市场经济作用,恰恰要重视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增强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扩散效应”,利用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的有利方面。其一,应促进资本向贫困农村流动。一个突出的矛盾是,资金稀缺与劳动力剩余。缺乏资金,剩余劳动力成为巨大浪费、社会包袱。如果能够流入资金,与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经济财富。为了提高贫困地区对资本的吸引力,政府一方面要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包括扫除市场进入障碍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二,应促进信息向农村贫困地区传播。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各类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它

可以跨越区域与地理的障碍促进交流,降低贫困地区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利用能力。政府通过建立通讯设施、广播电视、情报机构、信息咨询业,促进发达与贫困地区的信息交流及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其三,应促进技术向农村贫困地区转移、扩散。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村贫困地区从国外或发达地区获得实用性技术,通过推广大大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四,应促进生产资料城乡地区间流动。中央政府应严禁各地方设立贸易壁垒,建立一流的国内市场,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间合理分工,改变发达与贫困地区的不等价交换关系,促进各类生产资料在地区间流动。其五,应促进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流动、转移。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本地劳动力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条件。关键是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建立协作关系,有步骤、有组织地培训劳动力,建立劳动力市场,开展就业竞争,取消对外地居民任用的歧视性土政策。^⑩

5、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中反贫困

改革前,中国处在贫困和均等化的分配格局下,分配矛盾并不突出。在转型期,人们对公平的关注和评价的普遍性相当突出。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分配来刺激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以达到生产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调节。转型期利益分化比较快,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相当严重。如何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中减少贫困和防止新贫困出现,成为转型期实施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⑪

调整宏观控制的体制目标。平衡利益结构需以不损失社会发展效率为条件,解决公平分配问题,建立利益共同、风险共担意识,研究和制定市场、法制、政府各宏观调控部分的协调配合和配套政策。政府及时转换角色,调整功能,使社会发展进程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将是一个关键。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国家应当转换宏观调控方式。逐步退出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重点转向宏观经济政策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领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政府和市

场职能分开,市场按照价值规律和效率原则调节初次分配,保证效率导向的利益格局。政府按照公平原则调节再分配,缓解和解决地区、产业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公,保证公平导向的利益格局。

不同利益主体应有区别地承担改革成本。利益主体多元化使改革和扶贫具有内在动力,由于社会控制、市场规范、政府能力严重滞后,社会整合速度跟不上利益分化速度,存在少数人独占改革收益,而把改革成本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贫困农民的可能。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则,是向富裕阶层征税,以保持改革收益和成本一致。

开发经济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机会。贫困地区都是农业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土地生产力极低。人口不断增加使人均资源占有量越来越小,劳动力过剩问题极为严重。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严重限制了加工业发展,地区经济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10%,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中90%以上来自农业生产活动。这种人口资源、经济结构格局,一方面使贫困人口处于饥寒交迫的困苦境地;另一方面又使贫困人口的劳动力资源大量浪费。与此同时,由于缺少适用技术和启动资金,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丰富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利用,形成令人吃惊的“富饶的贫困”。因此,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生产力,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加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成了反贫困的主要任务之一。

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贫困人口的竞争能力。贫困人口由于低下的收入水平使他们处于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不佳状态,加之缺医少药,往往疾病缠身。低收入也使他们无钱上学、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程度低,接受和掌握新观念和新技能能力差。劳动生产率,缺乏竞争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能力。要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机会,就必须改善他们的健康状态,提高生产技能。因此,普及初等教育、进行职业培训、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就成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贫困的根源正是贫困的条

件。通过打破低素质、低竞争能力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反贫困行动是对人的一种投资,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要求牺牲眼前的资源以增强未来的生产能力。认为为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是对社会生产资源单纯消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进行反贫困制度创新。一是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二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改革。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小。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改革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裁减冗员、减少“吃皇粮”人数和财政“吃饭”压力,改变政府部门为“就业机器”的状态。扶贫工作的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小,需要扩大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对现有的扶贫管理制度改进和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使有限的扶贫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缓解贫困的作用,使真正贫困人口受益。此外,还要把解决城市绝对贫困问题列入本世纪末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

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络。面向贫困人口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虽然能使拥有正常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和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的贫困缓解,但却不能使老弱病残失去劳动力的农户摆脱贫困状态。而且还会有人由于收入的季节性变化、自然灾害或不利的宏观经济冲击等原因,暂时地或永久地陷于贫困之中。因此,补贴计划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就成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针对这类贫困人口的食品价格补贴、配给食品补给、食品券补贴和补充性的赈济计划。提供老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保证残疾人和失去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工代赈是缓解周

期性宏观经济和短期自然灾害冲击的有效手段。它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短期就业和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形成基础设施为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创造物质基础。

6、从“全国一盘棋”到“东西互惠,共同繁荣”中反贫困

在计划经济时期处理发达与贫困地区的 关系有一个重要原则是“全国一盘棋”。在调动和集中全国各地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重点及国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资源指令性调拨,以低价输出方式将其收益转移,实行地区经济的专业分工和生产布局按国家计划而不是市场。各地区以服从全国大局为重,听命于中央计划调遣。形成如下局面:根据国家计划的垂直性分工,沿海地区主要以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原材料、能源工业为主。形成内地上游产品与沿海下游产业连带关系,形成内地低附加值与沿海高附加值价格差的不平等关系。当时发达和贫困地区存在的利益矛盾,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通过财政援助或补助给予补偿这一矛盾并不突出。^⑫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和贫困地区关系出现了新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沿海发达地区凭借区域优势,率先开放,与国际市场相连通,无论是进口额还是出口额占 GNP 的比重迅速上升,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非重工业化,即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带动了整个工业保持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内地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缓慢,原材料和能源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和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居高不下。内陆贫困地区的经济效益势必大大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其二,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实行了“双轨制”,加工产品价格放开,重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计划控制。是不得已而为之。内地贫困地区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产业收益,形成原料输出地与产品加工地之间的类似于内部“殖民地”关系。其三,中央政府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加快沿海发展,对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优惠政策。不仅大量吸引外商投资,而且使内地资金转

移。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应当肯定改革初期对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优惠政策是正确的。但从正义和公平竞争原则看,这种关系既表现了政治上,又表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对少数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他地区实行歧视,甚或剥夺。其四,中央财力下降不利于调整地区矛盾。随着分权化过程,中央财力不断下降,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在下降,加上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补贴方式,以无条件形式支出,对于调整地区差距的作用极其有限,导致内地贫困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下降,不仅市场资金来源占全国总数比重越来越下降,而且来源于中央的投资比重越来越下降。在全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分配方面,贫困地区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是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重要因素。

正确处理发达和贫困地区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不平衡性越是突出,越是要妥善处理各地区关系,协调好各地区经济利益,以往的“全国一盘棋”原则已不适用了,必须提出新的原则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⑬

平等竞争原则。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发达与贫困地区在建立统一市场进程中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只要国内市场是统一的,市场竞争是公平的,每个地区都会从这一巨大的市场体系受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除自由贸易区之外,一律实行统一税制,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分享税为统一税种与统一税率。任何地区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1995年9月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实行国民待遇。对特区的提法有三条,对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对有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和完善;所有地区都要按照税制改革有关规定和实施步骤执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规范税制,公平负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按照国际惯例,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大体思路可这样考虑:超公平的待遇要收回,没

有实行的要逐步纳入。不要指望减这个税,负那个税,按一个标准收上来,再取富济贫。西部条件差,中央来支持,不厚此薄彼。实行国民待遇,保证公平竞争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处理好发达(包括特区)和贫困地区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

平等互利原则。包括商品贸易公平交换,改变价格体系扭曲,取消对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控制,改变不平等交换关系,互惠互利。发达地区应取消对外来劳动力参与就业竞争的不合理限制。利用比较优势,沿海应将耗能、耗材工业转向中西部。同时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共同发展原则。发达和贫困地区的正常关系不是先后富的关系,而应当共同发展、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发达地区不能以牺牲贫困地区发展为代价,而应当促进和带动其发展。由于各地区条件差别较大,发达地区由于良好地理和经济条件总会先富起来,但不能人为地制造特殊条件,加剧发达与贫困地区的矛盾与对立。

共同富裕原则。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应当坚持有助于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抵消各地区分离力,放弃这一原则无疑会加大各地区分离力,就等于丧失中央政府在全国人民中的合法性基础,无助于现实稳定和长治久安。

总之,在转型期,发达与贫困地区应实行“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原则。^⑭

7、在充分扩大劳动就业中,重新布局城乡人口,彻底解决贫困

失业与贫困是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⑮中国转型期,如何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已成为反贫困的一项新任务。但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增长尚不能满足大量增长的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需要,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

首先,经济发展速度与扩大就业的矛盾。面对巨大的社会劳动力资源供给,为了缓和就业压力,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不得不保持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

长速度太快,又会由此带来某些经济与社会问题。社会就业压力实际上已经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基建投资规模形成了倒逼机制。

其次,市场化与就业的矛盾。传统计划体制使国有企业存在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市场化取向改革必然要释放出大量的隐性过剩劳动力。而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部分失业人口必然面临贫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是研究国有企业如何培植新的生长点或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把发展第三产业和多种经济成分作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措施。

再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有限就业岗位的矛盾。近年来,各地流动人口尤其是“民工潮”影响着社会生活各方面。在城市失业率呈上升趋势情况下,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部分以无序形态流入城市,并与城镇居民在就业岗位展开竞争,失败者则形成新的城市贫困人口。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转移和有效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劳动收入的提高。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开始出现之后,贫困地区的居民就业机会偏少、收入偏低的问题渐渐显现,随之而来的向外移民就成为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反应。改革开放后不久,出现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边疆和内地向沿海的大规模迁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日渐增强,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城市。虽然各地政府对人口的迁移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但数以千万计的自我雇佣的劳动者,已经在城市中定居下来。①⑥目前的人口流动对于流出和流入地都极为有利,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完全是管理不够的问题。①⑦在2010年以前,如果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继续保持90年代初以来的快速增长趋势,将会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

由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许多残余内容仍然在起作用,在一些大城市里,地方政

府为了保证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对外来劳动力实行行业工种限制。对于贫困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真正的阻碍。

主要参考文献

①胡鞍纲、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②沈红:《宏观利益格局中的贫困》,《社会学研究》,1996(3)1—11。

③康晓光:《90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战略分析》,《改革与理论》,1995(11)16—19。

④陈德照、安和芬、王鼎泳:《世界三大经济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⑤胡乃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1995(2)41—50。

⑥周叔莲、郭克莎主编:《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⑦秦均平:《区域性反贫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北京: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学术交流论文,1995(11)。

⑧⑨邓伟志:《市场经济的若干社会功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⑩周叔莲、郭克莎:《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⑪杨再平:《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⑫吴浙:《倾斜的国土——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⑬周彬彬:《向贫困挑战——国外缓解贫困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91。

⑭潘乃谷、周星:《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⑮彼得·汤森:《英国的贫困》,伦敦:阿兰雷恩出版公司,1979;萨缪尔森:《经济学理论与不发达理论》,英文版,1957;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⑯尚庆发:《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利弊及对策》,软科学,1990(3)31—38。

⑰毛浩:《“两栖人”情结》,中国青年报,1994.2.23。

作者周毅,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系博士后、副教授(100871)

责任编辑:罗苹

道家道教思维方式

与

生态型可持续发展

□ 孔令宏

本世纪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形成了不同于既往世界观的生态世界观。它的三大基本思想原则是:世界是由关系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世界是动态有序的整体;人类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包含于自然整体的自组织进化过程之中。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比照生态世界观,可以看出,上述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充满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为此,我们认为,可以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人类基于生态系统的环境整体的持续性有机协同发展。这个定义既能与上述定义相兼容,同时又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

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关于人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只不过到今天因为环境危机而突出出来。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先人那里汲取思想养料和继承其智慧。正如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金(I. Prigogine)和其合

作者依·斯唐热(I. Stengers)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①美国著名学者F·卡普拉评价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②他所谓的道家,也包括道教在内。道家、道教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就是在世界哲学史中相对而言对我们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最具有启发性的思想、智慧源泉之一。

一、由天人相分回归天人合一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世界观基础

老子认为,宇宙间有“四大”:^③“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25章》)虽然如此,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却不能盲目自信,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上)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从四者的上述关系来看,归根到底,人应当法地则天,师法自然。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也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庄子·大宗师》)把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很高的位置。庄子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共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说到:人应该“与物为春”,至少也要做到“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为此,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以天合天”。(《庄子·达生》)对此,宋代林希逸解释道:“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④清代王先谦也说:“以吾之天,遇木之天。”^⑤这就是说,人自己要生存、发展,也应该让他人和自然界生存和发展。道教继承了老庄的思想又略有变通,即在道法自然的前提下由天与凡人不相胜到成仙后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明代程以宁提出:“天定胜人,此凡夫也。人定亦能胜天,则仙佛也。”这可联系着老子所说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老子·71章》)来理解。也就是说,在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会给自然界和社会的整体生态平衡造成危害的前提下行动,才是真正的人定胜天。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是,把肤浅的、局部的认识视为真理,狂妄自

大,一意孤行,给生态圈的整体平衡造成难以甚至不可恢复的创伤。人要生存,理所当然地要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为此,庄子提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的原则,即人不能因获取生活资料而为物所“累”,陷入被动的、受束缚的境地。在《天道》、《刻意》中,庄子阐释了“物累”的两层意思:一指思想境界,反对对物欲的拼命追求,见利忘义,身陷网罗;其二,指“道”与“物”、“有”与“物”的两形之间,“不以形累物”,“道”在“物”中,不能以物相来损害道性,“物各适其适”,(成玄英:《庄子·德充符疏》)应该任运事物自然发展。道教也强调,人应该“法天道而求诸身”,以己推人,由己及物。道家、道教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人与人、人与物互为主体,也就是说,人与人、人与物具有同质性,当然,这种同质性是非实体性的。这个思想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虚静无为与可持续发展的连续性原则

道家、道教认为,作为宇宙的本源和本体的道,其最根本的特性就是三个,一为“自然”,二为“虚”,三为“静”。“自然”已如上述。道因其至虚,故能生化万物之“实”,因其至静,故能至动,生生不已,源源不断地产生万事万物,并维持万事万物运化流行不息。道虚极则无滞碍,所以能畅通无阻。道家、道教对“通”的概念高度重视。《庄子·庚桑楚》中提及“道通”,《庄子·秋水》提及“求通”、“通人”、“通之有时”。所以,道之生、道之化,也就是道之通。道教学者成玄英认为“虚通之道”也就是“自然之理”,(《庄子·德充符疏》)司马承祯则直接用“通生无匮”的“神异之物”来定义道,(《坐忘论·得道》七)把“长久”看成“道之质”,(《坐忘论序》)把道看成使人长生不老的“神物”。显然,司马承祯主要是从道教练养的角度来说的。吴筠则说得富有哲理性:“通而生之之谓道”,(《玄纲论·道德章第一》)“非道无以生”。(《玄纲论·道德章》)

道家、道教的通生无滞、生生不已的思想,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连续性原则。个体的人的生命要得以维持,就必须源源不断地与物界进行新陈代谢,吸收养料,排出废物。这就决定了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也得有连续性。为

此,就得立足现实,关注未来,在兼顾其他国家、地区、他人的发展的前提下,知道什么欲望是合理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是道家、道教所强调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正如老子所说:“身与名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44章》)贪得无厌必然带来灾祸,“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常足矣。”(《老子·46章》)“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山不回头”是愚蠢的行为。只有知道节制,才能保证发展的连续性。为此,首先要从解决认识问题,谦虚谨慎地对待发展的限度,正如庄子所说:“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庄子·齐物论》)

贯彻连续性原则的前提是知道发展的限度。要使得发展的增长控制在一个极限之内。但这里所指的增长的极限并不是单项的指标,而是一项综合性的指标,是从整体着眼的。

三、整体圆融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安全原则

道家、道教哲学强调因任自然。这首先是指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如禁止烧毁山林捕猎,禁止落子伤胎、探巢取卵,不准乱倒脏水、牢笼飞禽走兽、毒液投水伤生等等。其次,指对自然界不加以人为的干预,使自然界顺其自然发展。最后,指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加以干预,至少要做到尽量少干预,相信人民可以自己处理好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可以自己过上好日子。总之,道家道教认为,无论是个人、他人、社会还是自然界,抑或整个的宇宙,都有自足的本性,都有存在的价值,都有生存的能力,不必要进行人为的干预。同时,道家、道教认为,宇宙之间的万事万物由于都以道为本源和本体,又都相感相通,相互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而构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内,万事万物又都运化不息,流转无穷,进行着动态整合而汇归为一,即所谓齐物论,“通于一而万事毕”。这也意味着,这个整体是处于循环平衡过程中的。老子认为,道“朴散则为器”后,仍然内在于万物中,“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也就是“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25章》)“反”,就是返回其出发点。“反者道之动”,(《老子·40章》)“反”是道运动的规

律,这样,万物的运动也就是开放式的循环运动。这保证了事物存在的稳定性。所以,道家、道教要求人们对待事物也要遵循“中”之道,“中”之道落实到这里也就是无过不及(这一点与儒家所强调的中庸同义):“变故乱常,擅制更爽,心欲是行,身危有央(殃),是谓过极失当。”(《黄老帛书·国次》)保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处于常态也是为了人自己:“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16章》)不擅自以一己之小智狭智去变革它,否则就会遭遇祸患。在人生原则上,道家、道教也要求人们要学会反向思考,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时时警惕灾祸的发生。

这使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安全原则,即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不能以损害科技、教育、政治,尤其是文化、生态等其他要素的发展为代价。某一个方面的畸形发展或者停滞不前,某一种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枯竭,都会给整体的发展造成危害。要禀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观全局,抓根本,善于弹钢琴的原则,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推动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的整体协同发展,促进社会的整体完善和全面进步。

整体安全的原则,充分考虑了竞争性的协同关系的现实,优胜劣汰,强者生存,弱者淘汰,是自然界的法则,同样也是人类社会不争的事实。可持续发展不是贫者、弱者的安乐窝,在不危害整体安全的原则下,必须允许竞争的存在,必须允许优胜劣汰的存在,否则就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并恰恰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本义。当然,保护贫者、弱者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给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条件和机会,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对他们包死包埋包抬的养懒汉,在社会上形成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质言之,可持续发展要贯彻社会公正原则。

四、中道和合与可持续发展的公正原则

根据上述观点,道家、道教主张用中道和合的原则来处理自身与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老子》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5章》)《庄子》有“环中”的说法,表达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意思,在《庄子》看来,“环中”等同于道。庄子还说:“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庄子·人间世》)这里的“中”,则指在心中贯彻中之道。老子有“冲气已为和”的说法,《庄子》把“天和”作为宇宙整体存在的

最理想的状态。老庄都把“和”作为阴阳二气凭藉道而生化万物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说,必须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别,求同存异,使事物在环境中生生不已地得到发展。正如《老子河上公注》所说:“天道损益盈谦,天道以中和为上。”(《天道第七十七》)《太平经》则进一步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处理社会关系上去。它说:“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王明:《太平经合校》,第20页)中和即是万物产生的原则,万物产生之后,人对万物的合理利用也要遵循中和的原则:“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同样也要遵循中和的原则。这个中和原则的实质是万物和人都是禀承同样的道而生化出来的,所以人与人、人与物本质上是平等的。这个原则贯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前面所说的“与物为春”,“物物而不胜于物”。贯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遵道贵德,正如道教所提出的“至真平等”的口号宣布说:“人无贵贱,有道则尊。”^⑤每一个人在遵循道的前提下可以“任性自在”(成玄英语)。所以,道教要求每一个人都和善待人,平等相处,不区分贫富贵贱,积善祛恶,扶弱济贫。

这个中和的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正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公正原则包括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两个方面。代内公正即指代内平等,即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注意满足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发展的要求,通过协同发展,以消除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立关系和紧张关系。关于这一点,道家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81章》)圣人不积累财富,完全把它给予人民,自己反而更加富有;完全把它给予别人,自己的财富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天道本来就是只滋养利益万物而无祸害,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因为他们只施放而不争夺。所以,国外有学者认为,老子“提倡无私和博爱,并认为这是在人类事业中取得幸福和成功的关键。”^⑥老子的精神对今天充满了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现代社会来说是非常难得的。这首先表现在存在着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1987年)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在财力上的差距正在扩大;工业化国家控制着一些关键组织的决策权;工业化国家已经使用了许多地球的生态资本。这种不平等是地球上的主要‘环境’问题;它也是主要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许多国家,也存在着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鲜明对比,存在着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继。原因正如杰里米·里夫金所说:“当某些人或组织夺得过多的社会资源时,他们就是通过积聚财富和权利而剥削其他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可用资源。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社会能源(财富)集中在一些人或组织手中时,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便因能源丧失而受到威胁。社会要么土崩瓦解,要么就是向革命发展,或者两者同时发生。”^⑦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和富人要在自己发展的同时扶持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和穷人。如道家、道教所主张的一样,知道节制自己的欲望,清心节欲,济弱救困,发扬仁道精神,防止马太效应继续扩大二者之间的鸿沟。

代际公正指发展过程中的代际平等,即要使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通过可持续发展,以改善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有人的目的性,也有客观性。从目的性来说,当代人所确立的目的,既要使之符合当代人的需要,也要照顾到后代继续发展的需要,因为后代的发展只能在前一代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对此,道家、道教哲学教导我们,“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反对“利己而损他人”。(《吕祖全书》卷28)从客观性来说,每一代人的发展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他们只能依赖这种条件并在这种条件的制约下继续发展。在现代条件下,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每一代人对自然条件的干预和所产生的作用,范围

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远。如果处理不当而产生负面影响,就会使得后代人的发展所依赖的外在条件丧失,使得后代人的发展要付出沉重而惨痛的代价。对此,道家、道教哲学的原则是:“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庄子·知北游》)客观条件必须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要“无事安民”,这个“安民”,既要安当代之民,也要安后代之民。“以清静为治”,功成不居,业成无迹,当代人的功业不能给后代人造成危害。

总之,道家、道教在成己成人成物的同时升华己、人、物的德(不是善,而是协同发展的关系),它们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的道,它们的原则是中道和合。它们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必须确立起新的生态世界观,必须贯彻社会公正的原则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①I. Prigogine, I. Stengers《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②Fritjof Capra, *Uncommon Wisdom, Conversation with Remarkable People*, Simon & Schuster edition Published January 1988, Bantam edition/February 1989, P. 36.

③④转引自顾文炳:《庄子思维模式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⑤《无上密要》卷34引《升玄经》,《道藏要籍选刊》第10册,第115页。

⑥L·R·布郎:《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81页。

⑦杰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76页。

作者孔令宏,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510275)

责任编辑:罗 苹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进程发生了质的转变。研究它的发展态势,对推动该区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相当有意义的。

国内的教育现代化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日益增多,大致表现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一般教育的现代化问题,注重探讨教育现代化主要进程、特征、一般标准和基本特征等。另一类注重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发展指标、价值目标,以及教育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发展阶段、当前的困难和挑战等。前者称为世界教育现代化研究,后者称为国家教育现代化研究。同时,教育现代化研究还有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之分,江苏推行教育现代化工程,侧重于实践内容,寻求实现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指标和相应内容,用教育现代化工程来包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如校舍建设、设施配备、办学水平、人均受各级教育的百分比、教育投入水平等。而广东在教育实践上没有提出教育现代化,但理论界却于1990年前后提出这一概念,表现为实践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的默契。《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就是一个典型。

对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前已引起国内有关方面关注,但仍处于初步阶段,一般议论多,系统研究少,注重硬件指标研究多,整体研究少;能从世界教育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行理论和实践定位的更少;对现有教育现代化实践做出符合实际的理论阐释,并用以指导新的实践的就更为少见。教

育现代化是个宏观概念,也是一个包含全面的宏大的发展工程,因而,教育现代化研究也是一个注重整体联系和强调发展规律的研究。如果教育发展研究中缺少了这方面,其研究必然肤浅,并影响教育层面的研究。

我国教育发展研究做得较好的策略研究,就因为在教育现代化研究上存在问题而受到一定的影响。

教育现代化研究受我国传统教育研究的局限,缺乏生动具体的表述以及对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作深入探讨。现代化最早是一个经济概念,现在经济仍然是现代化研究的中心,所以,教育现代化研究如果不研究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地教育发展与人类进化的关系等问题,其研究必然软弱无力。教育现代化是以阶段性的目标体系表现出来的,因此教育现代化很需要学校的投入,建设美丽的校园、“五机一幕”等发展指标来表现,但并不止于这些。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物件对该地区发展的真实意义,或不能把握建造这些设施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即建立起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的良性循环机制,那么,投资越多,可能问题越大。这在“四小龙”和珠江三角洲一些区镇,都是有教训的。这对我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来

说,是很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对教育现代化应有全面的理解。

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发展历程。作为区域教育现代化,珠江三角洲从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就逐步推行

珠江三角洲的教育现代化

□ 颜泽贤 冯增俊

教育现代化策略。1982年前后,珠江三角洲人就非常关注落后的村校,解决温饱后的农民第一个愿望——让子弟读好书。办教育、学技术,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但是,大办教育与严重的经费不足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就迫使该区域教育现代化在相当艰难的境况中逐步起动。其进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压力下的自发与不自觉阶段,大约在1983年间,其特征是外界及区域社会、民间对发展教育需求强烈,表现为一种重大的社会趋向,分级办学在南海市、东莞市等地开始试点推行。这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扫盲和普及学校教育。这是启动改革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开端。(2)1985年前后,是政府推动下的适应性发展阶段。该区域全面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教育结构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主要解决教育与经济长期不协调、不适应状况而进行从宏观到微观、从教育体制到学校内部管理机制的一系列变革。这一阶段,珠江三角洲建立起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创办了有特色的地方高等教育体制,即中心城市办大学体制;建立了多元化教育投资体制,提出“七个一点”的集资策略,掀起建校高潮,提出“20年后不落后”的建校原则,把赶超外域先进教育作为办学目标。其发展特征是:注重政府行为,规模发展快,普教、幼教发展迅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受到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3)90年代后整合创新,注重规模数量转入注重质量效益发展,各种改革在经历多种考验之后,逐步从模仿、适应走向创立和创新。此时,珠江三角洲人明确提出教育现代化的口号,第一本研究珠三角区域教育现代化的专著《迈向教育现代化——江门市教育综合改革实践探索》于1993年出版。这是10年实践的第一声呐喊,体现了该区域教育现代化的趋向。此后,这项研究顺利推进,并被列入国家课题,出版丛书10本,召开了几次重要的研讨会,对教育现代化研究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教育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阶段,珠江三角洲已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办学体制,多级办学体制更加成熟,多元化投资体系日渐系统化,教育储备金制使

私立学校异军突起;地方高校体系日益发挥作用,普及教育向下向上延伸,整个区域向高标准13年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迈进,各种办学模式纷纷登台:荷塘模式、西江大学模式、五邑大学模式、东莞委培办高教模式、江门城市教育综合改革模式、广州市小学素质教育模式、东莞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模式、南山区科研兴教模式、佛山教育整体改革模式、广州市城郊型教育综合改革模式、珠海市学校德育目标管理模式、以及深圳市德育一体化方案等。广东省省委、省政府1994年更对该区域教育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使该区域教育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总体看来,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的特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它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与早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不同,不是以自发性、渐进性的自然积累和由下至上的发展道路,而是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靠示范作用,大量采用他国先进的办教育经验,走由上至下的发展道路。由于后发型教育现代化有较强的示范作用,有利于解放思想,激励教育投资,有利于借鉴先进的办学模式,加速教育改革。但该区域的实践表明,在这种强力推动下的高速发展是充满激烈抗争的,它走了一条曲折反复的道路。从珠江三角洲的实践看,最重要的是能够站在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大力深化改革开放,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深圳南山区的发展就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典型。

2、现代化中的示范、借鉴与创新发展的互动特征。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实践提供的经验仍然是初步的,还不能完全证明后发型与早发型之间的最本质区别,除非在完全实现或超目标之后,才能彻底验证,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教育可以而且应当采用借鉴先进国家的许多发展模式,结合本地的实际加以创新。不过,在开始阶段,创新成分较少,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创新的份量将越来越高。从化英豪学校最早推行教育储备金制,这是投资机制的重大创新,促进了该区域的私立学校迅

速发展,它是采借他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此后,深圳市又出来了多元企业共同投资办学的新模式,这是采借储备金制的经验但又力图避免其不足而产生的教育体制创新。从珠江三角洲的实践来看,教育现代化在本质上是非西方化的。从其演进来说,是从西方化到本国化,再到现代化的过程。“本土”的概念,指的是传统国家的演变方式,后发型现代化正是在打破这种本土的传统演变逻辑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实现的发展。可见,在这里使用本土化是欠妥的,容易引起混淆。

3、推进现代化中政府行为为主导的特征。教育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对早发型国家来说,只是本世纪70年代后才有的事,但在珠江三角洲的教育实践中是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当然,珠江三角洲的教育实践也有群众自发性的教育行为,但如果没有得到政府支持是不能成气候的。例如,集资建校运动,政府不推动,成效就很差;而“教育基金会百万行”由于有五套班子齐出动,一次集资可逾亿元。但政府行为要避免计划经济式的管理,防止使教育现代化陷入官僚主义的管理框架,强行按传统方式运作。政府行为也会抑制特性化的发展,妨碍解决外生型教育现代化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往往有政权更迭和权力危机,这极易导致政府教育行为的政治化倾向,这对教育发展会带来重大影响,关系到后发型教育现代化能否健康发展。

4、教育现代化中整体进化特征。无论是亚太发展中国家还是珠江三角洲,在推行教育现代化中最先都是以教育的有形建设和规模扩张来表现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办学的质量、数量以及传统升学教育模式的惯性作用等等问题的干扰。珠江三角洲现在也面临着解决这些难题的挑战:如何在跳跃发展进程中同步实现整体的协调演进。其中包括区域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教学质量与数量增长的同步提高,在考试条件下使学生不疲于奔命而又能得到最佳发展,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和精神文明提高呈良性互动态势,等等。深圳南山区在建区5年来不懈地推

进“人才库”和科研兴教策略,以此为支点大倡特色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珠江三角洲的实践还可以看到,大力推动高校不同学科与教育部门联姻,也是一条可行之路,如华南师大电教系与各市区中学建立协作关系,使该区域电化教育成效显著。广东比较教育研究会把发展方向扩展到实际工作者,也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这些举措使该地区教育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较高水平。

5、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中的理论研究特征。珠江三角洲的教育改革,起初是出师无名:行现代化之实,而无现代化之名。直到90年代,理论家们才安上教育现代化的名字,举办了三届有特色的专题研讨会。所以,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在后发型教育现代化中,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明确和建立起来的。理论作用很重要,但理论与实践不能一下就结合起来。广东对教育本质问题讨论较早,也提出不少新观念,而且比较早接受多元化的概念。这些对教育改革开放都是有利的。广东教育理论界对实践很支持,但是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导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践与理论才日益结合起来。当该区域走过粗放经验型实践阶段后,实践对理论的要求就日益迫切,这也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模式的改造。从目前情况来看,以研究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为核心,广东教育研究已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广东的教育研究界大力倡导以后发型教育现代化研究为中心,以探讨中国独特教育实践并坚持为促进实践发展服务为宗旨,坚持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珠江三角洲、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一体化为框架,以理论探讨与具体策略研究相结合为原则,以研究为实践服务、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服务为出发点。这种“广派”研究的特色得益于“京派”与“海派”的推动,也反过来对后者产生积极的作用。

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的走向

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新经济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高压力,迫切要求教育做出崭新的反应;二是

港澳回归带来区域发展背景的重大转换;三是新世纪亚洲太平洋国家新的发展态势将触发的发展浪潮。加上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自身发展必然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将给研究带来一系列新课题,这里作一简要分析。

1、研究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性意义重大。当前珠江三角洲教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无法对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明确的定位,提出发展的具体模式。为此,应当参照世界、亚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及相应模式,描述该区域教育发展的基本曲线和定值,说明该区域目前的发展取向:是坚持内涵发展为主还是以外延扩张为主?教育发展的重点是高教还是普及义务教育?等等。我们对这些方面如不通过确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结构、规模、水平上来把握,要对教育发展做出科学的规划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过比较研究,在对今日珠江三角洲经济走向作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对教育现代化做出明确的定位。尤其要描述出与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教育发展趋向和发展曲线。

2、确定研究为实践服务、为教育现代化服务的研究方针。珠江三角洲是从落后的农村开始现代化的,而且在短时间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发展指标一年等于早发型国家的十年或几十年。这种实践急待作出阐释。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的实验区,最早推行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对内地有示范作用。所以,研究和阐明这一在中国本土上成长起来的独特实践经验,对中国教育改革是有益的。

3、促使整体研究与制定具体指标体系是研究的焦点。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至今已到了迫切需要进行整体统筹阶段,必须考虑整个教育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整体发展是通过互动着的各种发展指标来表现

的,不是发达国家发展指标的简单抄袭,而是科学论证的结果。珠江三角洲教育规划中非常缺少各种发展指标。这其实是衡量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决策、制约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因素。珠江三角洲教育改革的理性指导就表现在这里。这是不同于以往实践形式的质的转型。珠江三角洲如不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就会落到别人后面。

4、注重把世界、亚太地区、珠江三角洲教育研究一体化作为增强研究活动的关键措施。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的启动得益于对外开放和濒临港澳、面对东南亚的地缘优势,这也是它成为中国现代化最早启动的重要原因。珠江三角洲人的独特之处就是能积极张眼看世界。只有把世界教育发展、亚太地区教育与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找到珠江三角洲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最佳互动定位,才能把教育规划定位于面向未来发展的最佳出发点上,从整体上把握一切具体的发展指标,使之变成系统的体系,才能引入外域新经验的活水,不断激发起现代化的新浪潮。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后发型教育现代化的特征,认识这一独特的实践和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冯增俊主编《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珠三角规划办《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陈坚、颜泽贤特约主编,冯增俊、朱仲南主编《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颜泽贤、冯增俊,华南师范大学教授(510631)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一块被遗忘的思想领地

——孙中山题词论析

□刘望龄

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博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题词，已经广为流传，脍炙人口，深得人民的崇仰。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一直被视为应酬性文字而未认真进行征集、发掘和整理，在孙文学说当中，是一块被遗忘的思想领地。

据查，自1925年甘乃光选编《孙中山先生文集》开始，数十年间，出版过数以百计的孙中山全集、全书、丛书、文集、遗教等专辑资料，举凡孙中山论著、演说、谈话、文告、公牘、书札、电报、规章等等都予辑录，唯独题词被摒弃在外，明显反映出编者对题词的某种忽视。这一状况，直到7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开始受到重视，正式作为孙中山思想的一个方面，收入有关辑本之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11卷本《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选录有代表性的题词17件；秦孝仪主编的12册本《国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出版），在“杂文”类中辑录81件；王耿雄编的《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94年出版），将多年爬梳发掘到的153件题词全部编入。上述各书总计刊发251件，去其雷同，实际刊出约184件。这是孙中山逝世后50多年间我们所能见到的题词情况。可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随题随赠，很少录副存档，分散海内外，征集非易，因此，所能搜罗的件数，仍然相对有限，成为孙中山全集当中遗漏最多的一个部分。

近两年，笔者因参与黄彦先生主编的20卷本《孙文全集》的编辑工作，重新查阅了有关报纸、杂志、公报、文集、论集、年谱、回忆录、纪念集、图片集、墨迹、碑拓，以及全国各省市的大量文史资料，又得到武昌起义纪念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广东省博物馆提供的馆藏原件，还有诸多熟友的帮助，现已发掘到200余件新的孙中山题词，连同已刊各件，总计辑得387件，另搜获题词墨迹230件，经初步考订注释，辨正刊误，汇编成《孙中山题词墨宝大全》一书，交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预计1998年底精印发行。①该书名为《大全》，只是与已往所辑相比较而言，实际上远未达到完整齐全的地步，切望得到各方同仁的帮助，予以完善。

本文主要对《孙中山题词墨宝大全》一书作一简要介绍和分析，期以说明孙中山题词是孙中山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代伟人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孙中山反复题书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极则”和革命精神，在当今中国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应予继承和发扬。

纵观孙中山题词，具有时间跨度长、题赠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等三大特点。

一、题书时间跨度长

孙中山题词，一般指题赠他人（或团体）和自勉的诗词、字幅、联对、题签，是借助文学形式以抒情言志的孙中山思想。孙中山题词与孙中山革命生涯相始终，从目前所发现的最早一幅，即约1892年为翠亨新居题

联算起,迄1925年一二月间为长沙湘雅医科大学题词止,为时长达34年之久。《为翠亨新居题联》一件,与《致郑藻如书》(1890年)、《农功》(1891年前后)、《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等文,都是兴中会成立之前所撰写的,是孙中山最早的名著之一。《为长沙湘雅医科大学毕业同学题词》,则是孙中山病重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时,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幅墨宝。在30多年当中,运用题词鼓吹革命,传播主义,抒发革命抱负,成为孙中山思想的重要实录。孙中山持续不断地题下千百件②字幅,其数量之多,在政治家当中,亦不多见。

以“翠亨新居题联”作为孙中山题词的开端,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似可确认。题书时间系据当地老人回忆,以新居落成时即见悬挂于大门两旁,据此酌定为1892年,也不会有太大误差。惟题词墨迹“一椽得所,五桂安居”八个大字,却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来,雕刻于木板上的题词原件,已于1938年散失,1958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重新复制,从孙中山墨迹中精选“一椽得所,五桂安居”八个字,拼合放大,刻于木板上。今之所见的故居联对,并非当年孙中山所书真迹。始作俑者即当年担任纪念馆馆长的李伯新先生在《孙中山故居复原经过简记》中详记其事云:“回溯该建筑物迄今建成70年,在这悠长岁月中,经历过不少风霜和波折,至今重新恢复过去原貌,从变相到复原,令人回味无穷”。“故居大门两旁原有一副对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它是孙中山亲手写作的,在1938年散失了。这副对联极需复制,而对尺寸、字迹、颜色、样本等的挑选,每一样都是不能草率图快的。1958年,我们多次到故居附近细心观察约同一时期房屋的对联,并特别考究了其颜色,再依据一般对联尺寸的大小和故居大门的高度,确定了颜色和尺寸。接着,从中山遗墨中挑选对联需要的字样,先按序排列,看看是否有行气。后来又认为对联是新制的,而这件文物是几十年前的东西,色泽方面又需讲究,要求制成品看来是旧时的。这副对联严谨地复制出来,并经详细论证和鉴定后才展

出”。③

孙中山为湘雅医科大学毕业同学题书的“学成致用”一件,是否是孙中山的题词绝笔,则是笔者亲至长沙湖南医科大学进行实地调查而确认的。

“学成致用”题词,湮没60年,直至1984年湖南医科大学(由湘雅医科大学改名而来)举行建校70周年纪念时,才在《湖南画报》(1985年第3期)上披露,但未标注题书时间。1990年,王耿雄汇编辑入《孙中山集外集》时,标为1921年。可是,我们在考查时间和墨迹时发现:1921年孙中山忙于北伐,从未离开粤桂两省,何以给湘雅题词?同时,“学成致用”字体纤细,明显与当年所书题词之粗壮有力的“钟繇体”不相一致,因此引起怀疑。经多方探寻和到该校调查,才弄清题词原委和题书时间。《湖南医科大学校史》内载:1925年,“湘雅医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分派在全国各大医院临床实习。李振翩所在的第五班学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实习时,正遇上孙中山先生在该院治疗。应同学们的要求,孙中山先生挥笔题写了勉词”。这一记载,解决了题书的年份问题。又据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的《哀思录》记载,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病倒津京,1925年1月26日紧急送入协和医院,当天作开刀手术,复经镭锭放射治疗,疗效不佳,遂于2月18日出院。题词即书于其间的某一天,很可能是病情稍有稳定、精神甚好的2月上旬。孙中山出院移住铁狮子胡同后,病情每况愈下,出院当天,行辕秘书处即发布“专心养病,不谈军国事”的重要启事,从此不再接待来访。由此可以断定,“学成致用”题词,是孙中山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幅墨宝,是弥足珍贵的题词绝笔。

又据调查,由于孙中山开刀卧床,身体虚弱,题词系由秘书代笔,加盖“孙文之印”图章。原件已散失,所幸李振翩将之刊发于1925年6月出版的《湘雅》杂志上,从而得以存世。

二、题赠面相当广泛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也是第三世界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指导者。在他致力革命的40年中,与国内国外的革命志士和各界人士有着普遍的联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题词”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充当了联结各方人士的纽带。

按题词受主居住地区进行计算,题词所覆盖的地域相当广阔,除中国大多数省区外,还涉及亚洲各国和欧美一些国家,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亚、缅甸、朝鲜、檀香山和香港、台湾地区,还有美国、加拿大、古巴、法国、苏联等地,影响范围之广,在当年是十分少见的。

从受主情况进行分析,更具广泛性。据初步统计,在387件题词当中,题赠国际友人的约64件,华侨54件,国内各界237件(其中党内118件、党外82件、普通民众37件),还有受主不明的32件。如果将受主按个人与团体进行分类,则个人242件,团体113件,情况不明而无法分类的32件。

个人受主包括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其中革命党人,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志士、友人、爱国华侨是个人受主的主体,无论人数、件数都居首位。这些人都与革命相联系,是集聚于孙中山周围的革命群体。如受主为革命党人的有黄兴、宋教仁、朱执信、陈其美、秋瑾、陶成章、徐锡麟、蔡锷、刘道一、蒋翊武、刀安仁、胡汉民、宋庆龄、蒋介石、戴季陶、居正、张人杰、杨庶堪、邓铿、许崇智、邓演达、蔡济民、龚铁铮等。国际友人有日本的宫崎寅藏、宫崎民藏兄弟,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兄弟,萱野长知、南方熊楠、秋山定辅、三上丰夷和梅屋庄吉夫妇,还有苏联的列宁、巴富罗夫,美国的林百克、法国的费沃礼等等。华侨则有邓荫南、冯自由、张鸿南、杨寿彭、吴锦堂、杨著昆、杨仙逸、朱卓文、谢逸桥等等。这份受主清单,几乎囊括了中国革命领导集团中的全部同志,以及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或牺牲的国内外仁人志士。

孙中山还视情为国内外某些社会政要、党派首领、社会贤达题赠字幅,目的在于宣传革命、互勉互励、结盟对敌,其代表性的人

物有头山满、森恪、张学良、阎锡山、伍廷芳、程璧光、龙璋、沈缙云、太虚和尚、铁禅和尚等等。值得称道的是,孙中山广交天下朋友,但他立场坚定,阵线分明,从不给反动军阀、官僚政客和变节分子题词。在387件题词当中,尚未发现任何一件这样的文字。

孙中山还礼贤民众,为普通百姓题颂、题颁,大开一代新风。1912年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时,即题词染印于手帕上,分赠总统府近卫军全体官兵。以后又为船员、学生、小职员题书纪念。1923年,孙中山主持广东大元帅府时,亲自制订《褒扬条例》,为民间年届百岁的老寿星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地方绅耆,以及节妇、烈妇、贞妇等乡民村妇题颁寿联、颂匾。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获此殊荣者,达29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大元帅府管辖下的广东村民,但也波及云南等地。

团体受主也颇为广泛,计有:

1、革命团体,如福州公益社、花县徐公祠、三藩市国民党总支部、三藩市国民党分部、国民党恳亲大会、巴城华侨书报社等。

2、政治社团,如仰光洪门武帝庙、仰光三合会建德堂和日本日华协会、亚细亚复兴会等。

3、机关,如浙江省议会、大元帅府航空局、广州石牌乡局、广州龙眼洞乡局等。

4、民间团体,如中央演说团、旅闽广东同乡会、松口镇绅商会、上海精武体育会、大埔旅沪同乡会、上海中华武术会、华侨青年会等。

5、文艺学术团体,如上海新舞台、中国心灵研究会等。

6、工商公司,如烟台张裕酿酒公司、中国精益眼镜公司、浦在廷食品罐头公司、万益公司等。

7、寺庵,如广州六榕寺、广州大佛寺、杭州白云庵、普陀山前寺、肇庆庆云寺等。

8、报馆杂志,如云南杂志、民立报、香港大光报、天铎报、铁路协会杂志、铁道杂志、神州女报、国民月刊、中华民报、越铎日报、工业星期报、上海民国日报、朝鲜东亚日报、新青年杂志、美国少年中国晨报、缅甸天声

日报、汕头晨报、求是新报、无锡指南、觉民日报、新建设杂志、孤星、晦鸣旬刊、求是新报等。

9、学校，如广东女子教育院、江西女子公学、横滨华侨学校、竞雄女校、南洋路矿学校、培元中学、直臣学校、翠亨学校、求是中学、崇明第四高等小学、南洋甲种商业学校、交通大学、南洋大学、民国女子工艺学校、上海大学、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广东大学、神户女子高等学校、湘雅医科大学、启贤学校等。

上述罗列，虽然十分繁琐，但从冗杂之中，可以看出题词受众范围是多么宽广。

三、内容丰富，广博精深

孙中山题词的内容，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六个方面：一为主义、理想类，约 101 件；二为勉词、颂词类，约 156 件；三为挽联、悼词、墓碑类，约 57 件；四为各种题签类，约 32 件；五为贺词、寿联类，约 23 件；六为零散件，约 18 件。这个分类，不一定十分精当，如主义、理想类，既具有学理的意义，但随着题书时间、地点和题赠对象的差异，亦具有劝勉、共勉和颂赞的含意。至于寿联、碑文、挽联之类，颂扬、表彰的意义更为浓厚，因此，各类之间有其相连相通之处。目前大致加以区分，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一些问题罢了。

题词的精华，主要体现于对主义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心。这方面的内容，集中于主义理想类中。孙中山认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④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⑤为“求天下之志士仁人，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⑥孙中山反复题书，分赠国内外各方人士。仅目前所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博爱”字幅，多达 39 件；“天下为公”32 件。如果将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 15 件计算在内，总数计达 86 件。如此反复题书，在题词当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题词，并不因其雷同而失去其伟大光辉，反而证明孙中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情

动于中而形于言，每件字幅都有着特定的意蕴与深义。如 1913 年 8 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途中分别为“抚顺丸”舰长山根重武、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社长村田省藏题书“博爱”字幅。到达神户后，又为秘密护送他去东京的中家仲助题赠此字幅，其含意除礼赠一层意义外，更多的是为了表明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因失败而退缩，将为革命的崇高目标而继续奋斗。随行的胡汉民为山根舰长题书“卷土重来未可知”之句，即是对“博爱”深意的最好注脚。又如，1918 年孙中山委任徐朗西为七省靖国联军援陕前敌总指挥，行前，亲书“天下为公”四字为之壮行，赋予护国斗争以深刻的政治内涵。当老同盟会员马伯援受命潜赴陕西，策动冯玉祥起兵倒直而推翻曹锟统治时，孙中山又以“天下为公”字幅相褒奖，同样把护法运动与实现革命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于党外，孙中山更以“天下为公”和“博爱”相号召，如奉系少帅张学良支持孙中山反对曹锟统治，参加“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时，孙十分赞赏，手书“天下为公”，派专人送去。孙中山还视会党和佛教为盟友，曾以“天下为公”字幅，题赠仰光洪门“武帝庙”和仰光三合会“建德堂”。又以“自由、平等、博爱”六字，书赠广东佛教总会会长铁禅和尚，以“一切有情，众生平等”赠与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同时又为广州六榕寺题书“阐扬佛教”、为杭州白云寺题书“明阐达义”、为宁波普陀山前寺题书“与佛有缘”、为广州大佛寺题书“阐扬三密”等字幅，鼓励他们阐扬教义，救苦救难，为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间仙境而共同奋斗。

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政治主张，反映了中国人民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愿望，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一位荣获“天下为公”字幅的金融家江少峰深有感触地说：“这是孙先生给友人的最高奖赏，很多人都想得到它，但先生不轻易礼赠。现在送给我，这既是荣誉，又是鞭策”。⑦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意。

孙中山是世界级的革命家，他的革命目

标,不仅在求中国之“天下为公”、“共进大同”,而且致力于“世界大同主义”,^⑧开全球之“新纪元”。^⑨为宣传这一政治主张,孙中山大书特书,分赠国际友人。1909年题书“四海兄弟,万邦归一”的政治名言,赠与日本友人石井晓云,宣示了“世界革命”这一重要命题。此后,他亲书14幅“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公天下”,分赠日本太田宇之助、织田英雄、神户女子高等学校、森恪、山田纯三郎、佐佐木到一、祐田、山井、田中以及美国林百克、朝鲜东亚日报社。又以16幅“博爱”赠与萱野长知、铃木久五郎、白岩龙平、山根重武、杉原铁城、大和宗吉、村田省藏、中家仲助、柴田旭堂、菊池九郎、郡宽四郎、宫崎民藏、伊东真经、三上丰夷、司徒、寺冈等日本友人。这类题词,已达他题赠国际友人的全部题词的整整一半。孙中山不遗余力地进行鼓吹,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崇仰与敬重。宫崎寅藏无比折服地认为孙中山的世界主义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是无与伦比的“东洋珍宝”。^⑩林百克尊之为“人间的活上帝”。^⑪被帝国主义奴役的广大殖民地人民颂之为“东方民族解放之父”,^⑫“世界被压迫民族、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救主”。^⑬法国共产党人公认他是“东方被压迫革命民众的首领”。^⑭苏联共产党人更认为“全世界工人将尊孙中山为被压迫国家革命运动最伟大代表之一人”。^⑮

综上所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是孙中山思想的最高浓缩与概括,是孙中山题词的核心与精华,也是中山学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尊重,广为征辑。

颂词勉词部分,充分表达了革命者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义无反顾的革命决心。孙中山致力革命40年,除辛亥革命一度取得胜利外,一直处于失败的逆境。可是,孙中山不为失败所气馁,不因挫折而灰心,本着失败为成功之母的信念,孜孜以求,奋斗不息,处处闪烁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本色。他自题“奋斗”二字高悬于办公室内,自律自勉,作为座右铭。同时还以“澹薄明志,宁静致远”、“静敬澹一”、“天地本逆

旅,道义凭仔肩”等字幅,题赠亲密战友和同志,谆谆劝勉他们坚定信仰,树立必胜的信心。他还以“乐天”、“海阔天空”、“四方风动”、“坐看云起时”、“百折不回”字幅,宣传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召示全党。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革命潮流,不可遏抑,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新的革命风暴终将席卷华夏大地,民主共和必将实现。为了团结全党,共度难关,孙中山还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共尝”、“唤起民众导之以奋斗,实现革命继之以努力”等字幅,与全党共勉。

孙中山也深知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流血成河的惨酷斗争,是真枪真刀的实力较量,因此,一再告诫全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且要求党人“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勇于抛头颅,洒热血,甘当革命之“雄鬼”。孙中山还书录唐朝著名诗人高适所作《燕歌行》,赠与胡汉民,期与全党树立正确的战争观、生死观。该诗深刻描述了战争的惨酷和将士视死如归的悲壮,诗中写道: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是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子不见争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在颂词、勉词中,还有一些是为颂扬革命情谊而题,如他在伦敦结识的日本朋友南方熊楠,由于志趣相投,引为知交,离别时,即在南方熊楠日记本上题书“海外逢知音”五字,以表达同道欣喜之情。宫崎寅藏,是孙中山最精诚的朋友,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二人一见如故,亲密无间,孙

中山先后为之题书五字幅,记录了各个时期的深情厚谊。最早的一件题于1899年11月,当时,宫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香港,参与组织兴中会与会党结盟的兴汉会。为纪念合作的成功,宫崎请与会代表在他的外褂上题写书画。回到日本汇报时,复请孙中山补题。孙题了“东方之无赖兮唯此公奇”一幅,称颂宫崎义侠之奇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宫崎亲临香港,迎护孙中山归国,为庆祝清王朝的灭亡,孙中山为之题书“纪念”二字。1913年,孙中山访问日本,拜访宫崎,又以“推心置腹”相赠,高度评价了二者的关系。1918年,宫崎在箱根环翠楼为孙中山洗尘接风,孙应请题书“环翠楼中虬髯客,涌金门外岳飞魂”的佳句,盛赞宫崎在支持中国革命大业中,有如“东方虬髯”,与中国民族英雄岳飞相提并论。另一幅“白虹贯日,紫气滔天”,题书时间不详,更是推崇宫崎为圣人,意谓“紫气东来”,兆化中国。此外,孙中山还以“同舟共济”、“辅车相依”书赠山田纯三郎;以“至诚感神”书赠田中隆,同样具有颂赞、感谢之衷情。对于资助过革命的华侨,或兴办教育、公益事业的绅耆,孙中山也分别以“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急公好义”、“热心教育”、“造福地方”、“为国育才”相题赠,以示答谢。为中国人民的题词,多为祝福、颂赞之词,表现出无限热爱人民之情,题有“德劭年高”、“共和人瑞”、“硕德纯行”、“百年人瑞”等匾额。不过,孙中山也受到封建遗风的某些影响,为节妇、贞妇、烈妇唱赞歌,题有“贞操可见”、“节孝可风”、“芬烈长存”、“懿德贞型”、“节媲松筠”等字幅,显与近代文明、时代道德不甚协调。当然,这类题词,件数甚少,无损孙中山题词的总体光辉。

挽联、悼词、碑文部分,主要是悼念死难先烈的题词,歌颂了英雄们的勋绩。孙中山先后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南京粤军殉难烈士墓、安庆烈士墓题碑;又为粤军阵亡将士、滇军阵亡将士追悼会致送挽联、挽额,以“浩气长存”、“建国成仁”、“建国伟烈”、“英灵如在”、“杀敌致果,杀身成仁;为民请命,为国捐躯”、“讨贼矢孤忠,魂兮不朽;为谁易

幸福,生者勿忘”相悼,颂扬先烈们在辛亥革命中所建立的光辉业绩,英雄精神不死,永垂史册。孙中山还一一为刘道一、徐锡麟、秋瑾、刀安仁、宋教仁、陈其美、陶成章、蔡锷、黄兴、孙昌、程璧光、张汇滔、伍廷芳、杭辛齐、邓铿、彭素民等题词悼念,^{①⑥}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和哀思,称颂他们生为人杰,死作鬼雄,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奋斗到底。1923年,国会议员尚天德,抵制曹锟贿选,愤而离京南下,不幸在上海病逝,孙中山立即题书“正气浩然”四字挽额,表彰尚氏的崇高气节与傲骨。

对于为中国革命英勇捐躯和献身的国际义士,孙中山也以挽联、碑碣表示无限崇敬。1900年,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在惠州三洲田起义中战死,成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之第一人者”。孙中山追念不已,1913年特与宫崎寅藏、头山满、犬养毅等人发起修建“山田良政纪念碑”,立于东京全生庵。孙中山亲题碑文,尊之为“兴亚之先觉”,“身虽殒灭,而志不朽”。1918年又以“丹心千古”相挽。为了表达对义士父亲的敬意,他还题下“若吾父”的字幅,敬赠山田浩藏老先生。1924年,广州大元帅府高等军事顾问苏联将军巴富罗夫,到前线视察时不幸落水遇难,孙中山十分悲痛,亲自前往黄埔军校致祭,并以“急邻之难”四字相挽,表彰巴富罗夫将军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被孙中山尊为“革命圣人”和“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逝世时,适值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立即向大会报告并提出“哀悼列宁议案”,宣布休会三日,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他还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宣读祭文,手书“列宁同志千古 国友人师”祭幛,高悬祭坛之上,对列宁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哀悼。

孙中山还以挽联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与惨暴,号召人民摧毁北洋政府的血腥统治。如1916年党人龚铁铮在长沙参加讨袁,遭反动派杀害,剖腹剜心,令人惨不忍睹。孙中山即题联揭露:“可怜麟凤供焦脯,如此江山待祓除”,无情鞭挞反动派的暴行。

孙中山的题词内容十分丰富,上述只及

主要方面,其他如给报社杂志、学校的题词,十分强调舆论导向和人才培养的作用,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寿联、墓碑之类,也饱含特定之深情,可歌可颂之处也不少,为了避免篇幅太长,此处从略。

①部分新辑题词,已编为《孙中山先生题词题签辑补》一文,刊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馆讯》第9期,1996年6月出版。

②据黄彦先生估计,孙中山题词当不下1000件。

③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中山文史》第38辑,1996年10月出版。

④1922年孙中山对孔祥熙的谈话,1942年4月23日《扫荡报》。

⑤《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5页。

⑥《中国革命》,《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页。

⑦江俊孙:《孙中山先生对我家的深情厚谊》,《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⑧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

⑨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

⑩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三十三年落花梦》,第112、124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出版。

⑪《林百克在美国纽约留美学生侨商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无出版日期)。

⑫⑭《法国共产党代表维也郎和印度代表刚伯

在法国巴黎东方民族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哀思录》。

⑬《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纪实》,《台湾民报》第150号。

⑮《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外各界之评论》,《孙中山全书》第4册,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4月再版。

⑯对诸先烈的题词是:“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刘道一);“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徐锡麟);“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巾帼英雄”(秋瑾);“边塞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刀安仁);“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原,一坡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宋教仁);“失我长城”、“成仁取义”(陈其美);“气壮山河”(陶成章);“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黄兴);“为国捐躯”(孙昌);“忠烈长昭”(程璧光);“国魂不死”(张汇滔);“天不遗”、“人亡国瘁”(伍廷芳);“忠贞谅直”(杭辛齐);“虽死犹生”(邓铿);“吾党惜斯人,应有注海倾江泪;廿年共患难,未遂乘风破浪心”(彭素民)。

作者刘望龄,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一）前言

香港地区有它本身的古代历史。尽管这样，香港的现代史无可否认是始于鸦片战争。因此，有志研究香港史，必须正确认识这场战争的起因和英国夺取香港岛的过程。要了解鸦片战争的真意义，须先明了战争前的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受到复杂因素的互相影响，了解在这种因素下双方所面对的困难，不偏不颇地分析中英两方可信性高的有关史料，去寻找答案。

（二）有关鸦片战争成因辨证

鸦片战争或称第一次中英战争，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议不休的话题，而且意见尚有分歧。这方面的学术争论的起源与历史，已有学者认真的追溯和分析。①这里仅评述三种主要解释战争成因的说法。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第一次中英战争是一场文化战争，即是说，它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提出这个理论的史家中的表表者，是李剑农和必查（E. H. Pritchard）两位。他们认为中英对商人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法律观念不同，加上中国拒绝接受平等的国际社会观念，导致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冲突。②而林维喜事件则被普遍认为是直接导致战争爆发的引火线。主张中西文化冲突的，背后指责中国根深蒂固于华夷观念，以致歧视西方人。这一派史学家认为西方商人

应享有跟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

较早出版的有关中西关系的著作，很多都用大量篇幅突出英国人抱怨满清政府傲慢自大和对英国商人及其他外商在广东营商施予许多无理限制，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犯法后要接受中国法律野蛮的刑罚。③这些著作认为上述的申诉是构成英政府向中国出兵的主因，而林维喜事件则是导火线。但若我们细心分析一些有关史实，不难发觉这些冲突并非构成战争的主因。

有必要指出，仅仅是文化差别是很难解释在 1839 年所发生的一场战争的。过去也曾有过许多类似林维喜事件的发生，而且外国罪犯都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若果中西对法制观念不同是触发战争的主因，那么战争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应该发生了，英国何须再多等几十年才出兵攻打中国？

清政府在广州实施的贸易制度，在鸦片战争发生前差不多 100 年经已开始实施，并一直为外商接纳。至于类似林维喜事件的例子，在 18 世纪早已发生无数次之多，所以战争的主要原因，实在于其他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著作反映了 19 世纪初英国政治家和商人的情绪和心态。他们认为只有西方的外贸和外交观念才是正确的，因而要强加于中国身上，打开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迫使清政府实行贸易开放政策。这种见解

□（澳门）霍启昌

带有明显的片面,是根本就英国方面利益考虑的偏向,不出 19 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完全忽视了清统治者的政治观点和动机,以及中国内政发展的实况。

首先要注意的是满洲人由于以少数民族入关统治汉人,故此在政治上一直采用隔离政策,以防范汉人推翻大清王朝。满洲人是游牧民族,对海上情况了解甚少,因此他们自然对可能来自海上的任何政治威胁感到不安。清初的统治者对汉民是否能够对大清王朝忠心耿耿常持怀疑态度,故此他们对明朝在海外的残余势力和来自海外的西方人保持高度警觉,以防他们利用满汉不和,挑起政治骚乱。而清政府实行海禁闭关政策,最初原是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台湾郑成功发生联系,对西方国家原本采取宽容的态度。但西方人越来越嚣张的侵掠活动和违法行为,使政权害怕西方人与南明分子相联系而成为一股企图推翻清王朝的政治势力。可见清政府的管制对外贸易政策,有自卫兼防止外国侵略,并且巩固满清王朝的一面。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历史环境,而不能硬指清政府愚昧无知和妄自尊大。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广州的贸易管制措施和条例,应视为清初统治者巩固皇权和加强清政府在南海边界防御措施的重要一部分。

(三)中葡关系的定位与中国防御机制

一般谈及近代中西关系的著作,每忽视近代中西关系始自葡萄牙与葡人的交往的史实。明代官员在 16 世纪末已经逐步确定了涉外方向,以适应中国对外关系的两种实际考虑:其一肯定海上对外贸易有利可图,可以允许,但必须管制;其二是认定有效的海岸防卫是必要的。这两项政策导致明政府在澳门建立了一个周密的防御机制,监管和控制西方商船和商人。④

明朝当局很早就痛切感觉到“倭寇问题”绝不只是外来威胁的危险那么简单,动乱是由中国本身的不满分子从内部促成的。内地居民中一些人的协作是海盗劫掠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中国的防御战略家和决策人物对这一点都严加关注。所以对外来劫掠者的防御同时等于对潜在的协作者和内

奸的管制。⑤

从 1517 年至 1550 年同葡萄牙人接触的经验中,明朝官员们已经认识到,只要能够防止外人与内奸协作,那么光是外人自身是不能对当地治安构成可怕的威胁的。假如把西方人限制在一个地区,而政府在该处又拥有充分的防御和监视机制,来审查那些充当双方交往媒介的当地居民,那么就可平安无事地进行贸易。但这个地区必须离广州较近方可满足葡人的需求,而且也必须有强大的守卫力量。⑥

最后被选中为贸易地点的地方是濠镜(澳门)。广东省官员所设计的《澳门方案》,其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效而充分的防御设施,以防止葡人突入内地或从珠江口上驶入广州。

清政府不单将明代在澳门管制外贸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根据承袭过来,而且将明代设立的措施大大地加以强化。清政府的管制外贸政策主要由于害怕西方人与内地不良分子可能的相互勾结组成反清的联盟,因而要继续推行明代设立的预防措施。清代的对外的合法海上贸易在乾隆时开始已全部集中在广州。在广州设立的所谓“广州贸易”制度的运作,就明显反映出是沿用澳门建立的一个周密的防御机制,不单止用来监管前来经商的西方船只和商人,而且用来控制与外国人交易的中国人。⑦

(四)处理澳门问题的模式机制与广东贸易制度

对清代广州贸易条例的细心分析表明,这些条例主要是为了中国内部的安全设想。其中很多条例旨在加紧防范内奸,加紧对与西方人交易的中国人的控制,尤其是中国的领航员(带水)、建船商、公行商和洋人的佣仆。理由是外国人非常需要这些人的服务;外国人在华的野心是需要这些人的协作方能实践的,因此这些人对清朝的安危具影响力,因而必须严密监视和管制他们。⑧

同样的分析表明,有几款条例的目标是禁止一些违禁商品由广州或澳门进出口。这些条例事实上与清朝控制进出口商品是一致的。因为这些违禁商品可能用作战争

用品来反抗朝廷,也因为若果任何商品出口过多会有害于国家经济。这些条例原是由顺治帝最先颁发的,是用以打击郑成功的反清势力的,目的是透过断绝郑成功部队的作战用品的供应,以便逐步削弱和消灭这股反清力量。理由是清政府一直惧怕明朝余党在海外的抗清运动会随着与国内异己分子和外国人的相互勾结而壮大。颁布这些广州贸易条例是基于实际的政治需求,而不是为了刻意抑制西方人以显示中国的文化优越性。⑨

清朝在广州制定的与西方人贸易的政策从实际情况来说,容许西方人在中国领土上做贸易,但他们只是安份做贸易而不得从事其他活动。要保证这一点就要将他们限制在一个确实安全的地区,而政府在该处又拥有足够的官僚机构去监管外国商人的活动和控制内奸分子。清政府选择广州的主要原因是自从明中叶以来,广东官员在澳门附近地区早已建立一套细致的监视、防卫机制。这个防御系统是预防外国人与内奸勾结而造成威胁的措施,而这原有的措施很容易被加强用作保卫广州的安全。⑩

(五)自保与恩恤

从上述资料显示,满清统治者制定的管理外贸措施,目的是保障满族的政权和巩固朝廷的皇权。对于任何违抗的反对者,满族统治者是采取严厉和不妥协的措施去镇压的。但这个专制政权亦有它开明仁慈的一面,很多证据表明,清代的统治者不仅对中国奉公守法的臣民,也对遵守中国法令的外人加施宏恩。

让我们看看一个不太为人知晓但相当重要的事实,严厉的条例也实施于负责上述监管和防御系统的清朝官员。几款条例是专门针对这些官员而制定的,以确保这些官员不会利用他们的职权从外人身上捞到好处。这些条例特别针对那些玩忽职守、敲诈勒索和行受贿赂的行为。直至道光朝,每个清朝皇帝都着意颁发上谕,训令官员要维持良好的道德操守。这些训令反映出清代统治者体恤外国人的宽宏意愿,因为不少上谕都是告戒海关的官员和海上放哨人员应体

恤外人远洋而来,待之以诚和公道。⑪

另外,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清初历朝皇帝同样着意保护西方商人的利益。他们对海上遇难的外国人尤其体恤。例如雍正正在1729年所颁的上谕就勒令沿岸建立哨站巡逻部队,其用意并非只是打击海盗,而是要保护本土商人和顶风冒雨来贸易的外商的生命财产。雍正以后的皇帝亦都保持这种怜悯的态度,许多例子可以证实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要是关于外国船只遇难的报告上呈到朝廷,清廷就会发布命令给地方官员,指示他们好好照顾不幸的外国人。同样许多例证表明,清廷统治者并没有打算禁止那些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人的要求,只要他们不从事危害朝廷的活动。⑫

另一个好例子证明清朝皇帝确实着意保障外商在华营商的利益,是可以从清廷处理中国公行商人负债案件的方法看到的。为了保证外国人得到公平对待和使行商不敢欺骗西方的债权人,清廷颁布了非常严厉的法律条例来处决那些没有还债给西方同行的中国商人。对犯法的行商的刑罚往往是抄家或放逐到边疆服兵役。⑬清代统治者对西方人这般体贴,加施恩惠,不用说也是出于实际政治考虑的。清初的历任皇帝都努力去认识来自海上对清朝威胁的势力,他们牢记明朝沿海倭寇为患的经历。清政府认为,西方商人来华的动机只不过在乎贸易与获取利润。他们不会无故冒险去犯法危害赚钱的机会,除非另有罪恶阴谋。因此每当外国商人违反了清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时,官方的想法就认为是被中国内部的异己分子诱使向皇法挑战的结果。他们可能是为谋利,也可能是为政治阴谋。无论是为哪种目的,要是内奸和国外势力勾结在一起反对满族皇权,对于国家与朝廷的安全都具最大威胁。因此清政府都颁发新的和更严厉的措施,目的在进一步监管内奸分子,制止他们有任何叛国行动。⑭

从上述可以看出,细心研究鸦片战争前有关清政府管理西方人的史实,都会摒弃这场战争是起于文化之争的说法。然而,这并不是说西方人在广州做贸易完全没有冤情。

省和地方腐败和谋利的清朝官吏常常与公行行商和外商,串同违法。但不少案例证明,当中央政府获悉外国人投诉时,就会立即采取行动惩戒省、地官吏和补偿外国人的损失。

(六)“通商战争”辨疑

诚然,史学家对清代广东贸易制度和鸦片战争前一般西方人对此制度的抱怨,都持不同的看法。但从体现自主权的角度去看,则必须承认中国政府有权实施它认为对中国安全有必要的贸易政策;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商人是自愿来华做买卖的,他随时都拥有退出广州不受贸易条例约制的自由。事实上,即使在英国,自由贸易的发祥地,政府都一直有立例限制一些危害国家安全或损害国家利益的商业活动。所以英国商人在自己国内并未完全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19世纪的一位英国史学家曾说:“(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商人和英国亨利七世时期对待外国商人所实行的条例,实际上是一样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有权管理进入他们国家的外国人,这种观念和欧洲改革所流行的观念,并无二致。”^⑮而同时期的另一英国人亦说:“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⑯从这个角度看,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对贸易制度的诸多埋怨只应说是在广州的官吏管理不善所带来的不良效果,要不然只能理解为对中国主权的无视而已。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规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什么制度,清政府对外贸易的规例,亦即所谓“广州贸易制度”的规定,并没有越出这种权利,况且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正以冒险家、海盗的面目在世界上一切他们所能到达的地区和国家,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时候,这些规定,就其主要部分来看,实在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

大多史学家都认为,第一次中英战争是一场“通商战争”。例如费正清(J·K·Fairbank)便认为战争主因在于中国仍停滞在农业社会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因而不能适应自由贸易带来的西方商业和工业革命,亦即

是说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贸易的需求超越了“广州贸易制度”所能提供的贸易。^⑰费氏在这里似乎责怪中国无法满足欧洲自由贸易市场的需要,导致英国政府及英商认为必须迫使清政府实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其他认为鸦片战争源于通商的史学家却对西方有所批判。巴素(Victor Purcell)指出英国为了必须寻求外国市场因而为对外贸易着了魔。^⑱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则揭示了像乍甸(William Jardine)和米迪臣(James Matheson)那样的英商的精明和挑拨性,他认为是这些商人带头煽动其他英商在向中国宣战和跟中国谈判中施加影响。^⑲总的来说,鼓吹贸易战争理论的人都同意这一说法,即是工业革命带来了英国商业向外扩张,因而又使英国无法忍受“广州贸易制度”。但他们对中英谁应负责任这一点却观点不一。

“通商战争”的理论其实包含了战争是无可避免的观点。英国商业向外扩张是受到工业扩张的驱使,自由贸易的原则和自由竞争的实践是导致英国人无法容忍中国外贸制度的原因。只要在19世纪英国有过多的工业产品,它就需要国外的市场,不管是鸦片还是另一种商品,所以当英国的商业向外扩张而遭受中国的抑制,战争迟早都会爆发。

(七)禁烟:受制与反制

在《中国与勇敢的新世界》(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里,谭中很有说服力地指出,鸦片战争的起因并不是英国的商业向外扩张而是鸦片。当道光帝在1839年发起严厉禁烟运动,已经明显表示英国政府从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中所获取的利润将遭受被终止的威胁。照谭氏的估计,在19世纪30年代,透过从印度进入中国的鸦片,英国可以从它的印度殖民地直接获取150万英镑,并间接得到其他许多好处。这个以鸦片为主的贸易与英国的剩余产品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谭中坚持认为英国想保持在中国的印度鸦片市场的欲望,远比保住它的产品市场的欲望要强得多。

谭中关于第一次中英战争是为鸦片而

战的论点是有足够史实支持的。他对英国打这场战争的动机的分析至今最为深入和最有说服力。他用许许多多的证据成功地驳斥了歪曲鸦片战争性质的论说,而其中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是建基于文化优越感和轻商的态度上。

谭中认为,英国政府一直主张遵守清政府的贸易体制的唯一原因是不想损失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巨大利润。根据统计鸦片进口数量,1830年至1840年平均每年为24000箱,而历年中国白银外流的数量估计最少有五六百万两。英国政府透过印度贩卖鸦片给中国,最少每年可获150万英镑利润。所以当道光皇帝严厉执行禁烟后,不单令这项英国政府利润成了泡影,更令一些财雄势大的英烟商如乍甸等平白失去一笔财富。从当时的公私文献上的记载,一些学者有足够的证据指出,自从清廷实施禁烟后,以乍甸为首的鸦片烟商便施压力迫使英国政府用武力保护鸦片贸易。谭中因此认定,英国政府出兵阻挠中国禁烟才是引起战争的直接原因。

不过谭中对道光皇帝是否有意挑起战争的分析并不足够,这里有必要作补充。道光朝初年(即19世纪20年代),国家经历了广泛的社会不安和反清的动乱。清政府的看法是:这样的不安和骚乱是土匪、海盗和腐败官吏这类不良分子挑起的。这些内部的异己分子受谋利的诱惑力驱使,不顾政府律令和国家的安危。在此同时,走私鸦片的活动急剧上升。由于大量白银外流,中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在急谋应付这危急的形势时,清廷很自然地又担心汉民中的异己分子与国外反朝廷势力勾结在一起。从不少的清朝文件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他很多清朝的官员和士大夫都有同样的顾虑。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道光皇帝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去打击犯法者——无论他们是吸毒者还是贩毒者。若果从国内政治形势去了解道光皇帝雷厉风行的禁烟行动,就可以看到铲除那些危害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是国家内政的基本需要,目标中的异己分子是鸦片烟贩和烟民。其主要目的不外乎

加强控制、管理外贸的机制,以防止内奸与违法的外国人勾结联盟。

(八)抚顺外夷:中国治理澳葡的机制和延续

中国自1550年开始,已经在澳门建立一套细致的管理外贸兼监视防卫葡人的机制,包括建筑关闸以控制华夷的出入,屯重兵以防夷人入侵,设专官管理澳门一切华夷事务以及制订规例控制夷商兼防范内奸等措施。这个防卫管理机制可算得上是长期生效。一旦葡人违背规例,即马上封舱,停止贸易并且断绝一切日用需要,而葡人即变得恭顺,这样的驭夷管理外贸方法可说是屡应不爽。上文已说明清政府不单将明代此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根据承袭过来,而且强化明代设立的措施。主要原因是清代对外的合法海上贸易除了葡人容许留在澳门外,全部都集中在广州,而清代所谓“广州贸易”制度的运作,同样需要一个周密的防御机制来监管和控制前来经商的西方船只和商人。

道光把禁烟视为内部安全的措施。国家的安危受到威胁,作为天子,就有责任采取措施,处理危害朝廷利益的烟贩和烟民。足够的史料表明道光政府对英国鸦片烟商所采用的制御方法,亦是沿用在澳门经历长时期驾驭西洋夷的经验。例如从林则徐、邓廷桢和黄爵滋等朝臣的奏报,认为杜绝鸦片入口,令外夷烟商就范,就必须先严惩内奸。“汉奸一日不除,则夷船一日不绝,是严惩汉奸,实为此时第一要著。”^{②0}又“是外夷之透漏走私,皆内地奸民有以成之也。臣谓欲杜绝外夷之透私,必先绝内地之接引。”^{②1}

此外,“臣等伏查向例,夷人遇有抗违之事,即应封舱示惩……定即封舱,停止买卖,各国以贸易为生,众商载货前来,易货回国,不肯轻掷费本,守候误时。且内地大黄茶叶瓷器湖丝,为各国必需之物。溯查嘉庆十三年及道光九年、十四年,内因夷人滋事封舱,旋据签请开复。此各国不能不仰息中华,前事有可睹者。”^{②2}除了封舱外,更了解到要“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②3}“恭查嘉庆十三年暎国兵头嘟嚒哩等。在澳门违法禁令,钦奉谕旨,即实力禁绝柴米,不准买办食物

等因,钦此。此时义律与各奸夷均住澳门,前以装货为词,显有占据之意。今更种种顽抗。自应遵照嘉庆十三年之例,禁绝噶夷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②④}而上谕亦明显赞同此一措施,诏称:“该大臣等现在禁绝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自应权宜妥办,不可稍示以弱。至该夷等既以淡水为养命之源,务当稽查汉奸,毋许私行接济。”^{②⑤}

就以上所显示,道光帝及其朝臣认为禁烟措施与先前任何一种内部安全措施并无两样,主要是令这些异己分子不能与难以管制的外国人勾结,联盟反抗清廷。清政府在当时采取这个政策是根据先例和类似情况而制订的,而这样严厉和不让步的政策实际上一直都很有效。

(九)余论:昧于情势的反制

道光帝所犯的错误大概只能说是对英国认识不足,就算经过深入调查夷情的林则徐亦判定英国不会为此用兵,“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欺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其肱莸奸媒。总以鸦片为浸淫之渐。”^{②⑥}无论皇帝或朝臣都不了解英国政府从鸦片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一直以为受惠的只是英商。因此,万料不到这次禁烟,本与先前任何朝廷内部安全措施一样,但竟会促使英国一反过往对华的政策了。

①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78.

②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17至40页;Earl H. Pritchard,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1969, Reprint.

③例如 Hosea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Taipei, Reprint, 1971;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5 Vols., Taipei,

Reprint, 1972.

④⑤⑥ Fok Kai Cheong, *Estudos Sobre A Instalaçã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Gradiva, 1997, pp. 28 - 59.

⑦K. C. Fok, “Ming Military Measures in the Hong Kong Region” in David Faure, James Hayes, ed.,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4, PP. 10 - 23; “The Macau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the Mid -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8.

⑧⑨⑩⑪⑫ 同上,第140—213,171—213,103—169,214—251,214—251页。

⑬⑭Ng On cho, “Ch’ing Management of the West: A Study of the Regulations, Homicide Cases and Debt Cases, 1644 - 1820”,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9, pp. 134 - 181.

⑮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1883, Vol. 2, p. 453.

⑯转引自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海禁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二期,1983年,第16页,注(7)。

⑰⑱Tan Chung, p. 9, p. 8.

⑲同上,第九至十页;又见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 - 4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Maurice Collis, *foreign Mud*, London, 1946.

⑳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1930年影印本,道光朝,卷10,页16b。

㉑同上,卷3,页28a。

㉒同上,卷2,页2b - 3a。

㉓㉔㉕㉖同上,卷8,页9a,4b - 5a,10a,8a。

作者霍启昌,澳门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郭秀文

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 徐晓望

当黑格尔提出海洋文化概念的时候,在他看来,海洋文化是使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征。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他对人类发展史——尤其是东方历史知识贫乏的基础上的。遗憾的是,这一观念曾在中国流行一时,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在我们看来,海洋文化即为人类征服、依赖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成熟的海洋文化表现为在某一区域人类的生活与生产中,海洋已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并在开发、征服海洋方面形成系统的文化方式——即包含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特定的文化消费方式。在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沿海民族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海洋文化,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史上曾经占重要地位的只是五大文化系统:古地中海文化、古印度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北大西洋海洋文化与南太平洋海洋文化。

人类的海洋文化有许多要素:造船术、航海、海滩开发、海洋灾害的防御、海洋政策等等。笔者认为:海洋文化的核心是航海能力与船只的制造。本文试图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评价世界主要的海洋文化。

一、中国之外的世界海洋文化系统

1、南太平洋海洋文化。

人类最早的航海是以独木舟为航海工具的。据本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埃利奥特·史密斯《早期文化的移动》的研究:在新石器时代,从地中海到印度、到中国的沿海、到墨西哥、到秘鲁,存在着一种环绕地球的“日石文化”,它的存在表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人类便能以独木舟与木筏为航海工具,进行跨洋的航行。①这种奇迹般的航海能力,至今仍然可以在波利尼西亚人身上看到。在南

太平洋的辽阔海域上,东起复活节岛、北至夏威夷岛、西至新西兰,分布着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是天生的航海家,可以通过对潮汐、海流方向变化的体会,测知数百里外的岛屿情况。由于对海流与季风极为熟悉,他们能够乘坐独木舟与木筏进行跨海航行,所以,在太平洋的多数岛屿上,都有他们的移民。迄今为止,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可与生活在数千里外的夏威夷土人进行对话,而无需翻译,这说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人们推测: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人最早抵达新西兰岛,然后向太平洋各岛屿传播。只要打开地图看一看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上的分布,就可知他们的祖先曾进行了多么伟大的远航!人类今天能在太平洋上航行,是因为掌握了高科技,使航海难度大大降低,而波利尼西亚人却是以独木舟与木筏为航海工具,就所掌握的交通工具而言,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能力是最伟大的,因而,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人类最典型的海洋文化。

2、古地中海海洋文化。

古地中海的海洋文化最早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共同培育出来的一朵灿烂之花,成为联络三大文明不可少的中介。从技术上而言,古地中海的航海家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便突破了独木舟航海时代。最早以航海术闻名天下的腓尼基人,发明了用苇草编制船只的技术,他们用苇草编制较大型的船只,航行于地中海各地。而后,在制木技术成熟后,又使用了大型木船。在这一前提下,地中海成为古代三大洲文明的交流渠道,也成为促进欧亚非三洲文明发展的要素。可以说,海洋文化对人类文明体现出较大作用,最早是在地中海区

域。但是,地中海狭小的范围使这一区域的海洋文化更像是一个大的“湖泊文化”,比方说,古希腊人的航海不是以风为主要动力,而是以桨为主动力,所以,一艘希腊的战舰,常要配备上百名划桨的奴隶。然而,用桨可以征服湖泊与近海,却很难进入大洋。对古地中海的人来说,大西洋与印度洋都是极为可怕的区域,其原因在于他们使用风帆的技术不成熟(当时的风帆是固定的,不能随意转向)。当然,他们中的个别人也进行了伟大的远航,例如:古代腓尼基人所进行的环绕非洲的航行,希腊人中有去北欧采集金羊毛的传说。但总的来说,当地人的航海是以地中海为限的。在古罗马帝国灭亡后,古地中海文化在人类海洋文化中居次要地位。

3、古印度海洋文化。

古印度洋北岸是人类海洋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早在 5000 年前的哈拉帕文化时期,印度河流域与波斯湾一带已有了可观的海上联系。印度半岛像人舌一样深入太平洋,给印度人提供了航海的便利。5000 年以来,印度人利用季风航行于印度洋四周的亚非各国。例如:他们很早就来到东南亚各国,印度尼西亚的佛教文化遗迹,大多是他们的移民创造的。至今东南亚诸国人口内,占很大比例的是印度人的后裔。一般认为:在中印二国的交往中,是中国人从陆上发现了印度,而由印度人从海上发现了中国。在中国海洋文化发达以前,印度的海洋文化接古地中海海洋文化之后,是人类海洋文化最灿烂的文化成就。

印度航海技术的局限性在于:印度人对木器制造非常陌生。他们虽有伟大的石建筑艺术,但是,制木技术相当落后。因此,在古印度,许多航海的船只都是以苇草编成的,这类船只经不起大浪,只能靠近海岸航行。尽管他们后来也以木材造船、尽管他们对季风的掌握得心应手,但他们在海上所取得的自由是有限的。在中国的大型木船问世后,印度在东方航海界的地位便居于次要地位。迄至葡萄牙人东来,印度的船队被击溃,印度洋的航海界,便完全成为欧洲人的天下。

4、北大西洋海洋文化。

北大西洋的海洋文化起源于中世纪的地中海,上接古代地中海海洋文明。不过,古地中海海洋文化的航行重点是在地中海,而北大西洋海洋文化的萌芽是在北大西洋的波涛上。这一海域的气候条件复杂多变,航行极为困难,因而,熟悉了这一海域的船长在世界的各大洋都能航行自如。可以说,这一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锤炼当地水手的最好练兵场。欧洲漫长的海岸线生长着采伐不尽的森林,使木船制造业有取之不尽的原料,也是其 1000 多年航海业发展的基础。欧洲海洋文化的特点在于擅长吸取科学技术于航海界,不断革新航海术与造船术。中国的指南针与炼钢术传入欧洲,使得欧洲船舶制造与航海能力得到飞跃性的发展。炼钢术带来的工具革命使欧洲人的制木技术进入一个新时代,从此大船的制造不再是神话:而指南针传入欧洲后,欧洲人以科学技术为指导,逐步将它改革为六分仪等航海仪器,从此,不论他们航行到哪里,都可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大概位置,加上地理知识的发展,从而使环球航行成为可能。环球航线由欧洲人最早建立,是科学技术与航海术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欧洲人于 15 世纪末开始探航世界,大约于 16 世纪末已控制了世界大部分海洋。西方航海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她的发展初期虽然落后于中国,甚至在某些项目上一直未能超过中国工匠的技巧,但其长期的发展潜力,则远不是中国造船工匠所能比拟的。

在中国与以上四大海洋文化系列之外,尚有美洲印地安人与阿拉伯人的海洋文化等。但印地安人的海洋文化基本是以“靠海吃海”的海洋采集业为主,航海工具是独木舟,并未超过波利尼西亚人的水平,所以,可以忽略不计。阿拉伯人的航海曾有很大的规模,但其主要生活区域缺少大片森林,或者说,古代的森林都被后人采伐殆尽,所以,在中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的航海便居于次要地位。

二、古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地位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懂海洋的大陆民族,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的海洋文化至少可以上溯到 7000 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其食用海洋生物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出:讨海已是他们主要生活方式之一。当然,这只是海洋文化的萌芽。海洋文化的成熟表现是远航能力,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进行远海航行的呢?在中国文化界有“殷人远航美洲之说”,但缺少证据使之尚处于假说时代而不能成为信史。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最早远航是句践从长江口越海航行至山东半岛,在琅琊一带建立与中原诸国交往的据点。从战国的史料中我们知道,越族人对琅琊的控制至少从春秋延续到战国中期,在这一时代,他们不断地从长江口航行到山东半岛,虽说这一航程大都是沿岸航行,但其漫长的海道已使这一航行成为古代人类最伟大的航海成就之一,中国人的航海术应形成于这一时期。由此可知:中国人的航海文化最早萌芽于古越族人中。

战国之后,又一次引人注目的航行是秦代徐福去寻找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他所率的舰队可载数千将士与 3000 童男童女,由此可知这一次航行是十分壮观的,而其最终不知到达何处的神秘结局,至少证明他们进入了中国人尚不知道的远方海域。从徐福的姓氏来看,他应为东方夷人的后裔,夷人分布于山东半岛与江苏北部沿海,他们无疑是与越族并列的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如果说华夏族是由夏、苗、夷、越四族形成的共同体,那么,中国人的早期航行是由夷越二族实现的。在夷越二族中,越人处于非常有利于航海的南方,他们的航海术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自古以来,水行山处是越族人的生活方式。在福建、江西的武夷山一带,发现多处商周时代的船棺,以船棺为最后归属之处,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文化特征。越地纳入汉政权后,有一支越人下海活动,形成后日的 家。人以船为家,航海为生,他们一生住在船上,漂行于中国南方沿海各地,陆上人因为这一点而瞧不起他们,

实际上从航海业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中国的南方沿海位于太平洋的边缘,冬季每天都有迅烈的东北风,夏季常有台风,航行十分危险。为了抵御海浪,家人对船的制造十分考究,一些记载表明:家人名为“了鸟船”的船只,船身狭长,上阔下尖,冲波劈浪,无所畏惧。所以,家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换一句话说:是他们维系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并使之走向成熟。中国人日后赖以航行印度洋的大船,多为上阔下尖、体型狭长,明显是受到了家了鸟船的影响。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我们了解的古越人的航海事业,仅为冰山的一角。在唐以前,中国的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区域,这一带恰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盲点。冰冻、沙岸、缺乏建材,都是北方海岸难以发展海洋文化的因素。所以,夷人的航海在后代没有明显的成就。当时南方的航海事业如何呢?没有较详细的记载。但从吴国探航夷州、澶州的史迹等等故事,可知当时中国人的航海术是很高的。东晋时期以家人为主的孙恩、卢循的海上起义,在东南沿海坚持多年,在进入内河后,又造出巨大的战舰,这充分展示了南方人的航海能力与船舶建造能力。

迨至唐宋时代,中国的文化、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南方是中国的木材产地,而中国的木制品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于是,中国将制造大型宫殿的技术转移到造船业之上,加上中世纪世界最发达的中国钢铁锻造术,使唐宋以后中国的造船业达到了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度。如唐宋中国南方土著的船只,尚有以藤条连接船板者,但在汉族发达的制木技术影响下,榫接技术与铁钉使用技术,都应用到船舶制造上,于是,船舶的牢靠程度大大提高了;再如,南方诸地很流行用草作船板之间填缝的习惯,这类船只很容易漏水,在引进汉族的制木技术后,便发明了用石灰、油漆、麻丝混合填料填缝的技术,其牢固程度甚至可比木材原质,从而彻底解决了木船的漏水问题,使木船可以放心地进入远海。以上种种技术累积起来,便使中国船只的制造远胜他国。许多记载表明:

唐宋以来航行于东亚与西亚之间的船只,以中国的大型木船最好,不论哪一国的商人,都以乘坐中国帆船为最佳选择。由于当时中国的富强,这类大船很快在民间普及,长数十米,宽十余米,载重数百吨的庞然巨舰,成为沿海人家常备的商船。由这支举世无匹的船队支持的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颠峰,一直统治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数百年。

中国航海术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发明了指南针,使人们在渺茫无际的大海上可以知道航行的方向,从而使脱离海岸的航行成为可能。比如,从日本、琉球航行到中国,只要向西航行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地,而从中国航行到日本,便要以指南针为导向。由于这一缘故,最早的中日航线是走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北道,因为这里的海峡狭窄,可以海岛为航向定位的标志,而日后中日间的航行便是走南线,横穿辽阔的东海,没有指南针是无法找到这条更为经济的航线的。

中国航海文化的局限是:其造船业主要是工匠文明的结晶,虽说技巧达到木制器物的顶峰,但缺乏理性科技作为推动力,所以,虽然不断有个别进步,但最终不可能有质的飞跃。中国的工匠可以制作出大型而又实用的木帆船,甚至直到今天,这类木船仍有使用价值,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明用蒸气机推动的近代化船只。这是技术与科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的航海术也反映了同样的局限,虽说中国人最早发明航海业上的指南针使用,但缺乏自然科学的指导,所以,对指南针的运用一直处于极为简陋的水平上,它只能使中国的航海家知道自己大致的航行方向,而不可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大洋里的准确位置。因此,如果去闯陌生的水域,光有指南针是不够的。其实,由于中国指南针技术的落后,一直未能发明有效航海的精密罗盘,导致宋、元、明、清的中国船,大多是以山、岛与海水颜色的辨认为导航的主要手段,指南针在航海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因此,中国的航海主要是沿海航行,一般不脱离岛屿岸线,个别的越洋航行,也多是以熟悉的地区为主。由于没有六分仪等定位仪器,古代中国水手一般不随意进

入陌生的海域,这样,由中国人来发现世界也就不可能了。

总的来说,中国有记载的航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且,在那一时代,已是世界一流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明初郑和时代的结束。其中,在唐宋元时期,由于中国钢铁炼制技术与木器制造术在造船业上的应用,中国的造船业与航海技术都远远超越同时代的欧洲人与印度人,在这七八百年的时期内,中国的海洋文化无疑是领先于世界的。

明中叶以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来到东方,并控制了世界大多数水域。中国船的航行范围,被压缩到东亚与东南亚的海域,原来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印度洋,有几个世纪不见中国船只。很显然,这一时期的中国海洋文化是在倒退。尽管如此,中国发达的航海业仍是东方海域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是由于:当时西方人虽然有发达的航海业,但就经济实用这一点来说,其木船制造并未完全超越中国,凡是对中国木帆船有所了解的西方船长,无不对中国船只的实用性大加赞美,事实上,由他们驾驶的中国帆船,曾被用于中国至欧洲、中国至美国的跨洋航线上,这说明中国帆船是适于远洋航行的。在1840年以前,之所以没有中国人用传统技术尝试环球航行,是由于导航技术落后的缘故。不过,在东亚中国熟悉的海域,实用的中国帆船仍是可靠的航行工具,在明清600年间,中国凭着这一支船队,在东亚与东南亚海域与各国竞争,并未落下风。其船队运载量、航行能力,在东方国家里首屈一指,与西方殖民国家相比,亦未遑多让。迨至西方人发明蒸汽机推动的轮船,中国的远洋帆船队才逐渐走上没落之路。但是,随着西方近代航海技术的东传与中国现代航海业的兴起,中国的海洋文化也进入一个新时代。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不多的有7000年航海史的国家。

中国的航海技术也影响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日本虽然是一个岛屿国家,但长期以来,对中国航行是其远航的唯一内容。约在日本的战国时期(相当于明代中后期),日本人才开始进入东南亚海域,但许多事例表

明：当时的日本船只，多雇佣闽南人为舵手，所以，他们的航海实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延伸。东南亚诸国的海洋文化受中国影响也许更深，他们的大帆船制造与航海，历来是由中国商人控制的。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的古代海洋文化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而是包括东亚与东南亚诸国。

由此可见，中国海洋文化的地位在于：(1)有长达 7000 年不间断的航海史；(2)对古代东南亚国家与东亚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3)中国的航海在唐、宋、元迄至明中叶的七八百年内领先于世界。

三、海洋文化与人类文明

人类是陆栖动物，所以，人类的主要活动只能在陆上——自古以来，人类的文化成就也主要体现在陆上。不管人们怎样鼓吹海洋文化对人类的价值，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陆地才是人类主要文明的载体，海洋永远处在次要地位。在古代，海洋对于人类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交通上。由于地球是一个海水占 7/10 的星体，所以，只要有一个入海口，人类便能航行到世界大多数地区，从而通过商业获得巨额利润。而这一利润的获得，对中古以来的人类社会又有极大的价值。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片面夸大海洋对人类的意义。事实上，我们若分析世界各大海洋文化系列的浮沉，便不难发现，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类陆地文化的发展高度，而不是纯粹取决于海洋。

从波利尼西亚人所掌握的航海工具而言，他们的海洋文化也许是最伟大的，但他们的海洋文化并没有使他们跃入人类古文明发达的民族之列，这是因为：他们所居的小岛使他们无法发展有价值的农业与工业，经济水平停滞在渔猎采集阶段。而古代地中海的海洋文化之所以能超越独木舟阶段，是因为埃及、巴比伦希腊的古典文明有发达

的手工业，可以造出较大型的船只。至于中国的海洋文化之所以能领先世界七八百年，也是因为中世纪的中国科技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国家；而中国古代工匠文明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将中国海洋文化推上更高的层次。再如西方的海洋文化之所以成为近代以来人类海洋文明的制高点，也是因为它有发达的工业文明作为基础。所以，从本质来说，是陆地文化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层次，而不是相反。明清以来西方海洋文化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胜利，也是建立在它雄厚的科技水平与工业基础上的，并不像人们常爱说的那样：中国明清政府忽略了海洋，所以造成中国海洋文化的退步。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明清政府重视海洋，也是无法与西方竞争的——当然，这不是说海禁政策对中国海洋文化成长的影响不重要，这里仅是重复唯物主义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生产力是决定一切的。

海洋在现代世界对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论点的基础建立在海洋是陆地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不是说人类的海洋文明将取代陆地文明，只要人类还是陆栖动物，这就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海洋不再是限制人类往来的天堑，而是人类文明相互沟通的主要渠道，因此，走向海洋——其意义还是走向世界。只有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因素，一个民族才可能真正的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人向往海洋的基本原因所在。

①转引自：(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初版于 1920 年，修订于 1971 年。吴文藻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版。

作者徐晓望，福建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350001)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中英关于香港设领的交涉 清朝外交官眼中的香港和

□余定邦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向闭关自守的清朝政府开始派官员出国游历。70年代以后,清朝政府派驻欧美国家的外交官纷纷出洋。这些官员途经香港,踏上这块被英国侵占的中国领土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感想?为了能在香港设领,清朝政府曾经同英国政府进行过多次交涉。清朝政府为什么要向香港派驻领事?英国又为什么不让清朝政府把领事派到香港去?本文试图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一

1866年3月27日,斌椿带着同文馆一批学生赴欧游历,途经香港。他会见港督,出席港督举行的宴会。他似乎已忘记香港是被英国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一事实。在他的日记中,对英国占领下的香港加以赞扬,说香港“街衢整洁,市肆多华人。”“峰峦重叠如画图,入港数十里楼屋参差,依山傍麓,较上海又别有景象也。”10月9日,他在回国途中也路经香港,他笔下的香港,则是“洋楼重叠,倒影清波,天然图画。”“入夜,楼屋明灯万点,光照海滨。”^①随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对香港的观察似乎比斌椿深一些。虽然张德彝也看到香港“番舶云集,迤西一带,洋楼鳞比。”但他没有忘记,香港“原系中国海口”,“现有英兵持挺,专司行旅一事。”^②

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派驻英、法的第一位使臣。1876年12月6日,他在出使途中经过香港。香港的学堂和监狱,比起封建的中国的学堂和监狱有较大的差别,引起这位外交官的注意。他参观学堂五处,这些学堂教授中文和英文,有一定的规模。对比中国的封建学校,他发出感叹:“其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为之慨然。”^③

对于香港的监狱,郭嵩焘未能认识到它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在这位使臣笔下,香港监狱“屋凡三层,皆有铁栅扁锁之,罪犯重者在上层,下层一人一房,上层三人一房。被褥、盥盆之属毕具,毡毯日叠板上,整齐如一,不如式者减其食”。狱中关押的犯人,以华人居多。计有华人474人,西洋人、吕宋人、印度人只有30多人。郭嵩焘认为,这是“在罚当其罪,而法有所必行而已。”^④

随郭嵩焘赴英的副使刘锡鸿,参观香港的学堂和监狱后,也发出了赞扬的声音。刘锡鸿认为,香港的学堂“学规严整,客至无偶语嬉笑者。”香港的监狱则“房舍宽敞整洁,各有衾荐,故囚徒不染疠疫。”^⑤可见,郭、刘两人当时没有明显意识到香港是被英国占领的中国领土。

随员张德彝对香港学堂的印象与郭、刘相同,但对香港监狱的记述则不一样。张德

彝告诉我们,英国在香港设的监狱,使用酷刑。有一犯人,“受五十绳鞭,皮裂肉烂,脓血盈背”。在狱中,华人与洋人的待遇殊异。“华人睡木榻,五人一房,西人睡铁床,三人一房。食则华人各饭一盂,咸鱼四尾,茶一碗;西人各面包一块,牛肉一片,加非一碗”。

⑥

在香港办《环球日报》,评论时政的王韬,是1862年10月11日初抵香港的。在他的日记中,没有集中描述香港的高楼和明灯,而是告诉我们,道光十七年(1837年),香港已有英华书院,英占香港时,岛上已有居民一千多人。它说明,英国占领前的香港,绝不像一些西方人说的那样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⑦

曾纪泽是清朝政府派驻英国的第二位使臣。1878年11月25日,他在使英途中经过香港。曾纪泽也参观了香港的监狱,他认为郭嵩焘有关香港监狱的记述“无一字不符者”。对于英国在香港的“水师”,曾纪泽的印象是“旧式笨滞,不能战也。”⑧他见到港督时,却“颂其优待华民。”他还向港督表示,“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当时在伦敦的郭嵩焘得知这一情况后评论说:“此其结好之道得矣,然其言私。”在欧洲,“英与法为党,俄与德为党。”曾纪泽“兼使英法,两国闻此必喜,而俄与德固不乐。”⑨

继刘瑞芬之后出使英国的是外交官薛福成。1890年2月3日,他在前往伦敦的途中经过香港。薛福成当即想到这是英国占领的中国领土。他说:“香港与九龙山对峙,山势四面回抱,极占形胜。英人以为绝好‘哈勃’,涎睨已久。——‘哈勃’者,译言航海避风处也。道光壬寅年为英所据”。“居民凡十二万人,船户三万人,总计十五万人,内西洋人仅有三千,其余皆华民也。”⑩

远在伦敦的薛福成,关注英国统治下香港的情况。1890年10月9日,他在出使日记中记述说:“英属香港,洋人不及华民十分之一,然华民亦归英官治理”。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他还详细记述港英政府的官员和机

构的设置,详列港英政府征收的各种税项。

⑪

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还留下1891年香港人口统计的数字,计有:欧美两洲人及水陆军官兵8545人,比10年前增多555人。华人及附近村民、户共210995人,比10年前增加60305人。各国侨民1901人,较前多179人。总计当年香港人口为221000人,而10年前只有160400人。⑫

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当时还是华工出国和回国的一个重要口岸。据统计,1890年,经香港出洋的华工有47000人,他们当中,前往东南亚地区居多。由外埠经香港回国的华工有99000人。薛福成说:“香港土产虽少,而地当津要,实为商货总汇之区。”⑬

二

清朝政府承认不平等条约,承认英国对香港的占领和统治,导致了清朝官员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多次提出要向香港派驻领事的建议。领事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派驻到外国某一城市的外交官,提出要在香港设领,意味着承认香港为英国的属地。面对清朝政府在香港设领的要求,英国殖民者作出什么反应?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总的说来,英国为维护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寻找各种借口,不让清朝政府把领事官派到香港去。

英国根据中英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许多城市派驻领事。但是,这些条约从来没有明文规定中国可以在英国某一个城市设领。尽管中英之间在1869年签订《中英新定条约》,该约第二条规定:“中国允,凡通商各口,英国均可派领事驻扎。英国允,凡英国及英国属地各口,中国均可派官驻扎。彼此均照待各国官员最优之礼相待。”⑭当清朝政府提出在英属某地设领的要求时,英国多次借口条约未有明文规定,需要磋商才能办理,而把事情拖延下来。

早在19世纪70年代,清朝政府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和清朝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提出在香港设领的问题。他们认为,

“若于该处设官，实多裨益。”^⑮1882年7月，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以交逃犯的问题照会英国外交部，希望在香港设置领事。^⑯英国外交部不作正面答复，把它推给殖民部。殖民部的官员则声称，现任港督任期将届满，有关香港设领问题，要同新任港督商量。^⑰此事不了了之。

1886年4月29日，张之洞又上奏，建议催设香港领事。他认为，曾纪泽提议在港设领，“已阅四年，我未催办，彼即搁置不提。缘港设领事，我有利益，彼多牵制。欲允从则不愿，欲拒绝则无辞。”^⑱目前事势，领事之设不可再缓。”他申述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1、通商——“香港自归英属，海外诸国之讲好于英者，莫不各设领事于彼，以治其本国之务。中国最为切近，转无驻扎之官，此外，若英属之新加坡以及美之旧金山，西班牙之左巴，日本之长崎等处亦俱设有中国领事。此等外埠，程途不若香港之近，华民不若香港之众，贸易不若香港之多，关系不若香港之要，彼皆设官，此何独缺？此为通商计不可缓也。”

2、保民——“香港距省仅三百余里，物力既饶，流寓所萃，俯从洋例，控诉无由。得领事以领之，遇有香港官治理不公之处，关于卑省小事，则商之港督，大事则达于总署，不独有碍华民之事能向港官申理也。”^⑲在港华民生理，事事取资洋人，似有近墨染泥之处。然自前年海防有事以来，在港商贾、工徒、船户、佣作，无分贫富愚贤，咸怀敌忾，发于本心，或坚拒法役，或密输夷情，或愤发公论，或力助军火。……至于历年捐饷捐赈，每有内地义举，向风思奋，更不胜数。商民等既有父母孔迒之心，朝廷自断无置之度外之理。若不为设官拊循，则似与东南洋各埠华民视之有别，是为保民计又不可缓也。”

3、逸犯——“内地罪人以港为逋逃藪，最为粤省吏治地方大患。照约本有逃犯查明交出之文，乃港官每事袒护，或交或否。”^⑳香港情形，他省客未尽悉。去年福建艺新轮船，不先行文知照，迨从香港缉拿巨盗张阿知等，几至枝节横生。若设领事，则觉察

有权，机要易协，……是为逸犯计，又不可缓也。”

4、巡缉——“香港水界之内，不予人以缉捕之权。近因私梟盗匪出没洋面，渐至纵横一切药货，硝磺，走漏 税，经臣行文广州英领事，约会港官协力查缉。港官虽允照办，终恐藉词枝梧。且洋药税 并缴一事，现既议有端绪，他日终须开办。洋药私贩，甚多耳目，稽查不妨广置。若设领事就近会商港官，兼理巡私缉匪事务，应无转折扞格之虞，是为巡得计，又不可缓也。”

5、防海——“省港既相邻接，安危彼此共之。港之煤硝米面十日不来则省城困，省之牛猪薪蔬一日不往则港民困。港乱则省之商路不通，省乱则港之匪徒四起。当法事方殷之时，省固日夕防戍，港之筹备亦殊仓皇。海警寻常，何时蔑有？香港有事，我国生肘腋之忧。我若有事，香港亦无安枕之理。设领事则声息更通，联络尤易，固粤之利亦港之福。是为防海之计，又不可缓也。”

最后，张之洞还认为，“香港片壤，本系中朝宽仁假与洋人栖息，俾资樵采。若不设领事，则是诸国百货入华之利益，英国得而专之，华商华民之在彼者，中国转不得过问之。英收其利，我承其弊；英资其益，我受其损。诸邦各有地主，独无揆诸和好公平之理，种种难通。臣愚以为此既经曾纪泽商之英国外部，并无徬拒之词，只作缓延之计。如果力持促办，彼尚有何说之辞？”

为此，张之洞建议，“请旨飭下总理衙门照会驻京英使，一面电咨出使英国大臣催令该国外部、藩部速将香港设立中国领事一节照约定议， 期开办，以笃邦交，实于粤省商务、盗案、 税、海防各项交涉事件大有裨益。”但此奏折呈上去之后，光绪皇帝只批上“该衙门知道”几个字，便不了了之。^㉑

由于总理衙门没有主动采取措施，在刘瑞芬使英期间，香港设领问题没有什么进展。1890年2月3日，薛福成在出使英国途中经过香港的时候，又重提香港设领的问题。

1890年9月25日，在伦敦的薛福成与使馆参赞商议香港设领的问题。他认为，

“新加坡旁近各岛华民固须保护,而香港一区尤为中外往来咽喉。凡华洋各商货物,均先至香港然后运转各省,而交涉事务之紧要者,一曰逃犯,一曰走私,一曰海界。粤省每出巨案,派员至港,只以未设领事,声气隔绝,动多扞格。所以,粤东全省政务,往往为香港一隅所牵制。此处添设领事,万不可缓。”^{①9}他要使馆参赞马格里代拟英文照会,送英国外交大臣沙力斯伯里。

1890年9月29日,薛福成又派参赞马格里赴英国外交部商谈有关设领问题。1890年1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沙力斯伯里对薛福成9月发出的照会作了回复。关于中国欲派领事官驻扎英地,复照称,“此事已经英廷细心审量,今本爵部堂极喜告知贵大臣,英廷愿给文凭与中国所派之领事官,如给与外洋各友邦之领事官同样办理。但间有审量地方情形之处,刻下或有不能照给文凭者,此须由英廷察看情景,定夺办理。”^{②0}这是一纸含糊其词的照会,根本没有表明同意清朝政府在香港设领。薛福成轻信参赞马格里关于“香港已在允许之列”的说法,于11月30日又向英国外交部发出照会:“中国应派之领事官首在香港及新加坡附近之地,今已选得二员候总理衙门核定。此二员者,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驻香港者,拟调新加坡领事左秉隆任之。驻新加坡者,拟派使署二等参赞黄遵宪任之,非仅为新加坡一处之领事官,并为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各处之总领事官。”^{②1}

接着,薛福成在1891年2月3日从英国递回《英属各埠拟添设领事保护华民折》。他既看到添设领事商办艰难,也表示了要再三磋磨的决心。

1891年5月2日,薛福成又一次上奏:“惟设立领事,条约本无明文,各国知此于我有益,往往靳而不许。即英国前议亦谓中国只能照约而行,不能援引公法。臣初与外部商议,先破其成见,谓中英方睦,岂容与泰西分别异同,再四磋磨,外部始允照各友邦一律办理,仍谓审量情形,刻下或有难尽照办之处。臣亦以经费有常,必须择要兴办,碍

难处处遍设。查香港一岛,为中外咽喉,交涉渊藪,前使臣屡商未就。臣拟于香港设一领事官,其新加坡原设领事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英属诸小国、小岛。……臣既商总理衙门,复明告外部,外部尚以中国官吏未谙西例为虑,臣告以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在任十年,彼此往来素称和睦,臣署参赞官黄遵宪前充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四年,稳练明慎,中外悦服。拟以此二员充补,外部乃无异辞。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准将驻英二等参赞官先用道黄遵宪调充驻扎新加坡总领事官,新加坡领事官先用知府左秉隆调充驻扎香港领事官,于交涉事务,流寓商民必有裨益。”光绪阅后批示,要总理衙门议奏。^{②2}

英国是殖民地帝国主义,它的殖民统治政策阴险、狡猾,为了不让清朝政府在香港设领绞尽脑汁。外交部一时称无条约明文为根据,一时又称要同殖民部商量,殖民部则以官民不便为借口,加以阻拦。接着,英外交部又以中国官员不谙西例为由,有意拖延。而在国内,总理衙门的官员对此不大热心,对薛福成的提议“久搁不复。”于是,英国殖民者乘机玩弄各种花招,千方百计不让清朝政府把领事官派到香港去。

第一,由驻华公使华尔身亲自出面,到总理衙门声称,中国在香港设立领事,不能从国内派外交官驻扎,只能由九龙税务司兼任。^{②3}

第二,由英外交部出面,声明中国在港设领,“先给试办一年准照,如不侵英官之权,不违华民之意,即可换给常年准照。”^{②4}

第三,正当薛福成力争在香港设领的时候,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又向总理衙门提出,希望能在新疆喀什噶尔设官。清朝政府有些官员害怕英国势力进入新疆,因而总理衙门“欲将喀员,港员两罢以斥收束。”^{②5}

经过一番努力的薛福成,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急电总理衙门,提出自己的看法,揭露清朝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薛福成说:“此次若因喀事而罢港议,不独喀事能罢与否尚无把握,而港员之设,……今既得又弃之,转觉

难以措词。若明言因喀事难在应俄,牵连而罢,则恐更着痕迹”。“若以喀事而至愿罢港员,使英人谓我意在亲俄,则必以忌俄而启嫌;谓我意在畏俄,则必以轻我而变计”。“至于试办一年之说,福成初亦疑其卜喀事成否,旋闻港督不愿中国设员,转谓华民多所疑虑,有函到其藩部。兹外部已商之藩部,函劝港督勿稍梗阻,并云以试办释华民之疑,且为港督前议转圜”。“窃思华使以港、喀两事相提并论,致多周折,似非尽出外部初意。或因赫德近在咫尺,就与商议,作此狡狴,亦未可知。九龙税司兼办一层,既与外部申说,外部亦不谓然。盖华使既欲用税司,断无不与赫德筹商而先自开口者。况赫德意在揽权,彼既闻有此事,恐不免挟私指使,另生枝节,尚祈钧署随时留意为祷。”

②⑥

此事拖延到1891年8月26日,总理衙门才上奏:“臣等公同商酌,以香港新设领事与新加坡本有领事情势稍异,英于香港领事仅允试办一年,日后有无异言,尚未可定。且近时洋报传闻又有香港领事作为罢论之说,虚实无从悬揣。应请旨飭下薛福成察探情形,究竟英廷之意是否不致反复,或明告以一年试办之议,中国未能满意,略作停顿,看其如何答复,再行商办。”②⑦

当时,拟调任香港的领事左秉隆以亲老多病,请假回乡。薛福成只好致电总理衙门:“拟暂缓港事,请先议准新加坡总领事并发凭,以便请外部给准照。”被迫“暂缓港事”,薛福成是不甘心的。所以,他一再声明:“港事虽暂不提,并非永罢。如一二年内事势稍变,亦可再议。”②⑧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弱国无外交,直到1911年清王朝

覆灭,清朝政府一直无法把领事派到香港去。相反,英国殖民者却在1898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扩大了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范围。

①斌椿:《乘槎笔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6、141页。

②张德彝:《航海述奇》,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53页。

③④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1、32—33、822—823页。

⑤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2页。

⑥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82—283页。

⑦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6—198页。

⑧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6—137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0、222、415、428、214、246、247、409—410页。

⑳㉑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8页。

㉒㉓㉔㉕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84,第29、29、10—11、29页。

㉖㉗㉘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6,第9、12页。

㉙㉚㉛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209—211、213页。

㉜㉝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84,第29、30页。

作者余定邦,中山大学东南亚所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郭秀文

探寻文脉与把握个性的结晶

——评王剑丛《香港文学史》

□肖向明

内地对文学的研究,自昔日颇受冷遇到目前受到广泛关注、成果迭现,历时十几载,已经到了把这些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加以爬梳、总结的时候了。中山大学王剑丛先生新近出版的《香港文学史》就是他随着这一学科建设成长,经过长期积累和酝酿,充分吸取其他研究者的学术营养而写成的目前第一部香港文学通史。

这部专著的筚路蓝缕之功自然不可淹没。但我以为,它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对香港文学历史文脉的探寻与其鲜明个性的把握,作者揭示和发掘出了源流于中华文化的香港文学的独特风格,确立了香港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探讨和寻踪香港文学对中国历史文脉承传与流变的轨迹,这是作者就香港文学进行定性和归位时首先要关注的一环。十几年的香港文学研究已经达成共识:香港文学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血肉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台湾文学一样,其“根”深植于祖国大陆。本书作者开宗明义地从历史、地理、人口等方面强调了祖国内地与香港文学的母子沿袭关系。继之,作者以数十年研治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厚基础,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作了艰苦细致的资料收集工作。从多方面论述了香港之所以有自己真正的文学,是吸收了祖国传统文化之精义、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之余绪,并对西方优秀文化广纳博取,几经流转,不断创新,从而自立而成的。因而,从追索 20 年代的拓荒至描绘当今的多元并存、百花齐放,其间,中华文化的潜流时常在作者的笔底涓涓溢出。如在文学史上篇,作者就有意把香港文学的萌生期(作者认为 1928 年《伴侣》创刊是香港文

学开创的标志)的研究往前推进了 10 年,这样就正好续接 1919 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学。据此掘源开流,自然可以看出,香港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感召下孕育而生的。由此,我们对萌生伊始的香港文学便有了一个完整的把握,而香港文学对历史传统文化的承传背景也就更为清晰可见。

至于作者探讨和分析抗战前后两次内地作家南迁给香港文坛带来的直接影响,文学史上篇介绍和评析了 1949 年后第一代、第二代南迁作家的创作风貌,如此精心的建构,既切乎香港文学本身的实际,又显现了中华历史文脉在香港文学几度沧桑中流传不息的痕迹。王先生抱有对香港文学之“根”执着的信念,有意识地把许多香港作家作品与中国内地现当代文学作了精细的比较与合理的剖析。钟晓阳冷艳文风之于张爱玲,梁锡华《独立苍茫》之于钱钟书《围城》,张君默《香港子夜》和白洛《暝色入高楼》之于茅盾《子夜》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作者精辟的见解与独到的发现,从本质意义上揭示了香港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缕缕不绝的血缘联系。这种有意义的比较贯穿于整部文学史,读来使人觉得厚实可信。同时,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驳斥某些认为香港文学是在中西“夹缝”里生存的“边缘文学”、“后殖民文学”,是既不皈依英国殖民文化,也不归属于祖国现代文化的所谓“弃儿文学”的诸般无知妄说,它们是很有说服力和批判眼光的。作者在文中引香港诗人戴天的话说:“中华文化长存,接续中华文化的源流,并为之添上新姿,是我们这一代应当努力的方向。”这种有代表性的自觉地向祖国文化归依的心态,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的。

对香港文学独特个性的把握和探析,是作者重点突出的内容,也是本书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香港文学虽然远承《诗经》、《离骚》,近接“五四”新文学,但它并非是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地区的简单延伸。香港地处祖国南方,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二次大战时曾一度被日本占领,之后经历了欧风美雨及商品浪潮的洗礼,今日又“回归”祖国。处在如此独特的历史地位,香港必然有着复杂的人文背景,尤其是“西学东渐”在这里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印痕,产生了香港文学有着作家多元创作多样,首创实验小说,通俗文学、框框杂文兴盛等诸多有别于内地文学的异质因素,逐步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性、独立性。该著在考察香港文学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作者认同香港百年沧桑的历史及其特殊的地位,立足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从宏观和微观上对香港文学的创作实际作了总体把握和仔细的甄别与梳理,使香港文学的轮廓和脉络清晰可现。香港文学自立后的40年发展史、从50年代美元文学的泛滥,60年代现代主义的传播、70年代通俗文学的繁荣、到80年代的多元文学并举……。在追寻香港文学所走过的道路的同时,作者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合理的分流,分析出本土作家与南迁作家;现代主义作家与写实主义作家;学院派作家与通俗文学作家等等,阵容齐备而多姿,同时反映了香港文学的不断创新发展。

此外,王先生也十分注意凸现香港文学相对于内地文学的自身优势。我们从香港文学对西方现代文学潮流的大胆吸收与探索、通俗文学和框框杂文的经久不衰等等中,即可窥见本书的另一特色。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大都市,西方现代文艺的涌入,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生长的机遇,因此,香港文学在中华文化的氛围下创作别具

一格的现代主义作品,其中刘以、西西对实验小说的突出贡献,无疑为本书所激赏和重点推介。对通俗文学的关注和强调,也是基于香港都市化文学特点,表现了作者对香港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二美兼具的公允态度。同时,作者还兼顾到香港文学创作多元性的事实,对诸如框框杂文等独特的香港文化现象作了归类和分析,判断其得失后,肯定了这一创作“辣、快、短、多”的特点。作者正是根据以上的整理和挖掘,最后总结出了香港文学的独特风格:主题的开放性、艺术的通俗性、题材的平凡性、审美的多元性,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

读完这部《香港文学史》,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香港不仅不是什么“文化沙漠”,相反,它各种创作皆备,并且有标识自己逐渐成熟的雅、俗文学作家作品存在。毋庸置疑,这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独呈异彩的一翼。

当然,《香港文学史》还有一些未能兼顾到的作家作品,由于资料匮乏,甚至重要之处如20年代、90年代的创作也还有缺失。

第一部香港文学史的出现,把植根于祖国传统文化而滋生出来的独具风采的香港文学,放置于当今中华大文化圈及世界文化潮流中加以观照,既是对香港文学主体的尊重,更是对香港文学继续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激励。随着香港顺利地“回归”祖国,香港文学也将正式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领域之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又能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这是可以预见的。《香港文学史》的及时出版,是作者献给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的一份薄礼,其意义是深远。

作者肖向明,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5102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香港文学书目』读后

□(澳门)邓骏捷

香港文学成绩喜人,种种风格和流派的作品珠玉纷陈;加上香港文学与内地现当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使香港文学更为繁杂丰富。香港的出版业极为蓬勃,各类作品与评论得以大量发表和出版,促进着香港文学的发展,也保存了大量史料。现时香港和国内都有不少学者进行有关香港文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先前未见有对香港文学的原始资料作全面系统整理的著作,青文书屋 1996 年 1 月第一版的《香港文学书目》,可谓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其草创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笔者在细读此书时,亦发现了不少错漏或舛误之处,觉得很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以祈有所促进。但由于笔者是隔海观书,疏失之处亦希望能得到方家指正。1、该书定名为《香港文学书目》,给人名不副实之感。首先,香港是华洋杂处的国际性大都会,书内所收绝大部分为中文文学书籍,英文书籍只有 8 种,尽管中文的使用率最高,但这样以“香港中文文学”来概括“香港文学”,仍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该书 80% 以上的篇幅(第 5—256 页)是 200 本书的评介文章,余下不到 20% 的篇幅才是“香港文学书目”(第 257—315 页),不如以《香港中文文学书籍选目提要》更贴切一些。

2、该书对“文学作品”一词的界定颇为含糊。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创作和批评是文学发展的两翼,但“文学作品”则是专指文学创作而言的。该书无论在书评或书目部分,都夹杂有不少学术著作,如文学史类的有:李辉英的《中国小说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正续集等;文学理论与批评类

的有:陈德锦的《南宋诗学论稿》、叶维廉的《比较诗学》、陈炳良的《神话即语文学》、胡菊人的《小说技巧》,黄国彬的《陶渊明的艺术》、郑树森的《现象与文学批评》和《奥菲尔斯的变奏》等等。若把香港学者有关文学的研究著作都纳入“香港文学”的范畴的话,则该书遗漏的重要著作则未免太多,如罗懋烈的《词曲论丛》、饶宗颐的《词籍考》和《文辙—文学史论集》、黄兆汉的《词曲论集》和《金元词史》、黄佩玉的《张元幹研究》、李锐清的《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邓国光的《摯虞研究》、何沛雄的《汉魏六朝赋论集》等等。

3、可能是因为该书选录“香港文学”的标准太多,因而所录之书的范围广而杂,似乎是因人而定,如林年同的《镜游》、李英豪的《批评的视觉》、刘绍铭编的《现代中国文学评论选集》、黄国彬的《中国三大诗人新论》,以上四种的内容均与香港文学无涉,只属于“香港人的”著作这个范畴;又,李欧梵的《狐狸洞话语》、杨绛的《干校六记》,以上两种既非香港人的作品,也不是香港的文学创作,只符合“香港出版的”这个标准,再如宋淇编的《红楼梦新论文选》、马幼垣和刘绍铭的《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选》、陈炳良的《神话·礼仪·文学》,以上三种的编者和出版地都在香港,但内容与香港文学扯不上关系,只能算是“香港的”文学“研究著作”。资料的筛选标准不统一、不明确,是该书明显不足之处。

4、该书《前言》强调:“我们亦尝试从文化角度兼及一些值得讨论的通俗作品,并尽可能列出书目。”(第 2 页)本来有所侧重,可以形成更专门的功用与特色,可惜书目部分所做的工作并不理想,很多拥有大量作品和

读者的作家作品依然未见收录。如写有一系列科幻小说的倪匡,擅写爱情小说的亦舒,专写财经小说的梁凤仪,近年大受欢迎的张小娴等;一些报章的专栏散杂文作者,如岑逸飞、黄沾、刘天赐等等的作品集则更付阙如了。这样实在难以让读者“从中看到香港文学创作和生存的背景与脉络”。

5、旧体诗词文赋方面,香港近代以来有许多制作高手,《香港文学书目》概不收录,亦甚可惜。如饶宗颐的《选堂诗词集》、《固庵文录》和罗懋烈的《两小山斋词》等,海内外早已知名;其他如:陈炳良的《冷香室诗》、陈一峰的《一峰诗存》和《一峰词钞》、韦金满的《怀燕楼诗草》、吴天任的《荔庄诗稿》、洪肇平的《枕云楼诗稿》、梁简能的《简斋诗草》、潘新安的《草堂诗缘》、潘小磐的《余庵诗草》、苏文擢的《邃加室诗文集》、方宽烈的《涟漪诗词》、陈耀南的《东瀛诗草》、黄坤尧的《清怀诗词稿》等等;以及一些诗社作品集,如《硕果社》第一至九集、《春秋诗社》第一至五集和《鸣社诗辑》等等。

6、另一个严重问题,则是该书未作初步的分类,让人难以从中看出香港文学的概貌。同时,该书虽然收录了上千种书和数百位作家,却没有一个简单的索引,未达到工具书的一般要求,实在不便于读者从中查找资料。

至于书评部分的评论是否得当,则见仁见智,有待香港文学的研究专家进一步探

讨。最后随手补充一些有关香港文学的书籍,以备参考修订之用:

钟伟民《抒情调的终止》,壹出版有限公司 1994 年 11 月。

吴应厦《女人啊,女人》,香港文学报社 1993 年 11 月。

羁魂《山仍匍匐》,香港山边社 1990 年 6 月。

黄河浪《天涯回声》,香港新天出版社 1993 年 2 月。

卢国沾《我恋我哭》,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

曹聚仁《浮过生命海》,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1974 年 4 月。

曾敏之《听涛集》,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1992 年 2 月第一版。

岑逸飞《书中乐》,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 1988 年 3 月初版。

夏易《港岛驰笔》,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第一版。

胡雪姬《祝发》,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 1988 年 4 月初版。

程瑞流《短歌行》,香港新潮文化事业公司 1992 年 5 月。

周季胜、张诗剑编《香港当代文学精品·诗歌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作者邓骏捷,澳门大学中文系助教
责任编辑:陶原珂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变论

□ 陈晓明

主旋多重变奏：从表现人生到政治认同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交织于东西方文化双重网络系统里，接受着历史的庄严选择，步履维艰地前进在坎坷的道路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作家们，用“民主”与“科学”这一撬动世界旋转的杠杆，试图将文学从封建的“道”和“载道”中解放出来。《新青年》是当时影响最大、倡导最强的前驱，它震撼了万千读者枯寂的心灵和死水一样平静的文学界。而人的觉醒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

文学的主调：在多元追求中“表现人生”。

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上人的空前觉醒。近代洋务派“船坚炮利”政策的破产、辛亥革命半途夭折的教训，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刺激。他们醒悟到，仅凭物质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都不足以救中国，欲砸碎“巨人身上的镣铐”，最要紧的是“立人”，造就出现代国民。于是，他们上承梁启超的“新民”说，仿效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运动，把自己的“兴奋点”由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随着人的觉醒的时代主题的确立，文学亦觉醒起来，作家们维护文学的尊严，追求文学的“全”与“美”。不过，严酷的中国现实不可能给文学留下多少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此时的文学家不能置涂炭的人生于不顾，因而，“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是当时一切有着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理想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是这样，倡导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人亦如此大谈文学的社会使命和功利价值，以至迈出“象牙之塔”，走上风雨飘摇的“十字街头”。从整体上看，“五四”时期似乎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思潮，而雄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实则是“表现人生”。在“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中，不同的作家对现实人生有着各自的视角与阐释方式。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多从人道主义出发来反映人生、探讨人生、指导人生，他们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小知识分子灰色的人生，笔端渗透着深切的同情与怜悯。创造社的作家则从个性主义入手，不重视客观描绘和细节真实，宣泄主观情感，诉说性的苦闷、生的穷愁和时代的悲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的尊严、价值及欲望的追求。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不难找到他们自身的影子。他们当时表现的是“整个的人生”和“社会——民族的人生”，对“人生”的理解比较宽泛。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对多种文学观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一切全是缘于此时尚未出现一种完整、一致而富有权权威性的文学观念。他们在

强调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时,其实也注意到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在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层面的同时亦没忽略文学的审美价值层面,因而,实际上绝少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也很难寻到纯粹的“载道”、“训世”的文学。

“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现代文化意识、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被浓缩、凝聚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政治热潮。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前后,不少作家出于对思想启蒙的失望,更出于对政治革命能改变一切的热切而天真的期待,因而都对文学表现出某种鄙屑。鲁迅先生当时说过:“文学,是最不中用的”,“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①。所以,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而大革命失败把作家们又抛回文学领域,他们一改“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主张,而使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正式实现从“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到“表现政治”的文学思潮转换的,是1928年“革命文学”口号的论争。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救亡的旗帜下,现代中国作家自觉地把创作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积极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宣言:“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呼吁“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他们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和民主根据地,像艾青、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李广田这样一些曾一度热衷于抒写个人纤细的情感、流露出唯美倾向的作家,亦陆续地投入到政治潮流中,开始为战斗而歌唱,为革命而歌唱。如果说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著名命题是对30、40年代普遍存在的“为政治”的文学观念的一个理论概括和总结,那么,以后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则是《讲话》影响作用的发展和强化。诚然,“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在30、40年代还存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涌现出了巴金、老舍、曹禺等一批优秀的民主主义作家,不过,比之于整个政治化的左翼文

学思潮,民主主义作家的声热和影响则显得微弱得多。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实在无法给“为艺术”的文学提供一个适宜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尽管“为艺术”的文学思潮也曾有过热闹的“家史”,产生了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派诗歌、何其芳等人的散文以及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它们生不逢时,很快便归于沉寂。

如果说“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富有生命力是艺术的真实性,那么,“为政治”的文学思潮强盛的生命力则全赖于艺术的政治性。政治本位强化了30、40年代文学的阶级意识和群体意识。“五四”时期作家们主要关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形成了真诚地看待人生、如实地表现人生的共同创作准则。强调“真”是文学研究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共同的着眼点。前者倾斜于再现生活的“真相”,后者突出表现内心的“真情”。30、40年代的作家才更重视文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其时,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已是“革命的前驱”^②,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③,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毛泽东同志最后把文学概括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至此,文学由介入政治逐渐转换为政治认同,于是就有了评判作品成败的第一标准,它是区别是否是革命作家的分水岭。文学观念上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30、40年代文学思潮的全貌。如果说“我首先是一个人”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最强音,那么,30、40年代文学的最强音则是“我首先是一个革命人”,对人物进行哲学、历史、宗教、伦理、心理的多维思考亦随之被阶级分析所取代。对此,我们可以从茅盾的《虹》经“革命加恋爱”作品的发展,到后来沙汀的《闯关》、艾青的《火把》中见到一斑。阶级意识的强化,使作家们逐渐丢开自己熟悉的生活,而以饱满的热情去选择和表现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与斗争。

众所周知,从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即逐渐与中国传统的群众本位观念相融合,这种融合对中国作家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他们逐渐放弃曾热烈追求、心向往之的个性意识。当丁

玲突然在《在医院中的时候》重新提出个性要求,描写个性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尖锐冲突时,她弹出的确实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时代氛围极不谐调的音调,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为政治”文学思潮的某些缺陷,使“为政治”文学思潮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致于它最终没能产生与鲁迅先生及其他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相媲美的艺术杰作。但是不能否认,“为政治”的文学思潮也曾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虎虎生气和勃勃生机,她能永彪史册并为后人所景仰的那种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那种慷慨悲歌与壮怀激烈的政治热情,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鼓动性和感召力,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融汇与转换:民族民间文学复归的价值取向

近代中国在军事上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两难的抉择:一方面要借助西方先进文化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实现又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一方面要用西方文化来改造我们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中西文化的这种强烈冲突在文学中的投影是:既要迅速与世界融汇并保持同步,又要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要提高普通民众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又要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要求和审美习惯。面对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问题,“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与30、40年代的文学思潮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新文学的雏形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建构起来的。在西方文学的镜子折射下,中国传统文学全是“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都是在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上产生的“死文学”和“非人的文学”。因而,出现在更高层社会形态中的近现代西方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标志着先进与落后

的进化概念和价值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以极大的热情肯定和颂扬西方文明,胡适的《建设的革命文学论》呼吁:“赶紧多多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要以“庄严灿烂的欧洲”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样板。当时,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开始写作的。正是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广泛借鉴,才使中国文学以一种“偏激”和“片面”的方式迅速挣脱了几千年中国古代文学的重重桎梏,建构起了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充满自由精神和襟怀宽广的现代文学雏形,才使中国新文学站到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新起点上,初步完成了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整体转换。

然而,到了30年代,一大批作家开始尝试把“欧化”的形式与中国的现代生活内容融合起来,创造出真正的现代的民族文学。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围绕着文学的民族化问题,革命文艺界进行了多次关于大众化、民族形式和普及与提高等问题的讨论,批判了“五四”文学的欧化倾向。后来,毛泽东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了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于是,在30、40年代,“五四”时期作家那种与世界文学融汇的急切要求被向民族民间文学复归的迫切要求所代替,无论是在小说、戏剧,还是在诗歌、散文中,都渗透了民族文艺尤其是民间市民文艺的广泛影响,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气息。然而,人们在强调文学的民族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对民族文学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改造,轻视了前一时期文学所积累的积极成果。表面看来,它们似乎是对“五四”的否定之否定,但实质上并没有完成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这导致了“五四”时期文学思潮与30、40年代文学思潮之间出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断裂。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是感情解放的浪漫时期,我以为,这一时期也是理性解放的启蒙时期。因为,这一时期许多作家都摆脱了儒道思想的束缚,借助西方的各种主义和学说去思考宇宙、社会和人生,因

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辨色彩,问题小说、哲理小说、散文、格言式的小诗十分繁荣。冰心恬静地描画着冰清玉洁般的“爱”的哲学,许地山从容地思考着空山灵雨式的宗教哲学,王统照、叶绍钧则思考着他们美的哲学,而庐隐则徘徊于她那悲观的生命哲学之中。这种带着个人智慧和体验的哲理色彩,在30、40年代文学中是很难见到的。原因是此时作家们所热心的是宣传与演绎某种理论、思想,而不是探索与思考。这种倾向,在30年代初期蒋光慈的作品、华汉的《地泉三部曲》等作品中就已初露端倪。尽管当时左翼文艺界批评了这些作品的概念化倾向,而且在后来的创作中这种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但他们所代表的特点依然存在。无论是洪深的“农村三部曲”或是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或是以后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它们采用的都是寓意性创作手法,力图通过讲故事来说明一个先验存在的观念、道德,以此来教导读者。这与中国古代“重教化”的传统和通俗文学中“劝善惩恶”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民间文学对30、40年代文学的影响。此外,文学在30、40年代迫切要求高度集中、统一、一体化,这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需要。其带来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复活了古典文学那种用普遍伦理节制个人情感的规范性的特点,使“五四”文学那种独具个性的创作越来越少,作品在题旨、取材、风格、意象、深层结构、形式安排等方面相似的作品越来越多,表现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作品多于饱含个人辛酸、哀乐和创意的作品。这与“五四”时期千姿百态的文学形成鲜明对照。

“五四”时期的文学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注重呈现方式,不再把情节视为作品的核心,也不再把行动当作人物的核心,而是淡化情节,强化细节,向人物心理开掘,细致地揭示、描写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的过程,常常采用辐射式的横向结构,等等。30、40年代文学在许多方面摈弃了所谓欧化的形式和技巧,自觉地向民间叙事文学学习,用叙述性代替呈现性,用情节代替描写,用平

面展开代替内在挖掘,作品大多采用单线或双线纵向推进结构,等等。而对人物形象作类型化的处理,强调故事性和传奇性等特点,在解放区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30、40年代文学在民族化的努力中适应了工农读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经验,使民族民间文学的许多优秀遗产重新得以发掘,不但纠正了文学发展中某些片面“西化”的偏颇,而且大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和技巧,富有成效地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从这一意义上看,30、40年代文学思潮是“五四”时期文学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发展的本身所带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幼稚与狂热:悲凉沉郁中折射亢奋激越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近百年饱尝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与辛酸,并从沉睡中惊醒,努力去抗争。这种历史进程使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在审美特征上呈现出从悲凉沉郁到亢奋激越的演变历程。

当我们翻开“五四”时期文学作品时,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其时代的苦闷感。其间有“生的苦闷”,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郁达夫的《还乡记》,而王以仁的《流浪》则写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穷愁潦倒。其间有“性的苦闷”,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以及叶灵凤等人的作品大胆地描写了人的自然情欲,宣泄出“向善的焦躁与惩恶的苦闷”,将青春时期的本能欲望与传统道德的伦理之间的冲突写得惊心动魄。其间有“爱的苦闷”,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几乎全是那么纯真与圣洁,她们所吟咏的对爱情的渴望,是爱情追求中的痛苦,是爱情无法实现的悲伤。其间亦有“玄思的苦闷”,这一时期的作家充满着探索人生根本的哲学热情,在问题小说和哲理小诗中,投射的是他们苦苦思考着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意义以及宇宙的奥妙的影子。简而言之,“五四”时期的苦闷感已经渗透了人生的各个层面。

除苦闷情绪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更有一种不知如何摆脱苦闷的迷惘感。鲁

迅的涓生不知怎样跨出那第一步,而“过客”虽然执拗地向前走去,却不知等待他的是鲜花、荆棘还是坟墓;许地山则用充满佛教色彩的语言喟叹:“我们都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往,往渺茫中去”;庐隐更是悲愤痛彻地呼喊:“哪里有彼岸?哪里有花园的主人?哪里有秋天的女神?哪里有自然的使者?”有时候,这种迷惘感甚至变成绝望感、荒谬感和无可依归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作家才如此热衷于自杀的描写,就连相信进化论的鲁迅先生也曾把希望与绝望联在一起,以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作家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怀疑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榜样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日趋胜利的现实,使知识分子逐渐看到了民族和国家以及个人的前途,热烈地憧憬着光明的新中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④这种乐观精神不仅存在于党的领袖之中,也存在于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中。它十分深刻地影响到文学,使30、40年代的文学思潮一反“五四”时期文学思潮的悲凉沉郁,变得亢奋激越,热情奔放。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必胜、正义必胜的乐观意识。“五四”时期常见的悲剧性结局几乎全部消失,而“五四”时期几乎看不到的“大团圆”结构方式则比比皆是。这一倾向在30年代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和“革命加恋爱”的作品中已初露端倪,到了40年代更成了普遍现象。诸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以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作品,尽管它们也展现了严酷、复杂、甚至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实,但最后总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英雄的牺牲必然换来革命的胜利,因而,我们从中体验到的与其说是悲,毋宁说是壮。

悲秋、残春、孤鸿、衰草、夕阳,是“五四”时期作家大量运用的意象和意境,它们溶入

了作家凄绝哀伤的主观感受。而我们在30、40年代作品中看到的则是太阳、黎明、春天、红旗、火把、军号,它们是作家对革命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然而,正是这种乐观的、理想主义的意识,反映出了这个时期作家的单纯和盲目。他们低估了阻碍人类进步、个性发展的一切落后势力,对革命进程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在气势和力度上比“五四”时期的更强,但却少了几分清醒和深邃。就拿塑造农民形象来说,“五四”时期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是凝重、麻木与萎缩的,而30、40年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则是觉悟、坚强与勇敢的——它充分发掘了中国农民革命性的一面。这无疑是对“五四”时期农民形象塑造的重大发展和补充。但这个时期在对革命者形象塑造上的理想化倾向也是明显的。从《倪焕之》中的王乐山、《虹》中的梁刚夫、《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的林希坚,到《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章品以及《暴风骤雨》中的肖祥等等,面对严酷的现实和恶劣的环境,他们总是那样冷静刚毅,甚至一出现,再复杂的矛盾也都迎刃而解了。他们被描写得太完美了,人们根本看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听不到他们真诚深刻的自我反省。诚然,处于艰苦卓绝斗争中的人们需要受到鼓舞,需要一种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榜样,这种理想色彩在当时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全球意识:文学思潮历史的坐标确立

文学介入政治,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西方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如启蒙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与俄国革命、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与二次大战等等,都是较为突出的例子。而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充溢着怀疑和批判精神,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在中国,造成文学与政治完全认同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本身对文学的独立性尊重不够,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心理素质上形成了对政治过分的依附

感和认同感。当文学介入政治时,既要坚持政治功利本位的价值标准,亦要尊重真实本位和艺术本位的价值标准,在维系它们之间关系“平衡”的同时,要允许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形成不同的层次,保持必要的张力,以达到促进文学多元发展之目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才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于世界意识中追求民族性,于民族意识中追求世界性,这是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所应有的表现。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要意识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现代文学,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必须彻底消除民族性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清除掉那些与整个人类发展和进步不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艺术形式,特别是对于现代中国这个在社会形态上落后于西方、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国家,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将会丧失掉自己的传统文化,泯灭民族的个性,实为杞人忧天。因为,传统的河流是川流不息、无法断裂的,新的潮流的引入,只能使传统的河流更加波澜壮阔,更加充满活力。“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它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T·S·艾略特如是说于我们是有所启迪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风貌和魅力,才能为世界文学作出独

特的贡献。唯其如此,它才不至于被世界文学淹没,才可能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应该在世界意识中追求民族性——摆脱了片面性与局限性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保持一致的民族性,尤其是可以丰富国人对世界、人类和宇宙以及本民族特性的认识,丰富人们的审美感受的民族性。

总之,历史是一次性的,它一经过去便永不再现。中国文学的前景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传统文学的复归,或者传统文学的中断;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以中国文学为主体吃掉西方文学,或者以西方文学为体、为质,以中国文学为用、为形。中西文学的融合已经并且必将充满矛盾纠葛、历时颇为久远,不断重新理解和发现对方的新的价值、并加以吸纳融汇。80年代,中国人民开始以健康的文化心态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摸索、确认出一条既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又不脱离民族文化传统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之路,从而,在中外文化多向融合的基础上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新的价值系统和民族精神。

①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②郭沫若《革命与文学》。

③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作者陈晓明副教授,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88号二楼(430061)

责任编辑:陶原珂

。龚。自。珍。集。外。诗。文。录。

□王贵忱 王大文

清贤龚自珍，是我国 19 世纪前半叶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生平著述繁多，除其生前刊行的家刻本《定庵文集》（初集）三卷、《定庵文集》（即诗卷《破戒草》上下两卷）和《定庵续集》（即《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和杭州陆贞一在道光十二年（1832 年）所刻定庵专著《大誓答问》外，散佚之作甚多。后世历次重刊龚集，多有补刊定庵佚文者。就中以吴煦于同治间所刊《定庵初集》、瞿子宣在宣统元年（1909 年）所编国学扶轮社铅字排印《定庵全集》、邓实于宣统二年（1910 年）编刊《龚定庵别集诗词定本》（附《集外未刻诗词》）和近年逝世的王佩诤先生新编《龚自珍全集》（下简作王本）等本，在辑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 30、40 年中，见于报刊发表的定庵集外文，仍有 30 余篇之多。笔者涉猎未广，往于翻阅古籍中亦薄有所得。现将之依写作先后时序排列录出，并将出处及有关背景略作说明，供学者覆案。

（一）书赠徐廉峰诗四章

余以戊寅岁来游洞庭两山，有《纪游诗》一卷。庚辰春又游，补前游所未至，得诗不盈卷也。兹录四章，皆（王本误释作坐字）舟中作。尘廉峰先生大坛站是正（王本失录“是正”二字）。同岁生龚自珍敬状上。时有念望（以上十三字，王本未录）。

舟到西山岸，寻幽迤邐斜。居然六七里，无境不烟霞。遂发石公寺，言（王本作定）过神女家。云和风静里，已度万梅花。

风意中流引，香烟古（王本作在）屿迟。悠扬闻杜若，仿佛邀蛾眉。白日明镜，春空飘彩旗。湖东一回首，万古长相思。

西山春昼别，两袖落梅风。不见小龙

渚，犹（王本作尚）闻隔渚钟。尊前菰（王本作苳）叶白，舵尾茗（王本茗作茶）华红。仙境杳然杳，酸吟雨一篷。

此游好补前游罅，挥手云声浩不闻。两度山灵濡笔纪，钱唐君访洞庭君。（戏用唐人小说，予籍钱唐故也。辑者案：王本则作“余家钱唐，戏用唐小说为此”）。

注：此文录自宣统三年（1911 年）石印本《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九。原书札无题，据文意拟补。

本文四首诗已见王本著录，惟将诗跋和诗分开收入：将诗跋名为《与徐廉峰书》，列入该全集第五辑，诗则收入第九辑。其第一首原题作《发洞庭，舟中怀钮非石树玉、叶青原昶》、第二首原题作《此游》，与写本有异文，非但未出校记，而又删节原文，并释文亦有误。今依《昭代名人尺牍续集》所载定庵原稿移录一过，以存原本面目。

（二）《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跋文

大清道光元年（1821 年）十月（旧算，下同），平江苕明澈、邬波索迦了因从闻，谨以彭二林居士所藏隆庆五年（1571 年）径山传衣庵本及汪节安居士藏万历八年（1580 年）龙沙章江禅院刻本，复以《小钞》参详校定，募资于众善士，付同郡许西畴缮写，刘徵寿梓，版存娄门内善庆禅林。

注：此文录自道光四年（1824 年）苏州娄门内三家村善庆庵仿宋写刻本唐释宗密《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

本文作者联署明澈、邬波索迦二人名，明澈当系善庆庵苕法名，邬波索迦为定庵学佛名，乃合作之文。

(三)重刊《圆觉经略疏》募缘启

盖闻大医度世,广说深经,凡夫发心,须凭教典。禅净两义,咸本圆音;性相二宗,统归一乘,无如华梵殊异,理趣玄微,必藉筌蹄,庶臻解悟。而世俗流通《金刚》诸本,率其胸襟,杂于儒道,妄解般若,疑误信根。惟此《圆觉》深经,宣说在金刚破相之后,判教同华严最上之宗。圭峰大师荷曹溪滴水之传,诠贤首醍醐之旨,能使甚深大法,剖以片言,最极钝根,指其归路。为《略疏》二卷,普令初心顿明禅净之义,入门遂识性相之原,真希有之梯航,度人之宝筏也。全本在《藏》,得睹者希。澈等拟付枣梨,特善清本,字共十万有零,费需百金之外。众举易为,功成非浅。惟望慨施净财,助其雕刻,福慧双圆,功德靡罄。其出资助刻名氏,具列左方。时道光元年岁在辛巳四月,吴门善庆庵识。

汪廷楷、顾承、顾诒谷、洪振容、龚自珍、顾崧、葛香士、潘筠浩、蒋寅、魏源、潘遵懋、王祖梅、马为、陆鹵民、陆泰基、沈磐、卞嗣敏、沈维树、袁义祥、袁绍丰、贝墉、江沅(校勘)。

汪门程氏、杨门张氏、戈门□氏、张门李氏、袁氏兆瑛、贝氏秀华、龚门何氏。

祖证、悟开、明澈、如德、如本。

注:此文录自道光四年精刊《圆觉经略疏》本。

上文(二)作者既以明澈、邬波索迦二名并列,本文则称“澈等拟付枣梨”,准上例“澈等”自应包括龚自珍在内。再就文风而言,亦似定庵手笔。龚氏既已出资刻经,以自家名义写出《助刊〈圆觉经略疏〉愿文》,又撰(二)(三)两文由明澈领衔付梓亦理所宜然。

(四)助刊《圆觉经略疏》愿文

大清道光四年,佛弟子仁和龚自珍,同妻山阴何氏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一百二十部,流传施送。伏因先慈金坛段氏烦恼深重,中年永逝。愿以此功德,回向逝者,夙业顿消,神之

净土。存者四大安和,尽此报身,不逢不若。命终之后,三人相见莲邦,乃至一生补处。

善庆庵印五十部;

贝墉印三十部;

查净缘、汤净智、陈净慧共印三十部;

如本印十部;

潘曾沂印二十部;

信女龚门金氏印送二十部。

注:此文录自道光四年精刊《圆觉经略疏》本。

此愿文又见《娟镜楼丛刻·定庵遗著》收入,非全文。王佩诤《龚自珍全集》本所收入此文亦非完本,盖自《娟镜楼丛刻》本所从出者。故依原刊本尽录全文如上。

(五)《双非双亦门颂》跋

道光十八年(1838年)岁在戊戌夏四月,子珍仁兄翰林知予将戒装出都,以素册属写所造述,曰相思资也。尽两昼写二千八百字,以报知我者。子贞高斋清厦,是京师第一册府,异时长林丰草间翘首北望,此册得所托矣。仁和龚自珍(一名巩祚)并记。

注:此文录自193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龚定庵诗文真迹三种》。原本无题,据文意补之。

1956年笔者得一薄册影印龚定庵手稿,系连史纸石印线装本,初不知书名,也不知出自何家印本。经取别本定庵集对勘,颇有异文。由于不明其传刊情形,往撰《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一文时故未及之。直至数年前,获读王元化先生《读樊著龚自珍考》一文(见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王著《清园夜读》),始知往昔所得者是193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龚定庵诗文真迹三种》。近年又得一册,无书名、无版权页,与前本同。如果不是读过王先生之文,我们至今对该书的认识也还是模糊不清,也不宜轻意使用这一珍本。该文还指出,《龚定庵诗文真迹三种》一书中所收《双非双亦门颂》、《重定双非双亦门颂一首》二文,各有一跋系集外文,为王本所未收。兹据《龚定庵诗文真迹三种》一书,录出《双非双亦门颂》

跋文如上。

(六)《重定双非双亦门颂一首》跋

此颂再乞子贞印之。四月二十二日。飞雨崇朝，不得出门。睹此册尚有空叶，故书满之，巩祚。

注：见上文(五)注。

(七)与吴六老爷书

弟行有日矣，不复能商榷文字。而自客夏到今，所过眼之拓本已上硬黄者，愿全数覆目一通。求于日内哀聚在一处，弟诣尊斋，作一番读，胸中尚有所贡疑。此番谭罢，则不知何年重相见矣。《乐好原偈和诗》一本、《虎邱大鼎考》一本、《文断甲选》一本，求检出付还。此候道安，巩祚顿首。吴六老爷。

始与不能，终之皆恃有专才识三长之仁兄。弟甚负荷大(不陈)。

注：此通书札与下一通，均系龚定庵于道光十九年出都前写给其友人者。此札上款署“吴六老爷”。这两通定庵真迹书札，为某先生珍藏。往承彭长卿先生见贻复印件，兹为作释文收入辑本中。原件无题，据文意拟补。

(八)与友人书

阁下所患苦得差否？念极，念极！总宜内治，勿视外科，至属，至属！有客秋贷款青蚨八千，又有抄拙著，抄费三千，计十一千，谨呈上，乞入。弟于五日后，踵晤一切也。谨乞法书楹联一事，其句欲嫁名左右，以自增重，俾荣压归装。幸甚，幸甚！即候起居不宣。巩祚叩头。闰月六日。

南宫闻有新哀礼，

东观知无未读书。

俞理初(正燮)、戴醇士(熙)皆欲奉访，俟起居大愈，乃拉之来。附及。

注：此书札原无上款，兹据文意补题。

这一书札乃定庵出都前，致其友人索求书写楹联。原信既无上款，亦无纪年，仅署“闰月六日”。考龚氏辞官离京南归，乃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39年6月4日)

事，是年无闰月。后二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有闰月(闰三月)，其时定庵回故乡，已两越寒暑。初就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后于道光二十一年继其父斋主紫阳书院讲席，仍兼丹阳讲席。是则可知这一书札非作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六日。查定庵出都前一年，即道光十八年逢闰四月，其时方准备行装待南归，与此信言及求索楹联以“俾荣压归装”内容相合，殆作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六日明矣。至于受信人，还无从确定。有可能是吴式芬(子苾)，或何绍基(子贞)。其时吴、何二人有书名，皆为金石家，与定庵过从为深。如前所述，道光十八年四月，龚自珍应何绍基之请，曾为其写过长篇书件。一个月后，即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六日，龚氏向何氏求写楹联亦属情理中事，从现有资料看，此信写给何绍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九)钱南园临《枯树赋》跋

予在髫龄，侍父于徽州官廨，任征讨文献之役。卷轴随身，以旧藏钱侍御南园书帙为可珍玩。是皆先大父匏伯公官滇池时所得。南园直声震天下，望重兰台，一时士大夫相与倾慕。其书胎习褚法，独树一帜，不随时流徒逞姿媚，足以征风节之高矣。己亥九月，仁和龚自珍记于羽琇山馆。

注：录自严宝善《贩书经眼录》18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十)《对岳楼诗录》评语

古体浑厚，得力昌黎、昌谷居多。近体风旨清深，当位置随州、樊川之间。仁和龚自珍。

注：此文录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刊本孔宪彝《对岳楼诗录》卷首《评跋》。原本无题，据文意拟补。

(十一)题王子梅稿

己亥十月，龚巩祚读于孔氏拏云馆。

注：此文录自咸丰七年(1857年)刊本孔宪彝《对岳楼诗续录》卷二。

(十二)《秦泰山刻石残字》跋尾

洪稚存诗曰：“若将一字比一星，廿八宿

中添一伐。”岂料未及五十年，人间又少十九字耶！可为浩叹！自珍赘记。

龚自珍获观，时庚子 月。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记》实有缺文，又有倒文，与石刻不符。前年于王侍郎（绍兰）斋中，获见北宋拓碣石秦刻，文与《史记》绝异。可见文宝只解钞《史记》，非解造秦刻，作伪也须学问耳。此秦刻石也，稚不熹，目之为秦碑。附质六舟以为然否？

注：本文初见于吴煦刊本《定庵文集外》，原题作《秦泰山刻石残字跋尾》。惟吴刻有删节，非全文。今移录王壮弘先生所录王春渠先生藏原拓本龚自珍真迹跋文二则如上，仍用吴刻本原来题目。

此系明拓白皮纸本。后经六舟和尚、王春渠等人递藏。有林吉人、阮元、龚自珍、赵魏、许瀚、六舟和罗振玉等人题跋。册内钤有龚自珍、羽琇山人、鹿原林氏、吴荣光、赵之谦、胡鼻山、洁之、祖谦、六舟、李国松诸人

等二十八方印识。定庵第一则跋文题在左上旁，第二则题在阮元跋文之后，详见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96—9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十三）明嘉靖刻本《越绝书》跋

余生平喜《穆天子传》、《越绝书》，以为可配《庄》、《骚》而四之。《穆天子传》得洪校本，尽善；《越绝》尚沉霾丛刻中，未易读也。今北堂得此本，当与洪氏单行《穆天子传》并刊之，以慰好读二奇书者，惜未取丛刻一校。自珍瞥记。九月十八日。

注：本文录自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原本无题，兹据内容拟补。

作者王贵忱，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王大文，广州市南海石油服务公司总经理助理、讲师（510110）

责任编辑：童 轩

龚自珍 李嘉瑞

卷九 十九

風狂雨流非香烟古嶼遙臨揚州壯若琴
佛迦幾眉白日塘明鏡春望飄彩棋湖
東面回首第廿長相思
西山春書別物東落梅風不見小乾渚猶月
隔諸鍾尊前燕葉白肥肥若華經仁院香
蛇香酸吟雨二蓬
此好好補為好驀揮空聲浩不沙如度
山靈需奉紀錢曾君訪洞庭君
手稿修磨好也

舟到西山所見此山迥斜居於六七里
無境不惆家遠處石上青苔過種世家
重和風靜裏已度易梅花
庫家先生大增姑
是正
同歲于龍溪日珍題
時有志吟

（一）葉自珍《書贈徐廉峰詩四章》手迹

《风月锦囊》刊印考

□黄仕忠

《风月锦囊》是一部戏曲和散曲选集，国内向无传本，今仅存于西班牙爱斯高亚圣劳伦佐(Read Biblioteca de San Lorenzo del Escorial)图书馆。本世纪20年代，戴望舒旅欧时曾见，并作《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一文，称该集为“天壤间孤本。所选传奇、杂剧、时曲甚富。时曲无论，传奇、杂剧亦颇多今已失传者。”^①50年代后，港台学者因交往之便得睹此书，方有专文介绍与讨论^②。但仍嫌粗略。80年代初，该书胶片及影印件流归大陆，受到极大关注，有彭飞、朱建明《〈风月锦囊〉疏辨》(载《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和孙崇涛《西班牙藏本〈风月(全家)锦囊〉考释》等系列论文，载《中华戏曲》第8—14辑。兹就此集刊印情况略作考辨。

(一)书名

此书原作两册装，封面及扉页残脱。目录及首页俱题：“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卷之一”。省题“风月锦囊”，当即据此。

(二)构成

该书由三部分组成。(1)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卷之一。(实亦仅此一卷；版心题作“续补首卷”，下文即以此词称之；目录中此卷排列在最后，作“首卷时兴曲”；实际所录较目录所示为多。)(2)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凡20卷，目录于此卷卷目后注“前编目录终”，故此编亦称作“前编”。(3)新刊摘汇续编赛全家锦大凡20卷，此据其卷之一所署；卷二亦题作“精选续编赛全家锦”，卷三则作“新刊摘汇奇妙全家锦囊续编”，等等，所署不一，其为“续编”则同。

因其题名本身混乱，故论者或谓该集别称“全家锦囊”，或疑“风月锦囊”一名不足以涵盖全书。

(三)编刻

据“前编”的题记，此书系“汝水云崖徐文昭编辑(‘辑’字亦间题作‘集’)，书林詹氏进贤堂梓行”；“续编”刻者署作“书林詹氏仁智斋梓”。其续编卷14又署云：“江右龙峰詹子和校”。詹子和或即进贤堂主人。汝水为江西水名；江右亦系江西之别称。则徐、詹二人均籍江西。或谓汝水之东有进贤县，明清属南昌府，可能詹氏原籍此县而以之为堂名，詹氏为江西书坊。(此为刘若愚说；但以“进贤”与“仁智”相对看，当非由县而得名)但也有意见认为此书为建阳书坊所刻，如龙彼得以版式和字体都和明代福建建阳所刻的其它戏曲选集相似，而推定此集亦为建阳刻本；又以为“书林”是建阳崇化里书坊的别名，进贤堂既然标明“书林”，当在建阳而不在江西(据王秋桂译刘若愚文注)；上田望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四著录明建阳詹氏进贤堂刻本数种，亦以为当系闽建刻本(《明代有关三国故事的通俗文艺》，载日本《东方学》第84辑，1992年)。

(四)版式

前编均为上图下文。上栏之图占全页的1/4，有额有联。续编11卷以前同前编，作上图下剧；12卷以下，上栏改刻杂曲。两编下栏均为传奇戏文，唯《西厢记》一种为北剧。“续补首卷”所录，上栏标称“时兴杂科法曲”；下栏首组曲题作“正科人赚”，则下栏当属“正科”了。此当即书名中“正杂两科全集”之由来。下栏所录兼有剧曲。

(五)刻印时间与重刊情况

续编末有牌记：“嘉靖癸丑岁秋月詹氏进贤堂重刊”。癸丑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可知该书为重刊本。此种重刊并非重新雕版刻印，而是沿用旧版，只抽换、补刻了若干残损的板块。但补刻甚粗率，图栏、行序、字数与原板不甚相合，如续编卷

11《王昭君》，第5页补刻时将每页13行20字改作14行22字，遂使《啄木儿》曲后三句重出，不过倒也纠正了原刻的一些讹字。

(六)著录

书名《风月锦囊》曾见记载，明杨士奇等撰的《文渊阁书目》卷二“诗词”类第285种：“《风月锦囊》一部一册，阙。”位在《戏曲大全》和《笑苑千金》之间。明叶盛《绿竹堂书目》亦据此著录。按：杨士奇1441年所奏“文渊阁书目题本”称文渊阁藏书系永乐19年（1421年）从南京取来。也有论者推测此《风月锦囊》或为詹氏刻本所本，意图将所录戏文之源出推至永乐间。其实这只是同名而已，二者并无瓜葛。又《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著录有《风月锦囊》一种，或疑其与詹氏刻本有关，据上海书店影印本，实系杂剧，且注明为“明马惟厚作”。

因此，西班牙所藏的这本《风月锦囊》，虽有同名之书却是未曾著录过的。

(七)初刻

以往论者倾向于将《文渊阁书目》或《绿竹堂书目》所载的同名之书作为此书的初刻本。罗锦堂谓：“《绿竹堂书目》为明人叶盛于宪宗成化年间所刻，因之可知此书刊行，至迟也当在宪宗之际。”（按：罗氏当时未知《文渊阁书目》已有著录。）刘若愚则称：“如该书目（《文渊阁书目》）著录的《风月锦囊》与此集是同为书，则此集初刻之期当在1421年之前。不过重刻本与初刻本内容必定有异，因重刻本收有明中叶的作品。”

孙崇涛进而说：“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因为进贤堂‘重刊’的本子中，虽然补进了永乐之后直至嘉靖年间的作品，但它仍保留着不少宋元明初旧作。”而彭飞、朱建明则径直认定此集源出于永乐间之书，并进而说该集所录之戏曲为永乐以前之本。

上述观点均难成立。因为各家书目所载与此集是两本书，非同一物。且此书初刻时未必即名作《风月锦囊》。从其所录之作品看，其取材的下限也仍可考索。首先，此书的编集者是徐文昭。前编和续编卷首均有署称，可以为证。其次，“续补首卷”内又录有徐氏之曲。可知三部分的编集均出于

徐氏之手无疑。若永乐间已经成书，则徐氏亦当为明初之人。但三部分中均有后于永乐且迟至嘉靖之证据。如前编中录有《伍伦全备记》和《香囊记》二种，分别出自邱浚（1421—1495年）和邵粲（成弘年间人）之手，均非永十九年（1421年）所能编入。而且，前编原题作“全家锦囊”，固与“风月锦囊”无涉。续编内题原作“全家锦囊续编”、“续编赛全家锦”，亦与之无干。又续编所录《肖（萧）山邹知县湘湖记》，《远山堂曲品》记其为丁鸣春所作，其本事见于清毛奇龄《西河合集·文集·传》卷一之《何孝子传》，乃明弘治十一年至正德九年间（1498—1514年）事，此戏的写成更在此年后。《四节记》为沈龄作，徐朔方先生论定其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还带记》为沈龄的另一作品，徐先生考定其为杨一清祝寿而作，时间在嘉靖二年（1523年），见《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沈龄事实录存》。“续补首卷”录有《宁王》戏文，亦即《南词叙录》著录之《王阳明平逆记》，按：平朱宸濠叛逆事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上例已可以论定编辑者徐文昭为正德、嘉靖时人，此本《风月锦囊》三个部分的编集都出于一人之手。所录之戏只反映正嘉间的面目，而与永乐之《风月锦囊》无涉，更不得直视作明初戏文原貌。且此书三部分都有晚于永乐之例，故也不存在“初刻”于永乐间，重刻时有异而“收有明中叶的作品”的可能。

(八)初刻与重刻的关系

该集是否存在三个部分合为一体的“初刻本”，似亦存在疑问。因为各部分实为杂缀而成，原非统一。较为合理的解释应是，三部分原是单独刊行，“重刻”时才将三者合为一体，并冠以（或后人冠以）“风月锦囊”之名。其中，《全家锦囊》（“前编”）先出；《全家锦囊续编》继之。此二种前后相承，实为一体：前编以收录宋元及明初名剧为主，可视为当时之“经典剧目”；续编则以摘录近时写编本戏文为主，可名为“时兴剧目”。其正式题名即是《全家锦囊》。而“续补首卷”原录“正杂两科”之曲，或曾独立刊行而名“风月锦囊”，所以其中有些曲文与正续编有重复、

重出者,如续编卷10《回文记》的曲文,即在“续补首卷”重出,题作“新增苏氏自叹”,字词有一二处见异。即以“新增”为标榜,可知其刊行时心中并无续编存在,是为独立之集。当詹氏将三部分合而为一时,才是此集的“重刻”,但仍用各集原有的雕板。即嘉靖三十二年的重刻,并非原有全集而重刻,乃是将三者合为一体而称为“重刻”,并冠以“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之书名。正因为三部分原非一体重刻时仍沿用旧板与旧称,才出现题称十分混乱的情况。故《全家锦囊》当为“别集”单独刊行时的旧称,不能作为此“合集”的别称;当它汇编入此书时,便成为《风月锦囊》的一部分了。

《全家锦囊》的编集,标称“奇妙戏式”,即意味着所取为当时舞台演出之本;名曰“摘汇”,原本是为戏曲爱好者提供一种“精彩唱段”,故摘汇任意,本不求精审,刊刻亦颇粗率,错讹字甚多。但正因为如此,它所选的内容也有着一种“当时性”,非为“经典”而设。则其初刊与续刊合集的时间不会相去太远。如果相距达数十上百年,观众口味既变,则往日的“奇妙戏式”便已不再奇妙了。故其取材的上限为正德十五年(1519年,以《宁王》为限),或嘉靖二年(1523年,以《还带记》为据),直到重刻之下限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大略不到三十年时间。其分别刊刻,极有可能是嘉靖初年的事。即分别刻印与随后合一,很可能是十余年间之事。若此,则此书主要反映了嘉靖前期舞台演出之戏曲文本的面貌。而其中所录的宋元戏文,也仍可能是经受过明人的某些改动的。

(九)关于“摘汇”

原名“全家锦囊”之前编与续编,各卷卷首多标称“摘汇”二字。这表明其所录为摘选而非全录。从摘汇的具体情况看,所摘的主要是剧曲,间亦录入部分韵白,或因曲白相生的需要,录入少量宾白,因而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情况大略相似。故本书所录之戏曲文本,就版本的角度来说,是有缺陷的。

在作版本比较时,我们只能据此本之所本,比较他本之异;而不能因此本之所无,径直推导出其所据之底本原无,并下断语称别本所有者为后人增人。有些论者似未注意这一点。如刘若愚之《〈风月锦囊〉考》将摘录偶多的剧本称作“全本”,少者名曰“荟萃”;《中华戏曲》第九辑孙崇涛“伯喈考释”一文,亦有此种逆推。

本书所摘戏曲文本,以每戏为一卷,前、续二编共得40卷40种。但各“卷”因所录数量极悬殊,“卷”之内容多少不等。多者如《伯喈》《西厢》达数万字;而少者不过数百字,如《薛仁贵》《江天暮雪》。其摘录多寡出于编者喜尚,但多少也反映出当时观众对这些戏本的好恶,因而基本上体现了嘉靖初年人们对“经典戏文”和“时剧”的评价、排行。

按:明代嘉靖前后,是南曲戏文活动与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从明初至此,已达百年,而观众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等等必然会有很大的变化;随着北曲的衰落和南曲地位的上升,观众的喜尚也与他们改造南戏以适应其趣尚的要求结合起来。南戏正日渐传奇化,从音乐到表演都发生着变化。源出于宋元的南戏作品,必须脱胎换骨以适应新的时代和观众的趣尚。这是众多的宋元戏文在经历了这一时期以后,大多数出现了与“古本”相区别的“时本”的原因。而《风月锦囊》所录者,正是在这大变动中,一部分“古脉”尚存的戏曲文本的最后一幅写真,其后便别是一番景象了。

①吴晓玲编《戴望舒小说戏曲论集》。

②见方豪神父《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载1952年《学术月刊》第1卷第二期;罗锦堂有关论文分载于1956年、1957年《大陆杂志》卷十三、十五;并见于《锦堂论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刘若愚《〈风月锦囊〉考》,原载1960年《东方文化》第4卷第一期英文版,其王秋桂译文载《中外文学》第五卷第六期。

作者黄仕忠,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值得回味和纪念的十年

□陈恩泉

今年是深港语言研究所成立暨双语双
方言研究 10 周年大庆。国家语委主任许嘉
璐教授在祝贺“第五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
(国际)”的信中说:“这是艰难的 10 年,奋斗
的 10 年,丰收的 10 年,也是值得回味和纪
念的 10 年。”

10 年来,深港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科研
活动主要是:立足深圳,积极支持深圳市语
言文字管理部门开展工作,密切学术机构和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同国
内外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建立业务联系;主办
双语双方言国际性学术会议,出版会议论文
集和双语双方言书系。现在,研究所已经同
境外十几所大学、研究所及科研机构建立了
业务联系,还接待了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港
澳台和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从 1988 年 8
月本所倡导并主办首届双语双方言国际性
学术会议以来,得到了专家学者及各级领导
的热情鼓励,尤其是深圳语言文字工作办公
室的支持,同本所联合主办了二、三、四、五
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我们还组织
出版了“双语双方言书系”丙种《福建双方
言研究》(著作类);乙种《双语双方言》(论文
集)1 至 5 辑,共发表论文 159 篇,含三大
类:(1)理论探讨与实际调查;(2)比较研究
与综合分析;(3)教育实践与语言生活。文
集内容所涉及的研究面相当广,有不少是深
层次的、带规律性的问题。其中有三点值得
说一说。

其一,有效应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
法,从单方言静态描写的研究方法中脱颖出
了双语双方言动态比较的研究方法,把应用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升华为适用于双
语双方言研究的有效理论和方法——双
语双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双语双方

言》论文集所收的文章,绝大多数就是以双
语双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据,对双语
或双方言现象进行描写与论述的,比如:邢
福义《南片话语中述谓项前移的现象》,张振
兴《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陶原珂
《粤方言词语和普通话的相关性研究》,李如
龙、万波《福建境内的两种双方言现象》,王
群生《湖北“双方言”临界带入声消逝的轨
迹》,傅雨贤《惠州客家话吸收粤语成分探
索》,郑定欧《香港粤语与广州粤语之比较》,
以及余维《亲疏尊轻的理论框架与人称指示
的语用对比分析》等。

其二,面向社会语言生活现实,探讨与
研究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和新语料。其
中,有从宏观的角度,系统论述双语双方言
制度的,比如:陈恩泉《中国施行双语制度刍
议》,李作南《在我国实行双语制度的探讨》,
詹伯慧《略论方言、共同语与双语制问题》
等。有从语言发展的角度,阐述市场经济与
双语双方言关系的,比如:陈建民《市场经济
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傅雨贤《经济大潮冲击
下广东的语言生活走向》,林运来、刘淼水
《从市场经济看推广普通话》,郭先珍《试论
发展市场经济与发展双语的一致性》等。有
从双方言交融的角度,论证临界带各方言因
相互碰撞而产生“混合型”新方言的,比如:
张振兴《再论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
究》,庄初升《方言岛综述》等。有从微观的
角度,对语言生活新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见
微知著的,比如:邢福义《否定形式和语境对
否定量度的规约》,胡性初《在茂名白、客、黎
方言中为何都有 p 声母》等。有从语用的角
度,描述双语双方言现象的,比如:李向农
《略说沪穗青年流行语的特点》,张威云、陆
陈蔚《军队双语现象浅析》等;有以优选论为

理论框架,从新角度对方言的语言成分进行深入调查与细致分析的,比如:蒋平《汉语诸方言声调分布的优选解释》,等等。

其三,深港两地都是双语双方言异常活跃的社区,香港粤语和广州粤语的关系,香港粤语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及其教学等问题,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课题。其中,有从双语文策略的角度,研究港深两地双语文教育和香港未来的语言生活前景的,比如:缪锦安《香港的语文政策和语文规划》,陈恩泉《香港回归与港深两地的双语文策略》,詹伯慧《略论香港多元语言生活的前景》,傅雨贤《香港回归后语言生活走向刍议》等。有从语用的角度,探讨香港粤语和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及其教学和语言取向的,比如:王培光《香港粤语的地位与母语教育、普通话教学》,郑定欧《面向九七年的香港推普工作刍议》,谢锡金、岑伟宗《如何帮助粤语儿童学习现代汉语书面语》和何国祥、傅健雄《香港中小学在职语文科及普通话科教师对普通话教学态度的研究》等。有从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描述香港语言状况和双语双方言现象的,比如:田小琳《香港流通的词语和社会生活》,汤志祥《今日香港的中英混合语》和梁莉莉《香港粤语“水”字浅谈——兼论与普通话之对译》,卢卓群《梁凤仪作品中凝固性短语的双语现象试析》,吴永德《香港汉语与大陆汉语的词汇、语法差异》等。

10年来,双语双方言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拓展:从以深港片语言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拓展到以“普通话—汉语方言”、“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外国语”、“汉语方言—汉语方言”等多类型多层面的双语双方言现象为研究对象;从汉语方言地区的普通话(普通话—汉语方言)教学研究拓展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双语习得和双语教育

的研究;从地方双语双方言研究拓展到部队中的双语双方言研究;从正常人的双语研究拓展到非正常人(失语症者)的双语研究,等等。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在逐步深入:从对双语双方言现象进行语言成分的个别描写,进而站在语言理论的高度,对双语(双方言)交融中语言成分的消长、同化及异化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对双方言交叉地带各方言特点的客观描写,进而深入分析产生“混合型”新方言的原因;从纯语言研究,进而联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双语或双方言产生与发展关系的研究;从单纯语言成分的研究,进而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把双语双方言置于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从个别语言现象的研究,进而对全国、全省语言规划的研究;从双语(双方言)语言成分的研究,进而到双语习得、双语双方言教育的研究;从双语双方言现象的微观(技术性)研究,进而到宏观(理论性)的研究,等等。研究方法亦更加多样化:有共时的或历时的描写法,有比较语言学的对比法,有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语用法,甚至还引入了“优选论”研究方法,等等。

然而,学海无涯,“我们的事业海阔天空”。前10年的成绩,只能是后10年起步的基础。何况,我们为深港语言研究所成立五周年而作的《深港语言研究所与深港片语言研究》中提出的8个方面的研究课题还远未完成^①。此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还会有新的语言现象要研究,何况从科研实践中升华出来的双语双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不足以建立起我国语言学中新的学科分支——双语双方言学,所以,还需要广大专家学者一如既往的共同努力。

^①参见《双语双方言(二)》的《代序·一》。

作者陈恩泉,深圳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518000)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丰富了人格理论 提供了学习楷模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评介

□马中柱

周恩来同志的伟大人格风范,不仅国内家喻户晓,国际上也有口皆碑。但是,在研究周恩来的诸多著作中,对这一关键主题进行研究却较少见。由范英教授主编,吕志、范英合著的《周恩来的人格风范》(以下简称《风范》),紧紧地抓住了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不仅宣扬了周恩来的优秀品德和高洁风范,而且揭示了这种风范的内涵、特点和成因,丰富了人格理论,提供了学习楷模,对当前的道德风尚建设很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风范》拓展了人格的道德内涵

古往今来对人格的道德内涵作出的规定甚多。中国孔子给圣人人格规定的道德内涵是智、仁、勇“三达德”。现代西方人格主义的创始人鲍恩把“善良意志”、“爱”和“自尊”作为人格理论基本的“道德律”或基本原则。鲍恩这三条“道德律”,同孔子的“三达德”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以感情、意志和智力作为人格内涵的。《风范》把“人格理想”、“人格情感”、“人格准则”、“人格境界”作为“周恩来的人格思想内涵”,把“为中华之崛起”的“人格理想”放在首位,又把“做服役社会的公仆”作为“人格准则”加以强调,使人格的道德内涵丰富了,显现了人格的时代性、进步性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孔子和鲍恩所规定的人格内涵中,都没有把人格理想放在重要地位。孔子认为,“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用“仁”来统摄诸德以达成圣人的人格。且不说这个“仁”

是抽象的,而且一个人只在有了崇高理想以后,他才会有“好学”的精神动力,才有博大的胸怀去“爱人”,才会无所畏惧地去“力行”一定的主张,在“力行”时,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精益求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鲍恩提出用善良意志指导人们的一般义务关系行为,用爱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但不与一定理想和信念相联系的善良意志,就没有为追求理想目标的实现而产生的义务感,更不会用无缘无故的爱心去指导自己的行动。

所以,在人格的内涵中,没有道德理想的导向是不行的。《风范》突出人格理想和人格准则,使人格内涵中,不仅蕴含了智、仁、勇或善良意志、爱和自尊等道德因素,而且使它们有了更充实的内容和更明确的思想导向,有了人格的精神自觉。

《风范》揭示了人格的道德能动性

周恩来的伟大人格是道德理想的完美典范。《风范》研究了这种人格风范的表现和特征,阐明了作为人格主体的周恩来,在对己、对人、对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穷的道德能动性。使他具有“良好的人格素养”,“和谐的人格秉性”,“丰富的人格情愫”,“博大的人格胸怀”,“非凡的人格才智”,并且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过程中,具有良好的领导气度、领导品质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周恩来同志身上,人格就是自律,人格就是能力,人格就是创造。所以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说:“他的品德、才干使他善于待人接物,成为千

千万万中国人的敬爱领袖。”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以超人格的价值，由自己发展而形成外界，这才是伟人的本质。”（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338页）周总理正是以超出常人的超人格价值，影响了自己周围的同志和朋友，以至敌人营垒的人，形成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巨大力量，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成为“现代世界史上的巨人之一”。《风范》正是由于突出了这种道德能动性，从而弘扬了他那与众不同的、独具魅力的人格风范，展示了“中国文明的精华结晶”。

《风范》探讨了人格生成的原因

书中强调了周恩来从小注重立志，而且志存高远。周恩来批评了“志在金钱”或“志在得官”者的鄙陋，提出“故立志者，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不致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志立而后立人，他“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几十年如一日，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就成为必然的了。

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重视人格修

养，注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良心如何合乎“正理”。他认为，“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良心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是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责任和自我评价能力，这种道德义务意识和情感，要做到合乎“正理”，是要经过长期自我修养才能形成的。周恩来同志的《修养要则》及其所倡导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铭言，都表现了他的自我修养之诚，“良心安而人格立”，就是周恩来伟大人格形成的重要环节。周恩来的人格风范是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完善起来的。《风范》对周恩来在人格实践中的大量事迹作了生动的描述，具有很强的教育感染力。爱因斯坦曾说：“人格决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纪念爱因斯坦文集》第61页）周恩来的人格风范，正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劳动和行动”中，受到当时人们的钦佩，并永远作为楷模昭示于后人的。

注：文中打引号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周恩来的人格风范》。

作者 马中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510053）

责任编辑：罗 苹